



紀念吳俊才先生

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

In Memory of Founding Director of OIEAS
Dr. Chen-tsai Wu, 1921-1996

吳俊才所長
逝世二十周年紀念

Dr. Chen-tsai Wu

Architect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ies

1921-1996

目次

紀念吳俊才先生

—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所所長

吳玉山 001

那樣溫柔，那樣執著

吳德里 003

愛國與愛才

吳涵碧 007

想我的父親

吳玉山 014

吳俊才傳

王壽南 018

中國「大陸問題」學術研究的推手

—吳俊才先生

李慶平 024

永懷風格與風範

歐陽勛 028

半世紀的交情

陳裕清 031

淡淡的交往、深深的關懷

張則堯 032

寧靜致遠—懷念吳俊才先生

吳克 Richard L. Walker

吳玉山譯 033

憶叔心師

兼論其在印度史及東南亞史上的貢獻

李國祁 038

師恩銘記緣長久

閻沁恆 043

印度歷史的沈思

—吳俊才先生著「印度史」讀後

王壽南 046

吳叔心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方雪純 052

俊才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尹慶耀 059

濁浪中的清流

桑原壽二

張隆義譯 063

追念吳俊才先生

關 中 067

多是過江猛龍

—漫記政大東亞所的早期師友

唐柱國 070

無限懷念吳師叔心

施哲雄 078

想念吳主任

—回憶六十年代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片段

殷文俊、李金桐 082

出使薩爾瓦多

李慶平 087

難忘的回憶

胡有瑞 091

經師與人師

—瑣記吳俊才先生主持陽明山莊的日子

金開鑫 094

長懷 叔公

焦仁和 100

「斷交部」變火車頭

—追念吳先生在考紀會

余承業 102

任人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能忍

—追念吳俊才先生

石永貴 104

懷念馬均權女士 108

愛家，就是要會燒一手好菜

吳德里 109

母親的故事

吳涵碧 112

媽媽的味道

吳玉山 117

吳俊才先生年表 121

紀念吳俊才先生

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所所長

吳玉山

家父吳俊才先生，是一位新聞記者，歷史學者，印度與東南亞的區域研究專家，並且創建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他歷經了許多在政府和執政黨中的重要職務，但始終是一位謙謙儒者，學術中人。從他在民國 85 年（1996）過世，到今天民國 105 年（2016），剛好二十年。他的親人與故舊門生都感覺到應該對這一位對學術與社會都有巨大貢獻的人物加以紀念。在父親的眾多學術研究和 work 經歷當中，我們選擇的紀念主題是「紀念吳俊才先生：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所所長」。

這個選擇反映了我們認為家父在中國大陸研究和創建東亞所上，帶來了最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我們認識到他當初所開創的志業，在我們國家當今的處境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需要人們的關注與投入。東亞所的設立，是為了培養研究中國大陸的人才，並貢獻於全球的中國研究。今天，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台灣、甚至區域與全球，都無可選擇、必須積極地深入了解。然而，在最需要瞭解對岸的台灣，我們卻缺乏企圖與見識，眼光與視野，來做當年家父那種的規劃和佈局。多年來台灣處理大陸事務和兩岸關係的中間骨幹，多是出自東亞所與國關中心所培養出來的人員。這裡可以看到家父的識見，但也讓人感到後繼與擴展的不足。紀念家父，因此帶來了這層更為迫切的含意。

這本電子檔的紀念集，包括了在民國 86 年（1997）所出版的《懷念吳俊才先生文集：愛國與愛才》中的文章，以及一些後續的紀念文字，還有我們姊弟三人在《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出書時所寫的序文。在我們的腦海中，父母親的身影和話語都是一起出現，也讓我們一起懷念的。我們想藉著這個機會，也表達對於母親馬均權女士的想念。

這本電子紀念集，是放在刻有「紀念吳俊才先生」的青花瓷隨身碟當中，以便於大家攜帶與閱讀。我們在此特別感謝各篇文章的作者，大力支持「紀念吳俊才先生」紀念會的東亞所寇健文所長，幫助蒐集資料與籌備紀念會的陳志潔、鍾延麟、孫采薇等老師，東亞所的張惠梅助教，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鄭榮欣與潘崇易兩位同學。由於是電子檔，我們也希望這本紀念集可以時時增補，並在適當的時候印刷出書，或是出成電子書，讓它能夠有更廣的流傳。



東亞所的早期群英們：俊才先生居中、其左為鄧公玄先生、右為郭華倫先生

那樣溫柔，那樣執著

吳德里

父親過世倏忽已廿年，以往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到那棟老公寓去看看。打開臥室所有的門窗，依舊散不掉那股撲鼻的藥味，父親的手仗倚牆而立，氧氣調控機兀立在床邊，「荒漠甘泉」的書本仍攤開在迎靈回來的那一頁，一切似乎如舊；只有灰塵，一層層蓋在別後歲月上。

二十年已經過去了，不論沈睡或失眠，父親彷彿已經與我絕緣，形影全無；但是他卻又另闢管道，與女兒對話。我常常在校對父親的自傳文稿時，想起他陷入沈思的神態；洽公與會，經常不期而遇父親舊識學生共與追憶往事。父喪，自是大慟，慟後一年，彷彿得了失憶，完完全全不記得他臨走前受苦受難的容貌，清晰記得的則是在家中時每天早晨他喚我起床，手輕輕地拍著面頰，分拂散落在額際的髮絲，先是輕輕若撫，叫人微有所覺；這樣溫柔捨不得驚醒女兒的夢境，這樣輕呵好教我醒來第一眼就看到父親慈愛的笑容……。

我們三姐弟自幼至長在父親愛的教育下成長，對父親的愛都是直接而流暢地表達，父親也欣然接受不吝表揚。我居長，父親常常認為，我「理應」最照顧他，因為三個孩子中，就屬我自幼最「折騰」父親。他常常回憶，在印度新德里一百度氣溫的酷熱時節，我滿月後母親去大使館上班，白天餵奶、換尿布，都是父親一手包辦。他不但左手握奶瓶，右手執筆寫新聞稿，父親那份特派員的薪水大部分也都拿來買奶粉；我喝得又急又兇，「兩天一罐 SW 奶粉」！四十年後他還記得奶粉價格昂貴，以後改吃羊奶，照樣把初為人父的他喫得吃不消。

想必因係牧師之子，父親不管自己工作多忙，總是注重家教，言教身教，曾無稍懈。他心念正直，洞澈人情，恆有慈悲，表現在和我們的接觸上，就是極其溫柔，輕言細語。三個孩子從笑到大沒有一次挨過體罰，對我們來說父親說句重話，眼神凌厲，就已經是嚴重的譴責了。然而回想起來，三個孩子中自幼最不受教，恐怕還是長女的我，總想「不聽話」地走上一條自己的路，最終還是繞回來。

父親雖然極為尊重我們的成長空間，但是傳統上他認為該堅持的，寸步不鬆。他對自己要求完美，要求表裡如一、忠誠勤毅，一絲不苟，有段時間到了不曉得放鬆的程度。我記得最深刻的是國關中心尚未改隸政治大學，寄寓在忠孝西路中央日報大樓那段時期，父親全心全力推動工作，一天終於因為胃出血從辦公室直接送到台大醫院急救。我陪母親趕到急診室時，只看見他被推入手術房，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床單下露出父親穿的襪子，足踝處破了一個大洞。我在候診室的長廊前

苦苦站了個把鐘頭，希望有什麼消息先承受下來再轉告在室內等候的母親。沒有想到操刀的陳楷模醫師興沖沖提了才割除下來父親的三分之四個胃，在我臉前一揚，「手術成功」！他說，還把戴了手套的手指從粉紅的胃壁中戮出一個洞給我看——「不割不行」。

手術過後有段恢復期，那時候胃部切除是大手術，元氣未復的父親一方面心急公務被耽擱，一方面術後消化吸收反應有異，心律有時快到心慌。醫生認為毛病不大，惟應加強心理建設以及一段時期醫囑之下鎮靜劑的服用。我記得每隔一星期，晚上我陪父親到台大醫院林憲醫師在南昌街附近的寓所，「談談話」。父親說林醫生勸他凡事看開一點，不要責任心太重，「我怎麼辦得到？」

過了一段期間，他就興緻勃勃展開木柵萬壽路國關中心大樓的建設計劃，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也開始招生，在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順利「創所」，台北木柵兩頭跑，他把自己的健康問題，又置諸心底。

東亞研究所成立之初，我們家住在距金華街不遠的麗水街彭孟緝將軍官邸後巷寓所，客廳裡一套塑膠皮沙發，一張不起眼的餐桌，很是簡單。他動過手術後的新年，下午父親正在書房寫稿，門鈴乍響，我負責應門，門一拉開客人親切的笑臉好熟悉，是經國先生途經附近，臨時造訪。我到現在還記得送走客人以後，父親說：「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才對得起長官的託付」。那種士為知己的熱忱，全然流露。

父親一直都很得上級長官的信任，相對的，他對於任用邀請約聘的學者、部屬，也都是愛才、惜才、敬才出自至誠。學者們都有個性、風骨，父親的本性則相當內向，要把有些誰也不服誰的菁英組合在一起，他常常說「誠懇最重要」，一再提醒我們待人做事，「多替別人設想，少替自己打算」，嶄新的智囊團就在樣相互推重間逐漸成形。國關中心建設時即已包含了政大東亞研究所辦公室、教室，父親特意將學生宿舍建築在餐廳和辦公大樓之間，食住健身設備俱全，每一位學生都是他眼中未來的國家棟樑，誰在夢想到金三角加入游擊隊，誰又交了女朋友，他全一清二楚。看到精采的論文，父親會拿回來要我好好拜讀「寫得多好！」東亞所早期的師兄就已經人才濟濟，段家鋒、唐柱國、施哲雄、吳安家、林國雄、趙春山、張良任、沈銘鐘、侯家國、熊鈺錚、游海龍、郭冠英、施達郎、洪克晴、張邦文……或狂或狷，都有過人處，我忝為師妹混跡其間，跟著讀書旅行，好歌笑話聽了不少，耳濡目染快意逍遙，最後嫁給外交研究所的慶平，父親一開始，還真意外。我幼時因病高燒不退，傷害到聽力，父親從來不曾把這項缺憾當成我學習中的障礙，照他的看法許多問題都可以「不是問題」，一個人只要決心向上就可以戰勝自己。我在校最感頭痛的是英文聽寫測驗和數學，尤其是初一時母親特別到英文老師家說項，結果這一位脾氣特別暴躁的老師，索性搬張椅子坐在我

的桌前大吼單字，有時候被她嚇得複習好的功課都忘光了。返家淚如雨下，父親擁著我說：「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必將為你開啟另一扇窗。」又說：「你的聰明才力可以幫助很多人，千萬不要自憐自艾。」我從他那裡既得不到同情，只好憤憤回室加倍時間唸書，也閱讀更多參考書以補課堂上漏聽的遺憾，笨鳥慢飛，終究還是能飛了。

回首前塵，父親硬是迎向挑戰的教育方式，對我生影響鉅大。他甚喜予我事上磨鍊，要求我們志向要高，行事要平易踏實。高中三年，我的零用錢都只夠我買車票吃一碗陽春麵加滷蛋，大學四年，添一件新衣服彷彿在做虧心事，得央求母親求了又求，才能得償，若有額外花費，都要稟明確實用途，才能拿到現款。居家灑掃，逢年過節大掃除將書架上書全清列一遍，父親盡量要我多勞動，說：「這是榮譽，練出本事來」。他不喜歡浪費，「由奢入儉難，」用餐絕不可剩一粒飯，因為，「一飲一食，當思來處不易」。

等到我結婚的一天，父親在書房弄了半天，寫了一封給女婿的家書。用大紅箋沾著濃墨，上言：「慶平賢婿：依照我們的傳統習俗，女家應準備嫁妝，以示把最有價值的東西，交給女兒送給女婿。我想了又想，我們最珍貴的寶貝，就是我的女兒，我給她的教育，家風所培養的才德，是我認為最有價值的財產，現在就把她交託到你手上了……」。慶平接到這樣一紙別緻的不得了「嫁妝」，反而高興的很，公公婆婆也開懷接納，就這樣父親又送我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婚後一年慶平奉調華府，我們拎了兩口皮箱上路，在學校附近租了簡陋的公寓寄身，環室只有一張舊床墊，一張破沙發，和二手貨店揀來的一盞燈。半年後醫生告訴我們有了第一胎時，大雪紛飛、數小時內雪深及膝；因為冬衣運寄丟了，我們尋到黑人區中救世軍經營的二手店買舊衣禦寒。也因為自幼在惜物的環境中長大，這些「簡樸方式過好日子」的生活，帶給我們小家庭的不只是許多創意的驚喜，也使兩個人都能心情振奮，配合一致地完成奮鬥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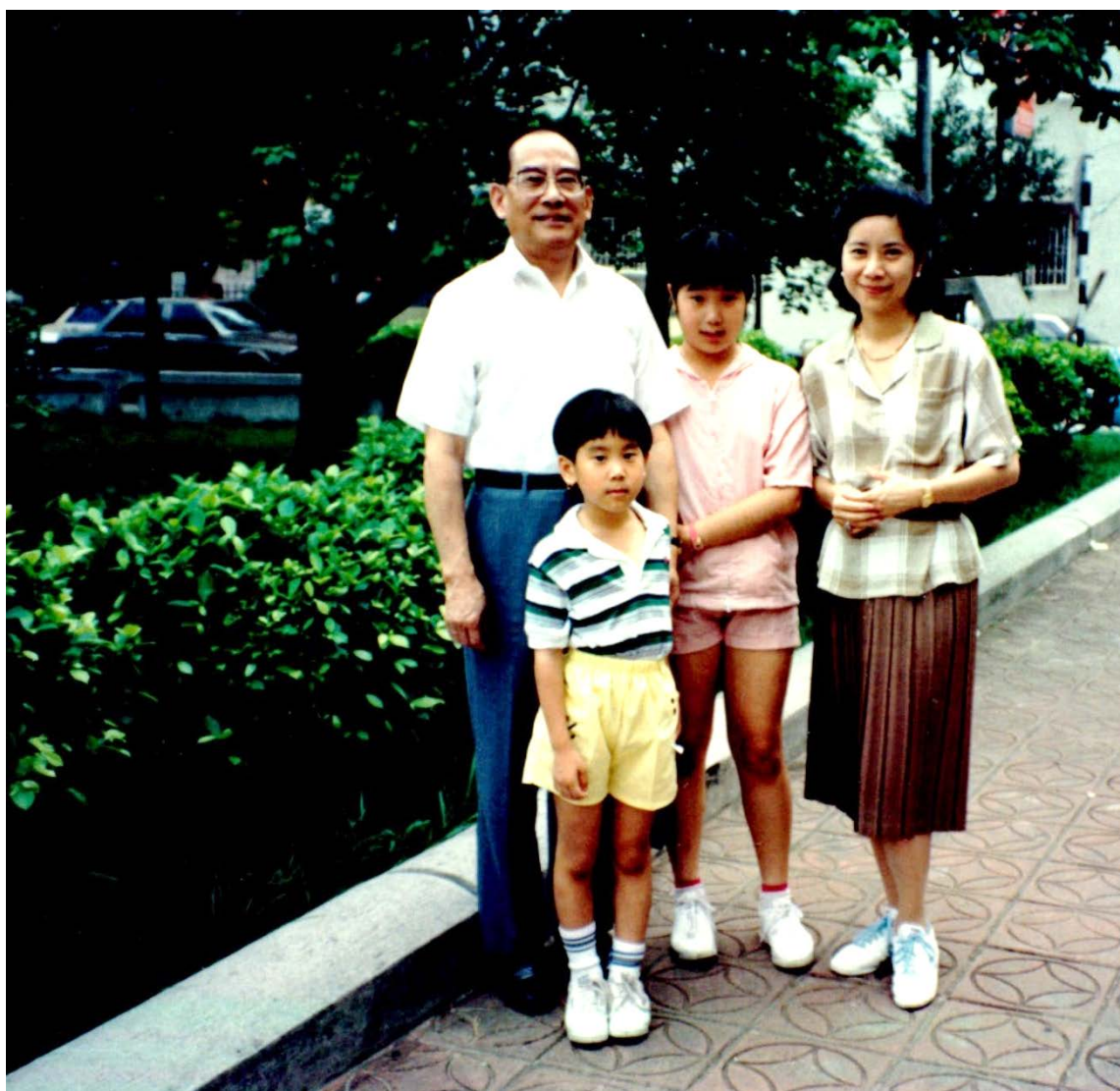
從蔣公去逝，中美斷交，到解嚴走向全面民主化，國民黨在海外工作固然是驚濤憾浪、激情震蕩，國內也波濤洶湧，推向轉型。父母親家書不斷，尤其是父親，他每封信都流露出為我們能接受大時代的衝擊和洗禮，而能突破難關的欣慰，他自己從重慶進入政治大學時所滿儲的理想，在接受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職務時更加漫延泛濫；母親去逝後，他更是把悲痛全化成對工作的熱愛，以做一個清白高尚有理想的國民黨員為榮，能發多少光熱，就燃燒多少光熱，他從人才鼎盛中看到國民黨所堅持的民主化成功的希望，縱有小挫折，「民主一定成功」。

我們終於能踏上歸程，回國最愉快的期待，就是可以陪侍父親，應該是我們來照顧他的時候了。卻沒有想到父親體力的衰退，在短短數年變化快速，也更添增他

心情上的磨難和不堪。他還是那樣溫柔，用那雙多皺的手握著我，說：「教你一套手穴按摩，可以強身」。拿出一份「社區共同體」的講稿來：「非常好的觀念，要注意看」！但是很快的，他說：「我很累，要休息了」！

父親終於如願以償，和母親同穴而息。長安公墓松風如濤，遠眺淡水河雲天平靜。坐在父親數年前常坐的階前閉上眼，彷彿又見到父母親併肩執手而行。

美好的仗既已打過，父親，您好好休息吧，不要再擔心了。



俊才先生、外孫大智、外孫女美儀、長女德里

愛國與愛才

吳涵碧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這是政治大學的校歌，除了週會，鮮有人平日唱校歌，我親愛的爸爸吳俊才先生卻是經常一面彈鋼琴、一面高聲、嘹亮、忘情地唱著校歌，尤其是唱到「完成使命，擔負責任」之時，一定要加上花式顫音，表現他完全地投入其中。

父親還喜愛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後來知道中共把這首抗日名曲用為國歌，每當父親引吭高歌時，我們都想捂住他的嘴，要他小心。

當然，父親是最反共的，他陶醉於愛國歌曲，因為他真正熱愛國家。我很少看到有人如此忠黨愛國的，雖然在父親晚年，國民黨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外界也開始批評國民黨，他提起國民黨，仍然是「本黨、本黨」的，他永遠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

父親愛國的第一步，他要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由於家境清寒，他一直擔任家教，這個家教與尋常家教不一樣，他初二就擔任初一的老師，小小年紀就借住旁人家中，真是十分可憐，否則就沒錢繳學費。

他一直相信「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徘徊於兩大理想之中，後來，父親考取國防醫學院的前身，正值抗戰，屍體遍野，因此每一位醫學院學生都「有幸」陪伴屍體睡覺，他想想太可怕了，決定前往就讀政治大學新聞系，實踐國父的理想喚醒民眾。

在學校裏，他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畢業之後，任職中央日報，他是最為勤勉上進的新聞記者。在一個冰天雪地的寒夜裏，父親入廁之時，竟然一不小心跌落糞坑，被撈起來以後，窮得沒有換洗的衣物，只好躲在被子裡等著衣服晾乾。他自幼多病，環境困窘，原以為活不過三十歲，頗有三分神似他所研究的印度甘地，有一個「苦行僧」的外號。但是他永遠不會被打倒，自年幼時參加「全國第一屆童子軍南京大露營」接受蔣委員長的校閱，到晚年籌建中央日報八德路新大樓，他平靜的外表之下，有一顆熱熱烈烈，報效國家的忠心，這一股頑強不屈的力量，支持父親勇往直前。

父親愛國，父親愛才，他一生之中，為國家培育了數不清的人才。他賞識人才，

培育人才，愛護人才，敬重人才。只要他帶過的單位，無論是國關中心、文工會、中央日報，迄今同事們津津樂道，懷念不已。父親教過的學生，不論台大歷史系、師大歷史系、東亞研究所、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提起吳老師的學養、口才，翩翩風采更是稱道不已。

政大東亞研究所是父親一手創辦，他對東亞所的感情也最深，每一個學生都是他的心肝寶貝，記得東亞所草創之初，木柵房舍尚未蓋好，借用公企中心上課，學生住在附近。他經常出其不意闖入學生宿舍，同學穿著背心短褲，看到老師來了，又是害羞又是開心，對於離家在外的僑生，更有說不出的溫暖。

支持父親傻裏傻氣當老師的背後，有一個比他更性情中人的師母——我親愛的媽媽馬均權女士，沒有學生會不喜歡吳師母的，她漂亮、熱情、善良、慷慨，最喜歡請人吃東西，臉上永遠是笑咪咪的。這位可愛的師母還喜歡幫人作媒，而且樂此不疲，直到她住進醫院，仍有學生拜託她牽線，她也完成了月下老人的任務。我小的時候，不曉得男女不平等的，我們家的門牌是母親定製的「吳馬寓」，父親說全世界就這麼一塊特殊的門牌，父親母親相敬如賓，母親比較像個小女孩（雖然她比父親長二歲），父親一直用疼愛呵護的方式對待母親。我小時候也不曉得夫妻會吵架的，父親母親絕不大聲說話，他們只會為幾件事爭執，現在想起來十分有趣。

——母親天天上菜場，她一定嘟嘟囔囔，「不要給我兩天菜錢」——理由是會用光，然後她用寫稿上電視的私房錢私下貼補，她一定買最好的新鮮材料回家。——買完菜回來，母親指揮工人擺出佳餚，父親一定大快朵頤之後批評，「買錯了，這是蔥，不是蒜」。母親一定不服氣，上電視介紹烹飪的人怎會弄不清蔥蒜，這件公案誰是誰非，到今天我還不曉得，因為我那時太小，腦裡只有功課。

不過，有件事一定是母親錯了，每一回父親逗她，「右手舉起來」，母親一定把白白嫩嫩的左手舉起來，我們哈哈大笑，母親也不以為忤，虧她還是暨南大學史地系畢業的，左右完全不分。其實，母親是最最聰明的，她小地方的迷迷糊糊更彰顯了她的可愛。在她身上，我從來不知道女人是小心眼的，也不明白女人心海底針，她的光明坦白、熱心熱情，擔任鄰長多年，不但我們家公寓樓梯是她負責清掃，連門前的巷子也是她包了。

每年除夕夜，父親準備紅包之後，一定叮嚀母親，其中大小有別，不要混淆。第二天客人來了，小孩來了，母親一興奮，總是兩三個紅包合為一個，非要塞給人家不可，有時還一路追到門外到車中，我們全家最喜歡過年的人就是母親，因為她愛熱鬧、愛朋友。

母親常嫌父親「臉長長的不夠開朗」，其實，父親的同事朋友都知道，嚴肅的外表之下，父親是十分親切的，父親對孩子們可一點兒也不嚴肅，他甚至是非常調皮的，他早上帶我們散步之時，有時會偷偷按人家的電鈴，想不到吧？

父親英俊，母親美麗，他們走出去是一對璧人，但是在家中，他們甘之如飴被稱之為大熊母熊，我們小孩甚至於暱稱他為 Big Bear 他也不生氣。

好好的人怎麼變成了熊，這該怪小弟玉山，現在英俊瀟灑的弟弟，小時候可愛極了，誰看了他都想捏一捏他胖胖的粉臉，有一天他看了一個小熊的故事，從此，死心塌地地愛上了熊，自封為小熊，我是二熊，我姐姐拒絕當熊，不必理她，放假回家，大熊常常牽著小熊的小手，到圓山動物園看黑熊跳西班牙艷舞，然後買一包軟糖回來。

「熊之家」的日子是幸福美好的，除了講究吃，我們沒有任何享受，也鮮少旅遊，但是熊們聚在一起就十分開心，父親竟然還編了一首「家歌」，晚餐之後共唱，他常常說「要為你們製造一點回憶」，他真的製造了不少美麗的回憶，童年的我以為人生本來如此，長大之後才發現，一如我童年的家庭和樂，誠為人間少有啊！

大家都知道母親是烹飪專家，上過電視、出過食譜，其實，父親的菜才是美味，他有幾道拿手菜？雪裏紅炒肉絲、烏賊燒肉、炸油雞確是絕活，父親的菜一如他的工作，篤實與認真，吃到最後一口仍是熱烘烘的，十分入味。父親炒起菜來，驚天動地，火光刀影，頗有大廚師的架勢，他自童子軍時代就是負責伙食，無怪一身好功夫。

我記得，他回憶就讀政大時，每次開夜車，同學們一定會煮一些蘿蔔燒肉，擺在腳下炭火中燒，到了午夜，肉香了，去廚房偷一點飯吃蘿蔔，美味極了，害得我每次見到這道菜，總覺得有腳丫子的兒味，不過，父親的手藝確是一流的。

我就讀一女中之時，經常晚上讀到十點多才回家，走進巷子，遠遠就看到家中二樓有一盞燈光，父親總是站在窗口，焦急地痴痴等著我歸來，他會親自下廚，為我炒一盤香氣四溢的「爸爸燴飯」，好吃極了，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可口的燴飯，裏面有太多疼愛女兒的親情。

高中時代我數學不行，為了緊張數學課，每天一早瀉肚子，上數學課時，老師認為「易知」的部分，我永遠「不知」，每次交了數學考卷，回到家，剛丟下書包，眼淚再也忍不住滾滾落下。母親一面安慰我，「數學是頂麻煩的，我看到會計系算那被單一般長的數字就害怕」。

父親也一定在旁邊說：「我高中畢業時，數學不及格，學校為此召開會議，最後決定讓我畢業，因為全校最有機會考上大學的就是我。」

父親母親一搭一唱，非把我弄得破涕為笑不可，多麼可愛偉大的爸爸媽媽啊！後來看到瓊瑤寫「窗外」一書，描寫她在二女中時，因為數學科紅字，被父母責怪冷眼相待，對照之下，我實在太幸福了。

我那時在一女中當儀隊，每次演出，父親比我興奮多了，由於我一向笨手笨腳，他總會開玩笑，「啊，剛才那個把槍掉下的，我們以為準是你」。眉宇之間依然有掩不住的愉快。

他從來不催促我讀書，相反的，他常常推開書房的門，拉著我的手，逼迫我看一段電視節目，他知道每一個孩子的優點缺點，他把孩子也當人才培養，從來不大聲責罵，更不用提用鞭打，他總是鼓勵我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均權女士、次女涵碧、長子玉山、俊才先生，台大法學院，民國 69 年

我大學畢業之後，有一個機會去中視服務，分派在研考單位工作，我做了三天，實在沒興趣，再加上曾經看母親製作烹飪節目，深深了解看似熱鬧、五光十色的電視並非我所喜，因此當下決定不幹了。

當時，父親被派往薩爾瓦多擔任大使，我與弟弟玉山留在台北，舅舅馬星野先生

一向疼我，卻也氣極，「那你小姐想幹什麼？」

我心裡想，「我要做有意義的事。」卻不敢出聲。

舅舅見我不開口，懶懶地說：「那你打電話告訴你爸爸。」

我打了電話，父親真是可人兒，他說：「不做就不做嘛！」知女莫若父，他曉得我在想什麼的。

後來，我到了中華日報，許多人來參觀在下我，這個腦筋「阿達阿達」有問題的小女子，放棄優渥的待遇，跑到當時發薪困難的窮報社，怪哉！

我精神抖擻地開始幫忙編兒童週刊，這才是興趣所在啊！兩個月後，主編問我：「你來寫點歷史故事吧！」我記得童年之時，父親常抽出一冊冊二十五史，講許多精彩的歷史故事，我聽的興趣盎然，資治通鑑之中，許多有意思的篇章，似乎也值得介紹。

當晚，我又搖了電話到薩爾瓦多，父親很高興地說：「好的很，就取名為吳姐姐講歷史故事吧！」於是，拍案敲定。我開始每週日一篇在中華日報連載，一直到中華日報改版，改在國語日報連載，迄今為止，連載了一千多篇，從未中斷過一回。

我並非歷史系科班出身，我其實並沒有資格寫這樣的大書，完全是父親的信任，鼓勵了初生之犢，我是中國的孩子，我是我爸爸媽媽培養的兒女，我要寫中國人的故事，讓中國人對中國產生溫情與敬意，本著這一股信念，我勇敢地寫下去。

皇冠出版社推出四十一本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之時，舉辦了一個茶會，父親也參加了。事後他略帶遺憾地說：「你怎麼不找我上去講，我會講得很好的。」

「啊！那多不好意思。」我馬上嚷嚷。

如今回想起來，應該請父親上台的。由於父親母親俱是名人，給我帶來極大的壓力，我極儘量避免這一層光環，最恨旁人在公開場所提及。

現在終於悟到，這些全是我心中的魔，反正，我的確以這樣的父母為榮，反正我也沒有比別人不努力，愛講閒話的誰又擋得住？

撰寫吳姐姐講歷史故事的同時，我在華副寫「筆陣」，用的是「王純」的筆名，

知道的人很少，甚且有人猜測是主編蔡文甫先生的別稱。我一本愛國之心，直說敢言，有一天，父親終於說話了，「有人知道是我女兒寫的，以為是我授意，天曉得，你看都沒有給我看過，害我得罪多少人。」

父親的表情很有趣，看似生氣，又有一點得意。他拿我沒可奈何，他也欣慰在下頗有乃父之風，至於幫他得罪人，只好抱歉了。事實上，一向溫文的父親，在家中罵起貪官污吏聲勢驚人，他火起來痛斥國民黨風紀敗壞，這也是人所共睹的，他時時掛在口上，「一個人不愛國家，沒有價值觀念，就只是豬。」放眼天下豬多多矣，但是這一種人生觀念深入我心，牢不可拔影響至深。

「熊之家」最美滿輝煌的燦爛，在母親過世之後畫上句點，母親對我們的愛是偉大的，她一向自喻為「健康寶寶」，從來不傷風感冒，總是仁慈地說：「你們要上班、要上學，生病都讓我來生吧！」結果中年之後，母親多病，不過生性樂觀的她在床上依然談笑風生，喜歡講笑話，「剛才救護車的駕駛以為爸爸才是病人，哈！」

母親始終沒有老去，依然漂亮，卻抵不過病魔，終於離開了我們。母親走了，父親的靈魂彷彿也跟著走了，母親走後第二年，父親膽結石緊急開刀，當時姊姊在美國，弟弟在服兵役，我一個人簽下了手術同意書，在等開刀房門外，那是一個可怕的陰陽界，或送入太平間，或送入加護病房，我祈求上天，「天啊！別讓我失去媽媽之後，再奪走我親愛的爸爸。」

結果，父親開出一百多個膽結石，差一點就走了，手術之後半個月，連手術醫生都是苦笑對我說：「危險期沒過去」。最後，他一條命撿回來了，他卻不再是我所熟悉的父親了。父母之間不只是恩愛更是互寵、互疼，原來不只母親像是小女孩，父親也像一個小男生，然而茫茫人海，天地悠悠，怎能再有一個母親，如此好性情、好脾氣，不計較金錢，無怨無悔，死心塌地的照顧爸爸呢！

三個孩子之中，我因為一直留在台灣，一直待在他身邊，我曾經是他最疼愛的小女兒，我也衷心願意多多孝順父親，到了後來只能偶爾到餐館打食，購買他所喜愛的食物。挖空心思去找尋父親的禮物，但是，我知道，這些全不能給他帶來快樂，他的困難煩惱觀世音菩薩也解決不了，我一旁歎息愛莫能助。

父親晚年苦於肺氣腫，氣喘如牛，咳嗽膿痰，實為狼狽，我常忍不住歎息：「你真該替董氏基金會拍攝戒煙廣告。」

「妹妹，那香煙公司會打死我的。」父親的幽默真苦。

大熊走了，未嘗不是一種解脫，他去找母熊了，我相信他們在天國快樂地相聚。三隻小熊也長大了，風風雨雨，我體會了世事多艱，人生險惡，有時不免興歎，似乎凡是愈想為國家社會盡一分力量，註定得受更多的磨難，這時，腦中往往浮現父親彈琴的模樣，「完成使命，擔負責任，先要我全校員生親愛精誠....」

我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忝為父親的小校友，我是父親的小女兒，希望也能如父親一般，愛國愛才，發揮他生命的特質。我深信，大熊母熊在天上含笑注視著一切。



涵碧同學、涵碧、俊才先生、德里

想我的父親

吳玉山

猶記 1996 年父親赴美國休斯頓療養，不到一個星期卻傳來病危的消息，當時心頭的震撼驚懼，至今還是不時湧現。他臨終前勇猛的掙扎，曾經讓美國急診室的醫生動容，更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景象。在回程的飛機上，手捧著父親的骨灰，螢幕上卻正上演著一個美國家庭歡度聖誕的情景。我只記得自己淚水奪眶，口張的大大的，硬生生地不讓哭出聲來。如今廿年過去，我在夢中還常固執地認定父親仍然健在，而他的去世才是南柯一夢。

父親和我太近了。從小就有親戚朋友說我們父子好像，不只是鼻子嘴巴之類，還有神情舉止。而父親每次聽到這些話，都不自覺地展露出得意的神色。他不知道這個時候最得意的其實是他的兒子，因為從他的神情當中我看出他對我的肯定。做為人子，還有什麼比父親的肯定更重要的呢？在我的記憶當中，父親從來不曾對我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反正做的好就鼓勵，做不好就安慰，你可以放心地依靠他的支持。後來自己年紀變大，卻感覺到心情上對他的依賴仍舊。我同時慢慢發現，父親也依賴子女對他的關心。每次他拉著我的手，輕輕拍撫的時候，就是我們父子心神交會的時刻。

讓我談一談我所了解的父親。我的父親從出生就受洗，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個在顛沛流離中成長的青年軍，一名勇猛敬業的新聞記者，一位中華民國難得的東南亞和印度史專家，並且在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就成為極受學生歡迎的年輕教授，先後在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授課。他後來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學術研究機構，然後又從政，先主持中央文工會，後來再轉任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回國之後，他擔任了中央日報社的社長，然後接任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副秘書長。他接著又接著又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負責訓練幹部。在短短幾個月的退休之後，父親又被徵召出來住持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父親最後擔任的工作是總統府的國策顧問，以及中國電視公司的董事長。這一連串眩目的工作，讓我為他感到驕傲，然而也讓我常常問自己：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能耐？最近我愈來愈感覺到，關鍵在於我父親是一個基督徒。他不是一位一般的基督徒，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這個牧師，我的祖父，在父親的懷念中，一絲不苟，極端認真，善於演講，對他的會眾影響極大。父親從小受他的潛移默化，是拿做牧師侍奉主的專注和獻身來從事他的各項工作的。接下來在求學過程當中，父親選讀了當時極為少見的教會學校。那裡校風嚴謹，一絲不苟，所聘請的老師嚴肅而認真，學生受到極為嚴格的訓練。除了知識的拓展外，對於學生身心的規範，有如軍營。父親刻苦自律的精神由是養成。這些都是宗教對他的影響，也是他成功的

秘訣。在現代中國的重要人物當中，老蔣總統是一位教徒，李總統也是一位教徒。基督徒在中國社會中就人數來說是不多的，但是基督徒從政一定有他的專注和執著。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擇善，在有些人看起來的固執。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我看過父親在臺大授課時準備的筆記，那是書法和學術的結晶，簡直可以拿來公開展覽。除了數十年不斷的日記外，他從黨部退休後自己寫自傳，厚厚幾大本，一個字一個字好像刻出來的，寫的是娟秀的楷書。他的工作真是認真。在五十五歲的時候去薩爾瓦多當大使，用西班牙文在當地的國會演講，完全是拼了老命惡補出來的。他辦國研所，開國際學術會議，弄到胃出血穿孔。有時他在中午小睡休息，脖子上還打著領帶，不肯解下。他的認真帶來緊張，因為緊張而搞壞了身體。但是他的敬業是沒有話說的。

這樣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卻有著極其充沛的感情，並且從不吝於對自己的家人表達。在家中，他和母親都是細聲細語，從沒有大聲吵過。母親樂觀健談，好客而有俠氣，寶貝子女，有時又有點大而化之。父親則是細膩體貼，井然有序，常為子女過度操心。我從不記得父親曾經對我們大聲講話，更沒有打過小孩。本來我還以為是天經地義，哪有爸爸會打子女的，後來才知道是自己運氣好。他的言談幽默，尤其懂得和小朋友開玩笑。他講壞話的工夫也是一流，這點很重要，因為他對子女實在太溫和，要我們知所節制就要靠一些講壞話的工夫。但是因為這些壞話實在很有趣，所以我們一方面被損了，一方面還不能不佩服他能想到這種幽默，當然接下來就是乖乖聽話。



俊才先生在東亞所參加長子玉山畢業典禮，民國 71 年

他喜歡動物，又疼兒子，曾經和我逛了不計其數次的動物園，有一回在大雨滂沱中弄到父子倆全身溼透，還在欄邊流連忘返。父親在庖廚中相當有一手，雖然由於有一位在電視上主持烹飪節目的太太而不常展現功力，但是為了疼惜小孩還是會為我們準備宵夜。他也愛吃，時常打聽到那裡有好吃的就帶我們去。他的重點是味道而不是排場。當年永康公園旁白鬚老頭賣的油餅和信義市場裡風格獨特的餛吞都讓我們父子垂涎三尺，曾經在寒風凜冽中邊跺腳取暖邊大快朵頤。

父親的豐富情感又表現在彈琴唱歌上，這恐怕會出於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然而作為一個牧師的兒子，這些本事簡

直就是天生的。父親曾經隨祖父報過佳音，又做過教堂中的司琴，他可以聽了一個曲子，然後就馬上彈出來，順便配上和絃，這些都不是經由正規訓練學來的，照他的話說，都是「土法煉鋼」的。父親老喜歡拉了我唱合唱，他自己配樂，其中一曲就是「懷古」，還在幾個聚餐的場合中表演過。我當時覺得很窘，現在想起來卻是溫暖地不得了。在最後幾年，即使在病榻上，父親還是喜歡拉了我的手要我和他一起唱歌。從歌唱當中，我真正感受到他的時代、他的情感。閉起眼睛，我現在還可以依稀看到小時候在父親的帶領下似懂非懂地唱政大校歌時的情景。

父親的脾氣極端溫和。在他的下面做事，絕對不會看到他擺官架子，發脾氣也是極少。他對於學生的關心和照顧是有名的。記得東亞所剛成立的時候，一切葦路藍縷，因陋就簡，研究生的宿舍也暫時安排在政大公企中心旁邊的民房裡，和我們在麗水街的住處很近。父親常和母親三不五時地去探望同學，有時我們小孩子也跟著去，對同學關心照顧，無微不至。他對下屬和學生的好，我們在一旁看了也視為理所當然。只有到了後來解事以後，才知道這是極其難得的。

固執而又溫柔，緊張而又幽默。這些不平凡的特點即使是在他晚年飽受病痛折磨的時候也沒有消失。然而這幾年來我們確實看到他的掙扎和痛苦，我們的心情也隨著他而掙扎和痛苦。他走了，就像是一個馳騁過無數疆場的老將終於可以安歇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這幾句話真正是活生生地描寫了父親，他終於可以安息了。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一定要我走什麼路，好像我不論做什麼重大的決定都很符合他的期望。然而在他的潛移默化之下，我卻走上了他研究學術的同一條道路。我猜他是很成功地這一路上默默引領著我，走向他最希望我走的方向。父親的事功很多，但是他最持久的貢獻恐怕還是在學術方面。從開創印度和東南亞的區域研究，到把台灣的大陸研究學術化和國際化，以至將中山學說帶入大學校園，在在都是開創性的、制度性的、超越個人學術表現的貢獻。忝為學術界的一份子，我現在深切地體認到這些成就得來不易。另一方面，我感受到在這些學術成就的背後，是一股熾熱的愛國心，那才是他一切努力的動力泉源。「學術報國」在父親這一代人的身上不是空話，他是真正身體力行，做出成績的。父親雖然過世多年了，卻仍然是我終生的模範。希望他的在天之靈，能夠聽到我的這句話。



均權女士、德里、玉山、涵碧、俊才先生

吳俊才傳

王壽南

吳俊才先生，號叔心，湖南省益陽縣滄水鎮人，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聿修先生為經史名儒，亦為牧師，在鄉從事教育工作，並宣揚基督福音，甚受鄉里敬重。母曹氏太夫人，系出望族，端莊嫻淑，待人溫厚，鄰里其賢德，明藥性、通醫理，常為義診，鄉里重之。

先生少而穎慧，童幼受洗為基督教徒。及齡，入志成小學，民國二十三年入益陽信義中學，該校為瑞典教會創辦，學風淳美，校譽極隆，先生在學期間，不僅學業優良，屢獲獎學金，且參與「日行一善」活動，膺選為全校青年會及學生自治會會長，已嶄露其領導才能矣。

三十年夏，先生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入新聞專修科，以成績優異，深受業師馬星野教授之器重，後先生娶妻馬均權女士，即馬星野之妹。先生以第一名卒業，分發中央宣傳部任職，後奉派參與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參政會之新聞採訪工作，以報導翔實，析論深入，見解精闢，獲羅家倫先生之賞識。抗戰末期，先生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號召，毅然投筆從戎，奉派至四川璧山青年軍二〇一師，在軍中因其所長，創辦青年軍報。三十六年，我國與印度建交，羅家倫先生為首任駐印大使，邀先生以中央日報特派員名義隨同赴印，先生在印除盡力外交、新聞工作外，公餘入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修研印度史，獲碩士學位。三十八年，中印斷交，先生由印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修研國際關係，以東南亞區域研究為主，積年苦學深思，奠定深厚學術基礎。

民國四十年，臺灣正處於危急狀態，蔣中正總統號召海內外同胞共同努力，建設臺灣為復興基地，先生深感國難當前，遂毅然離英返國。途經香港，接中央日報急電，囑留港督辦航空版，其時臺海情勢緊張，中央日報在港立足有其重要意義。任務完成後，先生於翌年返臺，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五期受訓，結訓後出任中央日報主筆，兼任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校教授，講授印度史、東南亞史，為國內倡導印度史研究第一人。其所著《印度史》、《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克什米爾與印巴關係》、《甘地與現代印度》、《東南亞史》等書，均屬極有份量之著作，對印度史與東南亞史研究貢獻甚大。

先生對領導印度爭取獨立的領袖甘地推崇備至，甘地提倡非暴力主義，處處表現出超人的道德勇氣，愛朋友也愛敵人，這種偉大的胸懷是古往今來的政治人物身上很難見到的。先生推崇甘地，似乎是在對臺灣社會作出一個前瞻性的教育，當

時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臺灣社會表面上呈現出和平的假象，但深層裡卻隱伏著動盪不安，先生宣揚甘地思想，實在是想對那些滿懷仇恨之的人士給予啟示，希望臺灣不要走上暴力和動亂之路。這種歷史家的先見和宗教家的悲憫，先生兼而備之，可惜先生當時的身分是教授，只能在教室裡對學生略抒情懷而已。

四十二年，先生兼任國際關係研究會研究員，該會係邵毓麟、李白虹、卜道明、馬星野等人所發起，成立於四十二年四月，以人民團體名義向內政部登記立案，其實該會直屬總統府，研究中共及國際問題，提供政府參考。首任主任為邵毓麟。該會成立之初規模不大，僅有二十七位研究人員，均為政界、學界知名之士，如卜道明、汪公紀、馬星野、黃正銘、王雲五、李白虹、孫桂籍等，先生為最年輕之研究員。四十三年十一月，卜道明繼任主任。



俊才先生居前排左起第四，居中者為經國先生

民國五十年，該會改名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向教育部申請立案，成為私立學術研究機構，成立董事會，卜道明為董事長兼主任。五十三年四月，卜道明病逝，董事會推選先生擔任董事長兼主任。先生接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後，致力於三個方向發展：

一、使國際關係研究所成為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學術中心

五十五年一月，先生在所內成立資料供應中心，負責與國內外學術機構聯繫，提供資料與研究之方便，此一做法頗獲蔣中正總統的支持，指示政府相關部門組成輔導小組，以協助國際關係研究所加速擴展成為國內中共研究及資料供應中心。

在先生積極規劃下，國際關係研究所業務日益擴大，研究資料與研究人員均迅速增加，首先面臨的問題則為房舍不敷使用，當時國際關係研究所辦公場所設於臺北市火車站前中央日報大廈七樓，面積狹小，擁擠不堪，並非一理想的研究場所，經先生奔走洽商，獲得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土地三千餘坪，隨即著手興建房舍，該地鄰近國立政治大學，青山圍繞，風景清幽，為一絕佳的研究環境。五十九年四月，圖書館大樓及研究室、宿舍均竣工，遂行遷入。自此，國際關係研究所獲得獨立、安適、寬暢之永久性處所，不僅可讓所內外之大陸問題研究者安心從事研究工作，而且由於所藏資料豐富，逐漸成為國內外極負盛名之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機構。

二、推動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之國際化

中國大陸情勢的發展並非僅對臺灣發生影響，同樣對日本、美國和其他地區也會產生作用，為推進我國與美、日等國共同研究中國大陸問題，國際關係研究所實有向各國學者伸出友誼之手的必要，先生乃決定召開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以便與外國學者交換研究心得與資料。



先生於第一屆中美會致詞，民國 59 年

五十九年十二月，首先與美國學術機構合作在臺北舉辦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其後每年輪流在臺灣、美國舉行。六十年七月，國際關係研究所在日本東京設置辦事處，置特派員，以便加強對日本學術機構與學人之聯繫。同年十二月，與日本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在臺北舉辦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

討會」，其後每年輪流在東京、臺北舉行。除研討會外，先生為使外國學者瞭解我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成果，遂將原有的大陸匪情分析英文月刊擴大篇幅，改為 Issues & Studies 月刊，深受外國學者的重視。

六十年九月，又在日本發行日文版《問題與研究月刊》，成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大陸問題時必備的刊物。在此之前，美、日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其態度多偏袒中共，經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種種努力，使美、日學者能接觸較多客觀資料與分析，逐漸改變為較公正之態度。此後，國際關係研究所（後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觸角伸向全世界各國，成為國際間知名度甚高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機構，先生奠基之功不可沒。

三、為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植根

先生深知欲加強中國大陸問題之研究，必須培養年輕學者，以現代治學方法從事研究，方為上策。而培養研究人才最好的途徑是從大學入手，於是先生建議在國立政治大學內成立一研究所，招收大學部畢業生入所深造，專攻中國大陸問題，授予碩士、博士學位。此一建議獲蔣中正總統同意，指示教育部辦理，五十七年四月，教育部核定國立政治大學設立東亞研究所，先招碩士班研究生，並由先生兼任所長。自此，中國大陸問題研究遂正式成為大學教育中的一環，而日後東亞研究所果然培育出不少傑出人才。

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先生轉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八月，遂辭卸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其後再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職。總計先生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八年，成績斐然，其最大貢獻在使該所由「情治」機構脫胎換骨轉化為學術機構，並使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由政治性而轉化為學術性。

先生轉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負責執行國民黨的文化宣傳政策，先生認為文化宣傳工作不應徒呼口號，不可淪為形式，應當注意教育，希望從教育入手，推動文化工作，於是積極進行下列幾項工作：

（一）促成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學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以使孫中山思想的研究由政治性走向學術性，成為大學學術網中的一環。

（二）推動在大學各學系中開設「中國大陸研究」課程，使「中國大陸研究」褪去神秘的外衣，讓大學師生自由地由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各方面來探討中國大陸的實況。

（三）協助教育部創立「國家文藝基金會」，以獎勵優良文藝作品，達到提升社

會文化氣息的目的。

(四)為使社會大眾了解當前的國家處境，提高社會大眾的文化水準，特別邀請學者專家組成筆部隊和講部隊，經常以文字和演講方式向社會大眾剖析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

以上四項均非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例行的工作，而係開創性的工作，其中尤以在大學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最為重要，蓋自此以後，以學術態度來研究孫中山思想的風氣大開，使孫中山思想從政治神話的迷霧中走出來，經由客觀、理性的思考，可以肯定、讚揚，也可以批判、質疑，更清晰地顯現出孫中山思想的精義。

十幾年後，中國大陸的歷史學界掀起了一股孫中山研究熱，使海峽兩岸的學術界通過孫中山思想的討論而展開融洽的交流，倘若沒有先生的大力提倡，臺灣對孫中山的研究恐將仍停留在政治偶像膜拜的層次，顯不出孫中山思想的真貌，則當兩岸孫中山研究者學術交會之時，臺灣必居於下風，可見先生具有歷史學者的洞察力，能掌握時代趨勢的方向。

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先生交卸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之職，轉任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其時，我國已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美國與中共正在暗中勾結，因此，我國在外交處境上十分艱困，先生赴任後，致力於鞏固中、薩邦誼，頗著功績，曾受邀至薩國國會演講，備受尊榮。

六十七年二月，先生奉調回國，任中央日報社長，新聞工作原係先生之專業，先生曾任中央日報駐印特派員、主筆，故對中央日報甚為稔熟，就任社長後，即展開革新工作，最主要成果為增加專欄份量，開闢專刊園地，在專欄方面，廣邀學者專家每日撰寫專欄文稿，分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在專刊方面，開闢「主流」、「文史」、「讀書」、「健康」、「旅遊」、「法紀」、「生活」等專刊，各專刊文字活潑生動，深入淺出，頗獲讀者好評。其後，臺灣各報紛紛重視專刊版面，且有報紙標榜其專刊為該報之特色，以吸引讀者，先生可謂有先見之明，實開風氣之先也。

六十八年二月，先生調升中國國民黨第一副秘書長，翌年一月，兼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其時，主任一職由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兼任，僅屬名義而已，院務實由先生綜理，七十三年辭卸副秘書長職，專任院務。

先生在革命實踐研究院七年有餘，革命實踐研究院係一訓練機構，先生主政期間有兩項創新：一為班期密集，類別增加；二為受訓學員與授課講師趨於年輕化。由於先生多年從事教育工作，以平日理論與經驗貫注於院務，遂使當時之革命實

踐研究院造成一番蓬勃之氣象。

七十六年八月，先生自請解退，旋應聘為總統國策顧問，復被徵召出任中國國民黨考核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八十一年二月引退。先生考核紀律委員會特別重視黨員之黨德與紀律，對於黨內不少同志缺乏理想，唯求短利，以及敗壞公德與私德的行為大不以為然，常痛加撻伐，其正直與勇氣受人敬佩。先生曾出版《滿懷希望的時代》、《政治與文化》兩書，敘述他對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看法與主張，可以反映出一位學者從政後對國家、社會的期望與關愛。八十二年八月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至八十五年六月卸職，再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先生自幼體弱，加以勇於任事，不避繁劇，積極有為，認真敬業，凡事不肯尸位素餐，總求創新進取，公而忘私，以致影響健康，前後接受胃部及膽囊手術，晚年復患肺氣腫之症。八十五年八月赴美求醫，在美宿疾轉劇，八月二十六日病逝於休士頓班塔醫院，享年七十五歲，八月二十九日歸柩臺北，卜葬於陽明山墓園。九月十一日，李登輝總統明令褒揚，曰：

「總統府國策顧問吳俊才，性行恭謹，思慮精純，早歲力學篤行，專攻新聞，遊學印度、英倫，精研國際關係，堅實學術報國之志。政府遷臺初期，受命主持國際關係研究，開拓對美、日學術合作，創立東亞研究所，培養高級研究人才，化雨春風，陶成多士。先後從事新聞傳播事業，擘畫周詳，卓著績效。嗣任駐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折衝樽俎，執行國策，鞏固邦誼，尤彰靖獻。平生深思好學，創新進取，講學著作，為世推重。晚歲襄贊國策，忠誠勤毅，喜言良謨，倚畀方殷，遽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忠勤之至意。」

載《國史館館刊》第22期，民國86年6月

中國「大陸問題」學術研究的推手

—吳俊才先生

李慶平

1950年代初期，台灣可謂風雨飄搖，百廢待舉，因1950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才使兩岸間大規模的戰爭可能性降低，也使蔣中正總統有充裕的時間，整經備武。經國先生此時為蔣公在情治方面得力助手，台灣的國家安全局、調查局、軍情局皆為經國先生一步一步的整頓，經營，才有今日的規模。

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撤守台灣以後，有關對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研究，皆屬情治單位。由於在戒嚴期間，一般民眾及學術單位，無緣接觸到中國大陸的第一手資訊，而情治單位獲得的資訊，如何運用，進而產生一定的績效，是經國先生一直思考的問題。

1953年二月十七日，蔣中正總統下手令，設立助其了解國際政治研究單位。經國先生籌劃在總統府資料組內設政策研究室，地址設在圓山遠廬，招集當時才識俊彥之士如邵毓麟、卜道明、馬星野等人為該組織重要成員，資料組政策研究室的功能，是一種類似智囊的組織，也就是後來逐漸發展成具有學術性質的國家「智庫」前身。總統府資料組政策研究室主要研究國際關係及中國大陸問題〈當時稱匪情研究〉，提供層峰參考。分蘇俄，匪情，美國（包括聯合國）日韓及歐洲（包括東南亞）五組，分別由卜道明，王崇五，馬星野，汪公紀，李直夫為各組召集人。

1954年三月，經國先生改組總統府資料組，成立國家安全局，原政策研究室成為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並以在內政部登記的人民團體，國際關係研究會對外，邵毓麟博士為主任，研究人員為卜道明、王崇五、鮑靜安、張棟材、關德懋、吳思敏、馬星野、汪公紀、許念曾、朱少先、黃正銘、王雲五、李白虹、孫桂籍任等研究員。

其中年僅三十一歲的吳俊才先生在1953年即加入總統府資料組政策研究室為兼任研究員，1954年成為國際關係研究會最年輕的研究員，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事業，與中國大陸問題結緣，也影響了台灣數十年來對中國大陸的研究。

1954年十一月卜道明繼邵毓麟任國際關係研究會主任，1955年四月該會開始出版國際關係研究的刊物《問題與研究》，1961年十月的十日開始對外公開發行

2,500 冊。1958 年一月編印《匪情月報》(後稱《中國大陸研究》), 出版 1,500 冊。1962 年十二月出版《大陸匪情分析》中英文版 900 冊。

1959 年原副主任鮑靜安調行政院敵情研究室主任, 擢升吳俊才繼任副主任並兼《問題與研究》主編。同年蔣經國感於「國際關係研究會」屬人民團體, 難以發揮作用, 乃囑卜道明主任以學術研究名義, 向教育部立案, 正式改組為「國際關係研究所」。該機構的設計與改組, 均委吳俊才副主任負責。

1963 年, 卜道明內定副任越南大使, 但因癌症, 入榮總治療, 所務由吳副主任代理。一九六四年五月, 卜主任病逝, 吳俊才先生正式接掌「國際關係研究所」董事長兼主任。

吳先生自 1964 年三月至 1972 年八月, 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八年之久, 使該機構由草創到一定的規模, 專任研究員由不過十餘人擴充到百餘人, 轄有國際、匪情、俄情、經濟研究組, 資料、編譯、出版、合作交換的業務組, 秘書、總務、會計三行政組。

吳先生接任之初, 即延聘中共黨史權威郭華倫為副主任《匪情月報》主編。郭先生係早期中共高級幹部, 曾參加遵義會議, 來台後曾任調查局副局長。另一副主任為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鄧公玄, 負責國際問題研究。禮聘台大法學院院長林霖博士、台大法學院國際法權威雷崧生博士、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陳紹賢、歷史學家陳三井等人參加工作, 為一時之俊彥。

此外他還延聘歸國學人為國儲才, 先後延聘連戰博士、施啟揚博士、高銘輝博士、李鍾桂博士、王人傑博士、關中博士、金開鑫博士、金神保博士等人, 以後都為國家的幹才。

為充實基層研究人員, 特招聘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或碩士學位者為助理研究員, 早期有畢英賢〈俄國問題〉、張虎〈大陸及港澳問題〉、歐鉅龍〈美國問題〉、范利民〈大陸問題〉、張深俊等人, 另有特聘人員李本京博士及公使銜外交官顏富章。

1966 年後,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 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非常關注, 如果有不可逆料的動亂, 不僅影響臺海局勢, 也影響東亞安全。另 1959 年美國學界提出康隆報告, 美國應承認兩個中國, 大陸與台灣可和平共存。此一論點引起蔣中正總統的注意, 加強與國際學術界聯繫, 為國際宣傳的重點。此一重責, 成為國際關係研究所重要業務。

美國、日本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術單位，也正尋求第一手解讀中國大陸的資訊，而台灣此時對大陸的研究，與美、日兩國學術單位合作，正逢其時。因此 1970 年十二月，國際關係研究所向美、日學術機構伸出友誼之手，在台北舉辦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研究研討會」，美國來台參加研討會的重要學者有惠廷（Allen S. Whiting），奧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施樂伯（Robert A. Scalapino），韋慕庭（C. Martin Wilbur），饒大偉（David N. Rowe），華克（Richard Walker）。會後兩國學術機構交換心得和資料。以後每年在台灣及美國舉行研討會。1971 年十一月，與日本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在台北召開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以後也是每年在台灣與日本輪流舉行。



俊才先生夫婦歡迎參加第一屆中美會議的貴賓，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坎培爾所長，1970 年

為便於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聯繫，需要有對大陸情勢分析的英文月刊，故將「問題與研究」月刊擴大篇幅，以英文出版 *Issues & Studies*，並出版日文《問題與研究》月刊，以對美、日學術機構交換為基礎，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觸角逐漸擴展至世界重要國家。重要合作交換機構有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聖諾望大學亞洲研究所，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日本內閣調查室，西德自由大學及慕尼黑大學。1970 年代初，國際關係研究所已成為著名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機構，吳俊才先生對此一奠基工作功不可沒。

在吳俊才先生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時，有鑑於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之重要性，必須先要培養更多年輕學者，使研究工作傳承有人，同時也因應社會的需要，需培植

優秀的對共產理論及對大陸共產黨有批判力的學術人才。因此吳先生在 1968 年向蔣經國先生建議，在政治大學設立東亞研究所，以紮實的學術基礎培養新一代的大陸問題專家，由碩士而博士，一方面招收各大學畢業生，一方面調集相關部門現職優秀工作人員混合培訓。此一建議得到經國先生及老蔣總統同意，在 1968 年七月經教育部核定，正式設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吳俊才先生為兼任所長。

經過一年的籌備，1968 年東亞所招生開學，在教職員的陣容上也是一時之選，有國學大師錢穆、中國史學泰斗陶希聖、馬列主義專家鄭學稼、中共黨史權威郭華倫（原名郭乾輝）、馬列主義哲學專家陳一新（陳獨秀秘）、吳俊才所長的東南亞史。另由任卓宣先生教社會主義比較研究，剛由美國返國的年輕學者關中博士及第一位在台灣研究中共問題拿到博士的曹伯一副教授，行政工作方面有劉岫青及張煥卿先生。

在東亞所創辦初期，也延聘了一些外籍學者，如華克（美國南卡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卜孫尼（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吳元黎（前美國防部助理部長）。

政大東亞研究所的地址，最早在台北市金華街政大城區部，1970 年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台北市木柵指南路建新所址，東亞所也進駐，1975 年國際關係研究所也改制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所一中心，在一個獨立的學園裡培養出一代代台灣的大陸問題專家。

1972 年吳先生調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改制後為文化工作會），主管中國國民黨文宣工作，在其任內使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推廣到各大學，成為正式的課程。

吳先生後又曾擔任駐薩爾瓦多大使、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主任為經國先生）、中央考核紀律會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為蔣經國先生重要幹部，然而吳先生最重要的事功，是使神秘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由情治專屬單位研究，脫胎換骨轉化為學術機構，從而普及成為顯學，也使一個「政治性」的大陸問題，成為嚴謹的學術研究對象。

有蔣總統及經國先生的高瞻遠矚，吳先生的排除萬難的執行力，才有今天臺灣紮實的對大陸研究。也使台灣有足夠的人才，來處理今日兩岸互動的複雜情勢，吳先生已逝世二十週年，特撰本文以資紀念。

載《傳記文學》第 655 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永懷風格與風範

歐陽勛

時流電逝，老友吳公俊才叔心先生辭世，追憶其生前音容笑貌，不禁頓添隔世惆悵之悲。

念民國八十年冬先生七秩壽慶之時，曾奉友儕之囑，試擬先生行誼代序，雖全屬平敘事實，未有半句誇溢之詞，先生仍本其謙抑素性，不欲貽虛炫之譏，刪改原文達三一以上。今先生雖已歸道山，仍理當敬體其謙沖原意，不敢再以該稿增節為代，似宜另換角度，為先生作側面寫照，藉誌永懷風範之思。

叔心先生自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從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新聞科畢業，以第一名成績分發至中央宣傳部任職以後，至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以總統府國策顧問榮銜而逝世於美國就醫之時，歷五十三年之中，依次膺任重要黨政職位達十數以上，順序陞遷，無不卓著功猷，廣受嘉譽。揆其致此之由，似與其所涵詠之主要文化薰陶，造就其超越時流之品格，大有關係。

先生身受世界三種主流傳統文化之陶冶，浸潤既深，感受自厚，時日累積，其精義逐漸糅合而形成為先生之風範。表現於做人處事，則不難察覺其為先生思想風格之重心，謹概述淺見所及如次：

第一、先生誕生於我國傳統的書香之家。封翁聿修公為湖南益陽經史名儒，講究誠心修齊治平之道，敦重忠孝仁愛信義之教。太夫人系出同邑曹姓名門，既習國學，兼嫻醫理，終年為鄉里義診，廣受四鄰崇敬。先生幼承庭訓，在小學、初中階段即已熟讀四書五經，通諳義理，對於儒家忠孝仁恕之道，特深感受，終生服膺。所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特別是忠恕之道的正宗儒家精神，是塑造叔心先生思想本性的第一主流文化。

第二、先生亦誕生長育於基督之家。聿修公不但為經史名儒，且是基督傳道牧師，故先生於出生時即受洗禮，從小耳濡目染，深受基督仁慈博愛教義的影響。後入益陽信義中學，該校為瑞典教會所辦，以求真致善為向，倡導「日行一善」，先生奉行不懈，曾獲「日行一善」全國獎。迨入中央政治學校之後，再受國父「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遺教感召，結合其「日行一善」的素願，更加堅定所謂「人子是生來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的」基督教義，這是塑造先生服務人群之思想本性的第二主流文化。

第三、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戰後我國與印度重建邦交時，以中央日報特派員身分隨同首任大使羅家倫先生前往印度，於撰敘新聞及襄助大使館館務之餘，入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精研印度史，獲碩士學位。在此期間，因應印度史研究的需要，對於佛教文化的源流影響，以及佛學經義的精要蘊涵，殫精竭智，苦究深思；特別對於佛教的慈悲救世、捨己為人的犧牲渡化精神，領悟深刻。在印度的時間雖僅兩年，但因工作關係與印度社會接觸的層面很廣，因研究需要而涉獵到的佛學文化頗深，因之，佛學普渡眾生脫出一切苦厄的慈悲心懷，是塑造先生淑世助人精神的第三主流文化。

這三種主流文化之中，從宗教神道的觀點而言，也許有其杆格柄鑿之處，但從慈悲寬厚、屈己待人的本旨而言，則其神髓並無二致。先生受其浸潤滋育，取同存異，擇精用宏，遂構成先生逾半世紀服務社會，成就許多功果的特殊做事風格與做人風範，值得後人永久紀念。

在做事方面，叔心先生令人特別嚮往的是：

第一、他最著重前瞻遠慮。早在三十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很少人注重冷門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叔心先生別具遠見，獨自鼓吹提倡，建議在國立政治大學設立東亞研究所，費盡唇舌，獲得有關當局首肯，並聘他擔任創所所長；同時，他將當時自己主持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併入政大成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由他兼任中心主任，培養研究大陸及國際問題的高級專門人才。現今負責大陸事務的重要主幹人員，及研究大陸問題的公私學術機構專業學人，大多具有上項淵源，其貢獻可以想見。

同時，在他擔任文工會主任時，大力協同教育部在各大學開設「中國大陸研究」及「中國現代史」課程，使大學生深入瞭解國情，在社會變局中，發揮穩定校園的作用。

第二、他擔任任何職務，都是特別注重創新求變，從不蹈常襲故，墨守成規。他在擔任中央日報社長的時候，全面革新版面，充實內容；大幅擴張副刊份量，增進其趣味性與知識性，因而創辦七大專題週刊，每日一專題，逐日輪轉，使該報真正發揮主導時流的功能。

又在擔任中央考紀會主委的時候，為因應社會多元變化之需，成立十個專題研究小組，分就黨政、外交、財經、文教、大陸....等問題，邀聘專家學者分組研析，兩年之內撰成專業報告與建議七十餘件，呈經李主席核閱，批送有關單位參採，裨助施政及應變。這種勤察機先、不避艱鉅的任事風格，求之一般公務主管人員，實屬難得。

第三、他很著重開闢學術園地，供學者專家研究問題，發表意見，集思廣益，探求國際關係的政策設計。在他擔任黨務文化工作之時，曾先後創辦中、英、日文三種版本的《問題與研究》、《中國大陸研究》、《中華學報》、《理論與政策》、及《考紀季刊》等，作為國內外學者專家及內部工作人員，研究相關問題、及交換工作經驗與心得的公共園地，藉此發掘人才、匯集智慧，團結人心，宣揚政策，發揮文宣工作的效能。

尤其在他擔任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之時，毅然創設國家文藝基金會及三民主義學術研究基金，獎助文藝創作與學術思想研究，真正樹立「主義宏揚學術化」的基礎，這是先生任事特具遠見與魄力的另一具體表現，值得為黨國服務者引以為榜樣。

除了上述做事的特殊風格而外，先生在事功成就上也得力於他深厚文化修養所培育的做人風範：

第一、他擇善固執，專誠不二。他一生奉獻於文教，盡瘁於黨務，任事不辭艱辛，但求成效；獻策不計識譽，祇辨是非；居位不計高低，但求展佈；行不邀功，謀不伐能，進退之間無忮無求。這種風範，最是令人折服，而其長受傳統文化薰陶，勵志於道有以致之。

第二、他尊重學術，敬禮賢能。在他擔任各種職務時，總是多方延攬才學賢能之士研究問題，提供建議。雖然他本人對所面臨或所思考的問題，有他自己的看法或想法，但他從來不預示主張或預設立場；總是用心傾聽與會人士暢所欲言之後，歸納重點，作成紀錄，憑作參擇。他也特別重視人才的培植，隨時提攜青年才俊，使之發揮潛力，貢獻黨國。這種為國禮賢，為黨育才的風範，令人永遠懷念。

第三、他一生嚴以律己，恕以待人。他對長官忠誠，盡慮惟恐不周；待下屬仁厚，獎掖惟恐不及。平日在公私場合，從來不談人長短，論人是非。真是謙謙君子，恂恂儒者風範。

叔心先生以其謙和的本性，純厚的修養，服務的請願，愛國的精誠，一生之中不論治學治事，都有特殊的成就與表現；在人際生活上可說於公無怨無尤，居家和樂融融；男女公子都卓然有成，克振家聲。先生身後可說無牽無掛，了無遺憾；祇是我們親朋友好每當念及先生在世的風格與風範，不免長懷感感，悵惘難抑。

半世紀的交情

陳裕清

俊才兄少我三歲，他久有氣喘之病，也曾時常延醫療治，進出醫院多次，但時好時壞，無法根除。他曾將其病歷交我，囑為其向紐約醫師請教，他們多認氣喘之病，根治雖然不易，唯無大礙，只要注意衣著飲食，應可稍減病情，衣著不可受涼，飲食不宜過飽。有時轉移任地，選擇較為乾燥溫暖的地區，或許有助；有一次我曾勸其請假一兩月，到夏威夷一遊，散散心，兼療病，看看對其氣喘，有無幫助。他責任心太重，總是說走不開，他似乎從無較長期的休假，其鞠躬盡瘁的操持與精神，確是可佩。

多年前我在台北來來飯店中風暈倒，喪失知覺多日，在台大醫院急救，內子從紐約趕到，看我的病況，認為希望有限，急召兒女來台省視，這其間舉凡醫療、交通與生活種種，都承俊才兄百忙之中，百般照顧協助。我自己對在暈倒以至回美這一段的事物，至今無法記起；據內子告知，當時各事，事無大小，都是煩他幫忙決斷，我今日之尚能保有殘體，俊才兄再造之恩，無時或忘。他之前往美療病，我事前毫無所悉，否則我必會前往休士頓探視，謀作最後一晤，失之交臂，這是我終身的遺憾。

俊才兄與我交往，超過半個世紀，他的事功成就，人所儘知，也必有人評為詳述，不必我增添一辭，我只想對其處事為人，略述此感，以誌懷念。

他對黨對國，真是忠心耿耿，不論海內外環境如何演變，他總是把握原則，堅定不移，絕不動搖。

他心思縝密，處事謹慎認真，從不粗枝大葉，應付了事。

他對人真誠懇切，操持耿介勤謹，是既可親又可靠的朋友。

他性情恬淡，好學不倦，公暇之餘，總是手不釋卷，故與現代智識，從不脫節。蘇東坡有言：「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對俊才兄而言，可謂恰切之至。

淡淡的交往、深深的關懷

張則堯

每一念及吳俊才（叔心）先生的印象，立刻就會浮現一個高尚的人格：嚴肅、正直、積極、無私、助人、謙和而又堅持的這些美德，他都完全具備，值得我們敬佩、感念與學習。

筆者初識吳先生，大概始於民國四十年代讀到中央文物供應社為他出版的「印度史」，簡明扼要，極具史識，聽說是他追隨羅家倫（志希）先生出任駐印度大使時，在新德里大學做研究生的學業成績。這本簡史的撰成，正是他在台大兼課的講義，頗見功力。不久我有機會和他同在陽明山莊受訓三個月，見到他這樣一位面目清癯而有神的實踐志士，當時我也年青不喜多言，彼此似乎都有「甚得我心」的感覺；以後也有若干餐會敘晤，仍然很少熱烈的友情，但卻有一點點深切的感受。在五十年代，我和他都在政大任教，因所學不同，相互切磋的機會並不頻繁，不過我對他的敬意日趨增加，總覺得他是一個值得交往的君子，淡淡的交往，探深的關懷，這也許是我們將近四十年來的情誼寫照。

他在政大創辦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東亞研究所都是蜚聲國內外的研究教學機構，對政府的政策諮詢、對青年學子的教育培養，都是很受人敬仰的。他在黨中央輔佐黨務，培訓黨務中堅人才，也都是成效卓著而功成不居的。他主持文工會時期對黨營文化事業的改進及其財務整理，迄今仍為人所稱道，其間也曾出任薩爾瓦多大使，卓然有聲。而他對於哲學及歷史的鑽研，始終不懈，數十年如一日，保持一種學者的風格。有一次，他請殷文俊教授轉告我，希望我參加他的易經研究聚會，俾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考慮之後，由於自知哲學和數學的基礎不足，只有辭謝他的好意，而他則常以我的真話當做謙詞，其實他是仍然希望我能對易經做點功夫，絲毫沒有責備我的懶惰，事實上我也曾讀過幾本這方面的書，祇覺資質不佳，無法深入，有負他的厚望。

後來他的健康不好，因為他的禮貌特別週到，我不敢多去看他，如果到他家敘晤或拜訪，他必到我家回看，所以我盡量少去看他，這樣一位謙謙有禮的君子，尤其表現在言談笑容之間，無一不真誠無偽，令人感動。真的，我很想看到他，但又不敢去看他，怕他回禮，怕真摯友誼消耗的體力；何況他又常在病中，他的咳嗽的聲音，實在令人聞之難受，但他仍然勉強、掙扎、表現艱苦的笑容。叔心先生：你這種艱苦的笑容，常令我們永遠難忘，我們做朋友的人要怎樣去學習你的艱苦的笑容呢？！

寧靜致遠—懷念吳俊才先生

美國前駐韓大使

吳克 (Richard Walker)

吳玉山譯

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的初期，局勢非常緊張。雖然在韓戰之後，美軍開始協防台灣，各種援助物資也源源而至，但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仍然處於失掉中國大陸的傷痛之中，對一切事物都缺乏信任。在大陸上固然有不少知識分子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是自由的大敵，因此願意追隨國民政府；但是卻也有相當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歡迎共產黨的主張，為中共宣傳，因而動搖了民心士氣。由於有這個痛苦的教訓，一些國民黨的保守派和軍事領袖對知識分子充滿了不信任的感覺。

當時許多天真的美國學者只看到中共的表象，而無視於蘇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所發生的悲劇，醜惡的階級鬥爭，以及共產黨對於戰爭的崇拜。他們接受了中共的宣傳，認為蔣中正先生和國民黨要為二次大戰後中國所遭遇的一切苦難負責。

處於這種情形之下，台灣的領袖們認為在與馬列主義的鬥爭當中不允許任何的妥協猶疑，漢賊是不兩立的。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史達林仍然主宰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冷戰剛剛開始，而中國是國際矚目的焦點。當時的國民黨依照列寧主義的原則組織起來，它也採取了許多共產黨的宣傳方式。

雖然如此，當時在國民黨之外，包括許多回國服務的人士，仍然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幫助保存中華文化，對抗共產黨的破壞；他們也深信中國的傳統價值最終可以戰勝侵略者，就好像在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的情形一樣。不過這些人面對了很大的困難。國民黨的領袖們認為中共在宣傳戰上擊敗了他們，而共產主義就好像是傳染病。為今之計必須將共產主義加以徹底阻絕，以防民眾遭受感染。這種想法造成了對於民眾的不信任，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為然。這些黨政領袖要求對輿論全盤檢查，甚至想要成立思想改造中心。

我在當時有幸認識一些個知識份子的英雄人物，是他們讓中華民國的知識界保持活力，並且維持了和自由世界的聯繫。崔書琴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一位哈佛博士，對孫中山的志業和著作鑽研很深。他了解中共的威脅和共產黨組織的力量。我和他以及他的家人成為很好的朋友。我遇見他是在韓戰的時候，然後是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我在台大任教的時候。崔先生是蔣總統所設立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當中一位重要的成員，他經常對時局提出開明的分析。崔先生堅持國民黨要徹底檢討它過去的錯誤，並且改革它的作風。

在崔先生周遭的學生和助理當中有一位幹練的新聞記者，他對中共在大陸上如何奪取政權知之甚稔，這位年輕人就是劉紹唐，他經由香港逃到台灣。劉先生原來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對於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如何被中共欺瞞有深刻的體認，後來他創辦了「傳記文學」，將民國時代的許多人物掌故生動活潑地記錄下來。

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認識了吳俊才教授，並且對他產生了油然而生的敬意。在一九六〇年代，吳先生成功地扮演了學術界和政府之間的橋樑，他讓領導階層了解到學術自由不是可怕的疫疾，而正是對付共產主義的利器。

我當時是透過國民黨了解到吳先生的背景的。在印度爭取獨立的時期，吳先生是中央通訊社的駐印度特派員，是一位幹練的新聞記者。他當時一方面和印度各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一方面努力修習碩士學位。然後他到香港辦報，對於因為受不了中共的高壓統治而逃港的難民潮有第一手的觀察與報導。在那種兵荒馬亂的時代，吳先生發揮超絕的毅力，在赴港之前還到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做了一年的研究。最後吳先生離開香港，回國任教於台大和政大。

吳俊才是一個內斂的人，可是你從他的眼睛當中可以看出他充滿了決心與旺盛的鬥志，同時又極善於與人交往。在他於一九六四年創立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後，我有機會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我當時在南卡羅來那大學有一年的休假，就利用機會到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我的計畫是寫一本有關於中國大陸的書，將由美國律師公會出版，這正是在瘋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

國研所當時座落在中央日報的頂樓，是在台北的市中心。政府所信任的學者可以在那裡找到許多有關於中國大陸的資料，包括從香港來的大陸地區性檔案和出版品。吳先生讓我在他們的圖書館當中擺了一張桌子，給我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當時我們常常談到怎麼樣才可以讓更多的西方學者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這其實是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學術界爭取信任和友誼最好的方法。我認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世人已經有足夠的了解，因此政府對於開放大陸資料實在不必有任何畏懼。台灣當時已經展現了成功的端倪，現在正是和國際學術界展開交流的大好時機。吳俊才不但完全贊同我的主張，他並且積極地開始動作起來。

黨政高層對於吳先生是充分信任的，另一方面吳先生又是學術界中人，並且和國際的學術界也有許多交往。當時台灣保存了一批最寶貴的中國共產黨的原始文獻，由於吳先生深獲高層信任，因此當局同意透過他將部份資料開放給西方的研究人員。於是像我這種西方的學者就有機會利用到司法行政部、國防部情報局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保存的珍貴檔案。

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後半期，我經常來往於美國和台灣之間，並且經常有機會和吳先生談話，我知道他正努力使國研所和國際學術界建立聯繫。我介紹他與美國及歐洲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接觸。我發現我的這位大哥（我叫他大哥是因為我們都姓吳，而他又比我大三個月）有極強的組織和計畫能力，並且開始受到層峯的賞識。他所做的是發揮儒家的理想，以知識報國。

後來吳先生帶了他的女兒（她是在印度出生的）到美國來拜訪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們到南卡羅來那和我以及我的妻子珊尼會面。我招待他們住在家中，吳先生甚為感動。我又安排哥倫比亞市（Columbia）的市長向吳先生致送市鑰，以及安排他會見南卡羅來那大學的校長，與當地的學術界領袖。由於「吳家兄弟」的努力，我們南卡羅來那大學的研究所和國研所很早就訂定了研究交換計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為此一計畫所創造的學術成果而感到驕傲。吳先生的遠見和堅持是這個計畫成功的關鍵。今天在國研所的南卡羅來那大學的研究生比任何一家外國大學的都要多，他們都知道我和吳先生之間的堅固情誼。

為學術活動籌募經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此吳先生展現了他的遠見和能力。他在很早的時候就告訴我說他想要為國研所建立國際性學術地位和聯繫管道，他又想要把國研所搬離喧器嘈雜的市中心，好讓研究人員能夠潛心於學術。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我接到國研所將搬到木柵萬壽路 64 號的通知。我知道吳先生一定為此而雀躍不已。在一年前當他在南卡的時候，就曾經和我討論要如何爭取經費，實現遠大的計畫。他顯然成功了。

在吳先生一生當中最驕傲的一刻應該是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台北召開的時候（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十九日）。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今天，這個重量級的學術會議從來沒有間斷過。吳先生當時是大會主席，他向中美兩國的一流學者們致了開幕詞和閉幕詞。已故的韋慕庭教授（Prof. Martin Wilbur）曾參與多次中美會議，包括兩次在南卡所舉行的會議。他在一九八四年寫道：「我深信中美雙方都從這些學術交流當中獲利。十二次中美會議所提出的論文構成了現代中國研究當中一個重要的文獻。毫無疑問地，國際關係研究所幫助了美國學者接觸到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檔案文獻」。我們和他一樣，都深深感謝吳先生在中美學術交流上所做的貢獻。

第一次中美會議出版了兩本書。第一本是份量很重的「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文件彙編」（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第二本是有關會議的剪報和相片。在相片中我們看起來都那麼年輕，真是讓人難以想像。吳先生受到當局重視的程度可以從與會人士受到的禮遇當中看出來。我們見到了許多政府要員，甚至獲得蔣中正總統和夫人的接見。吳先生在沈穩謙和當中開啟了研究現代中國的新頁。

第一次中美會議之後，我這位才氣縱橫的老友繼續推動學術發展的工作。在一九七一年他聯絡了日本方面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召開了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美國方面，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主辦了第二屆中美會議，給了我與老友碰面的機會。接下來吳先生推動學術研究的能力又展現在創辦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之上。後來國研所也成為政治大學的一部份。

在史丹佛會議成功結束之後，吳先生被國民黨和政府徵召，擔任黨政要職。他先是主掌國民黨的文化工作會。這個工作使得他可以繼續和學術界接觸，並且繼續關心國研中心的學術活動。繼吳先生擔任國研中心主任的各位先生都一致認為是他將國研中心帶上了軌道。吳先生證明自己是一位學術的開創者，也是一位中國文化的保衛者。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吳先生約朋友看著他繼續為他所熱愛的黨國效命。在每一個場合他都會為自由中國慷慨陳詞。我記得在一九七六年接到他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他擔任了「中華學報」(China Forum)的發行人，隨信並且附了一本蔣中正總統的紀念集。在「序言」中他寫道：「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當中，身為一個作家必須做時代的見證。今天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這個傳統受到壓抑；然而在中華民國，像在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一樣，知識分子堅持了這個傳統」。這是吳先生堅信思想自由的證言。

我很早就知道吳先生堅毅果決，有極強的辦事能力。他日後受命擔任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而後又回國接掌中央日報，表現均極優異。他的身體健康雖然大不如前，但是他為一個自由康樂的中國而奮鬥的信念卻未嘗稍戢。

現在回頭看看我與吳先生數十年的工作夥伴關係和學術上的切磋琢磨，我深切感覺到吳先生有三個不凡的特質，充分顯示了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家君子。

第一、他與人交往誠懇正直，一生以「仁」為圭臬。

第二、他尊重學者，發揮了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對知識分子的敬重，從來不想要控制人們的思想。

第三、他相信中國未來的命運繫於與自由社會的開放交流。

他是我們的典範。



玉山、均權女士歡迎俊才先生歸國，民國 58 年

憶叔心師

兼論其在印度史及東南亞史上的貢獻

李國祁

目前在台灣的學術界中，個人應是吳俊才老師最資深的學生之一。憶在民國四十年前後，我仍在師大大學部二、三年級的時候，系中特聘請吳老師前來開授印度史與東南亞史課程。當時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學校經費不足，圖書設備極其簡陋，大學中選修課開得很少，尤其是不屬於外國史主流的印度史與東南亞史，更是絕無僅有。故一時間選課的同學極多。

那時也許是吳老師初次在台灣的大學中教書，每次上課均服裝整齊，教學認真。再加上老師年輕風度翩翩，對同學態度和藹，有相當的親和力。講書雖不抄筆記，亦不發講義，但因口齒清晰，條理井然，同學們皆印象深刻，公認為是一位好老師，對他的講授極表歡迎，我個人更是如此。蓋由於戰亂及先父的去世，曾輟學甚久，考入師大後，一則因重獲讀書機會，得來不易，極其珍惜，甚為用功；一則因初入大學，智識大開，對很多歷史課程，均充滿興趣。我每次上吳老師的課極其用心聽講，記筆記我素有快手之稱，幾乎他講的每一句話，我均能記述得很清楚。吳老師教書是非常認真的，每學期他都要將同學的筆記收去查閱。我尚記得他對我筆記記得如此完整，頗為欣賞，曾當面告訴我，我適合做新聞記者。可惜的是後來我未曾實現老師的期許，走入新聞界，反而在故紙堆中討生活，從事史學的研究工作。但從此我與老師結下不近不遠的師生情誼。過年時常與其他同學到老師家拜年，對老師與師母的熱情招待，迄今仍歷歷在目，留有鮮明的印象。

吳老師對同學是極其關心的，有時他也會詢問及我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情況。記得，我自德國學成重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工作時，他不知由何處聞知我被捲入所中的人事糾紛之中，特地要我去看他，見面後力邀我到他主持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工作。我因當時已決定重返德國，致而再度辜負了老師栽培的美意。兩年後我接受師大的聘請，在歷史研究所執教，老師於主持文化工作會任內，一再邀我為他所辦的中華學報寫學術論文，在台灣史上我的成名之作「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即發表於該學報。適老師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時，除邀我擔任專題演講外，並盼我能出任研究部主任。由於個人的興趣祇在史學研究，因而三度有拂老師的盛情。但老師栽培學生的德意，始終常存於心，故最後仍為理論與政策雜誌略盡心力，直至老師離開副祕書長的職位時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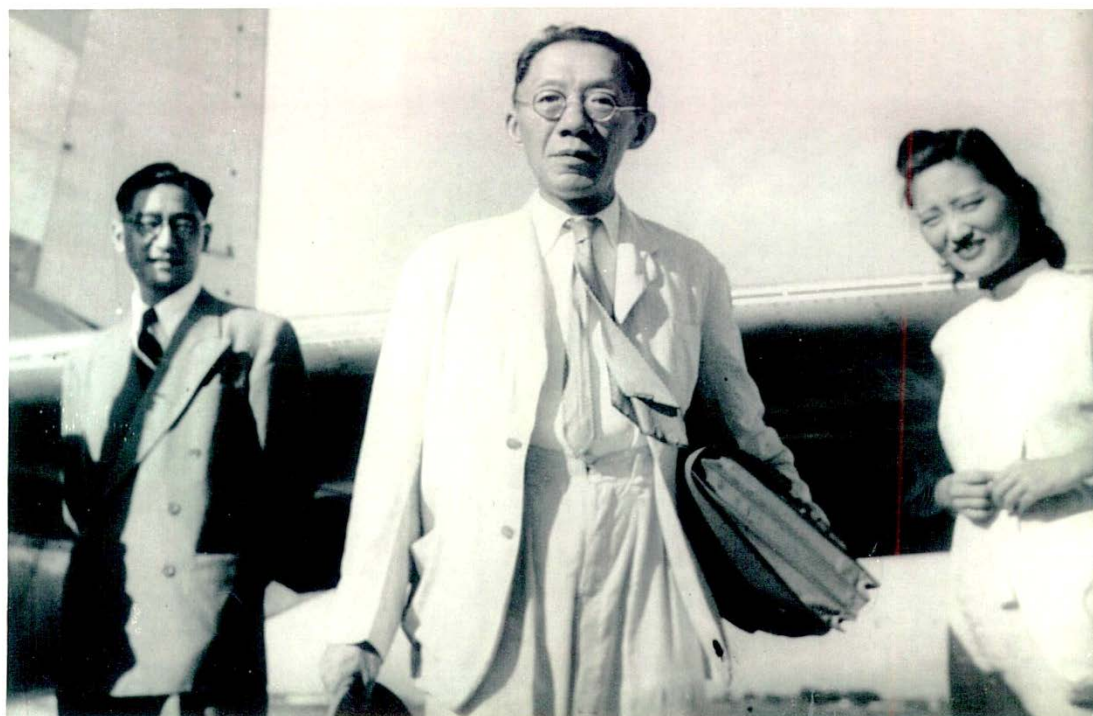
在吳老師的眾多學生中，我不是老師最親近的，但卻是極忠誠的。我常常不自覺地會以老師治事的勤慎，與照顧學生的熱忱，作為一種典範，銘記於心。

就史學的領域言，吳老師在印度史上的成就，是迄今在台灣史學界中，仍少有人出其右的。老師先後著有《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及《印度史》等著作。由於其個人曾在我國駐印度使館工作，並在德里大學研究印度史，故其對印度實況的了解，遠非一般治印度史者所能及。吳老師在治史方法上，個人以為其與國內很多史學工作者最不同之處在：首談其所研究這段或這地區歷史的特徵，亦即先作一整體觀察，俾免有見樹不見林的弊端。氏之印度史著作也是如此，認為印度歷史的特徵首在宗教，由早期佛教回教及於印度教，均表示出：宗教對印度人的影響，不僅在於精神生活，亦深入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不談宗教，則無法了解印度歷史及當前印度的現況。

其次印度是一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多是外來的，歷史舞台上的要角，常是由這些外來的民族分時段予以扮演；對不同時代，由於主宰的外來民族不同，故有不同的影響，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其三，老師極注重印度地理的特性，及其戰略地位。印度由於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再加以地處亞熱帶，叢林與沙漠並生，高山與低濕地區均存，地形割裂，各區封閉難於交通，使印人地域觀念極重，不僅難於團結，且各區文化及宗教發展不同，致多元化發展遠大於其一元的統一性。

其四、老師由文化位置（Cultural location）觀念，認定印度文化位置極其優越，故能將其宗教，特別是佛教遠播，而形成其為東方文化一大中心。



俊才先生、羅家倫大使、均權女士於駐印度期間，1947-1949年

印度歷史最後一項特徵，則是紀年不夠明確。老師綜覽印度的歷史發展，並將之與我國比較，以為其歷史紀年不夠明確，致而歷史分期不精細，僅略分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大階段。

綜上所述，可看出叔心師治印度史與一般治史者不同，極其注重歷史發展的整體性，而且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提出文化位置說，來解釋印度國勢雖然不振，但文化卻獨樹一幟，成為東方文化的一大重心。這一些均是其他治印度者所不及的。

此外，吳師的印度史，詳今略古，於古代部分敘述簡略，但置重心於其文化的形成及影響。近、現代部分討論詳盡，由英人的統治，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直敘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印度獨立，及印度政黨與建國藍圖。以一種客觀分析尋求事因的方法，引導學生認識印度，了解印度。並於印度的政體民主而缺團結，無法致其富強，闡釋尤為深入中肯。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中印間邊疆衝突甚多，故吳師印度史亦注意及中印關係與爭端。師分中印關係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由中印交通之始直至十五世紀，係雙方相互追求真理與知識時期，第二時期自十七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期，亦即英人據印時期，其交涉重心在西藏問題。第三時期為抗戰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是中印人民在精神上重新團結時期。第四時期是中印中巴正式建立邦交時期。由於我國的內亂，此時期中印中巴關係的發展是由和諧趨於緊張，甚至敵視。可視為是不正常，或變態時期。吳師並斷言，日後中印關係勢必以西藏問題為歸依。慨歎印度獨立後其政府的短視，欲趁我動亂，東進窺藏。並引羅家倫大使下旗離印前所賦詩句：「道義春水薄，權謀孽海深，一分鐘靜默，勝過萬篇經」。作為印方不能與我維持友好道義關係的悼憤。

叔心師日後將其印度史講稿整理，於民國七十年由三民書局出版。其書是一五十餘萬言的巨著，於每章節後並附大事年表及重要參考書目，使其著作更為完整。時迄今日已逾十六年，而有關印度史著作仍無出其右者。可知師對印度史研究之深，寫作之精。

吳師治東南亞史，在方法上一如治印度史，將東南亞地域作一整體看待，先討論其地理環境、民族分佈，及文化背景。以為此一地區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三種鬥爭：一、社會舊秩序間的相爭，二、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鬥爭，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難容。

而在上述的三種鬥爭中，所追求的目標亦有三：一、國家獨立，二、政治民主，三、經濟平等。而在經濟平等的目標中，叔心師以為土地的平均與開發是東南亞地區各國所面臨最迫切待解決之問題。而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則應是解決此一問題的良好方法，可作為借鏡。東南亞各國如能做到土地國有民用，避免大地主產生，工業化不僅顧及增產技術問題，並注意及生產以消費為目的，分配必須社會化，使私人資本無從過度發展，國家可控制大企業的發展，則其現有的貧富兩極化現象必可消除，經濟的分配將走向平等。

叔心師講授東南亞史是由十三世紀講起，在此以前教授簡略。因之甚為看重元明兩代的東南亞政策，列有專章予以討論。認為明代的東南亞政策表現出儒家的精神，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具存亡繼絕泱泱大國的風度。與十五世紀以後歐人的東侵，立意在亡人之國，滅人之族，有根本的不同。叔心師並指出明代在東南亞所推行的和平共存政策，並非始於明成祖時派鄭和出使南洋，而自明太祖時即已制定此一政策。目的不在武力武服，或經濟剝削，或武裝移民，重在宣揚中國的文化，維持保障東南亞的和平秩序。

在葡人的東來形成歐人侵略並殖民東南亞史實中，吳師提出一項新觀點，是為一般亞洲治東南亞史著者所忽略的，即是葡人的東來亦在於反回。蓋當時回教的勢力不僅深入東南亞，非洲亦然。西、葡兩國對回教勢力在非洲的擴張，均惴惴難於自安，以為威脅及兩國的生存。故在十字軍東征時，兩國均曾為先鋒。葡王子亨利曾於十五世紀前期兩次率兵攻打非洲沿海回教根據地。對消滅回教，闡揚基督教充滿無比的信心。而這種宗教的狂熱，正是促成其東來侵略的動力之一。

叔心師不僅對葡人東來的動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而且對葡人在東南亞及印度殖民之所以未能得到如後來荷蘭英法諸國的成功，也提出一些他人所未提及的看法。他認為宗教的狂熱，使葡人有強烈的宗教限制，致遭當地居民強烈反抗，再加以葡人個人保守執拗，哥亞總督阿米達（de Almeida）力持海權政策，殖民僅注重貿易據點的取得，乃造成最後僅能掌握一些小據點如哥亞（Goa）及澳門等，使他們僅是後來的歐洲東來的國家之開路先鋒而已。

叔心師的東南亞史置重心於各地民族的覺醒與華僑的發展問題上。對於前者，叔心師認為東南亞各民族的覺醒，是受中國革命的影響，不僅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對東南亞各民族造成巨大的衝擊，而促使快速覺醒。即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之時，亦曾對東南亞地區的革命如菲律賓，予以支援與鼓吹。再加以日俄戰爭，日本因革新而戰勝俄國，當然亦予東南亞各民族相當啟示與鼓舞，使相信祇要發奮圖強，任何民族均可自立自救的。一次世界大戰後美總統威爾遜發表宣言主張民族自決，自更對方興起的東南亞民族覺醒，產生強大促進作用，而得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終於紛紛獨立建國。但在獨立運動中，同時發生共產主義的滲入，致使

中南半島的諸國，除泰國外，紛紛不幸為共黨控制，極有可能成為新的動亂之源。

對於華僑問題，叔心師首先以華僑人口數字，來證明華僑認定的標準問題，所在國與我國政府頗不相同。前者以法律為根據，而我國則以血緣為根據，致而我國華僑數字遠大於所在國數字。吳師與多數學者相同，認定華僑的外徙主要是由於經濟因素，但強烈的鄉土意識使他們熱愛母國與原鄉，致成為推動革命與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但過去政府（指明、清兩代及民國初年）由於缺乏保僑的觀念，華僑勢力的形成，純粹由個人及華僑自身團結的慘澹經營，其成就限於經濟力面，成為殖民政府與所在國人民間的中間階層。既遭受殖民地政府壓迫，亦受所在國人民的忌妒與懷恨。二次大戰後民族主義思想高漲，東南亞新興各國壓迫華僑更甚於前，在教育、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予華僑各種限制，而我國因應的保僑措施，必須改弦更張，力予革新。尤應注重華僑的子女教育，改進經濟活動方法，由獨資或家族式的零售商經營，改為合股的大企業投資，培育華僑社會的領導人才，方能維護華僑權益於萬一。

概括而言，叔心師的東南亞史其最大的長處，在將東南亞地區作一整體研究，注意其共同性，使學生能於短期間對東南亞地區有一扼要整體的了解。也許正為其講述有如此特長，故民國四十五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為之出版，名為《東南亞史》，收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中。

叔心師的專業是新聞系，他在師大兼課時，專職是中央日報的主筆，報社的工作是極其繁忙而有時間性的壓力的。但他仍能在繁忙具有時間壓力的公務之暇，不僅從事個人學術研究，並將其研究心得教授予學生，是學人從政中較為少見的。在個人的印象中，他始終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學人，他雖然從政多年，贊襄黨務與國政甚豐，但政治的氣味極其淡薄，仍然保有濃郁的學者勇於求知，誨人不倦的風範。這種風範在今日社會紛歧多元的演變下，已不多見，故特為文以誌之。



俊才先生（左二）在印度期間追隨羅家倫大使（右二）

師恩銘記緣長久

閻沁恆

注視著民國四十三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生謝師宴後師生留影的合照，吳師叔心端坐前排，那溫文儒雅、俊逸含蓄的神態，頓時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吳師受聘在台大歷史系講授「印度史」課程的情境。以後在人生漫長的歲月中，自己在求學和工作上默默的奮鬥，大約有二十年左右很少有機會與吳師保持密切的往來。直到民國六十年代初，師妹涵碧到政治大學來讀書，方才又重續師生的緣分。以後二十餘年，老師都擔任很重要的職務，他的位置也更迭多次，但是除了奉使薩爾瓦多那段時間之外，總是常有機會見到老師或者是追隨左右做點事情。老師的教誨、勗勉和關愛，使我有勇氣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奔馳，也使我領悟到紀元前四世紀征服世界的亞歷山大大帝感念他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時為什麼會說：「我的父母給了我生命，而我的老師則教給我如何渡過此生。」

讀〈新聞學與歷史學的比較研究〉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報學》雜誌第四期刊出老師的大作〈新聞學與歷史學的比較研究〉，從新聞學和歷史學研究的內容、方法和異同之點作了詳盡的討論與仔細的分析，結論是兩種學術領域固然各自獨立，但是互通及相近之處亦非在少，所以要相互學習，彼此借鏡，必然皆蒙其利。

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學者弗里曼曾說過：「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以後新聞學者便仿此句型稱：「歷史是過去的新聞，新聞是現在的歷史」。同時的英國史家卡萊爾更認真的提出：「歷史就是經過過濾的報紙」。對此儘管歷史學者和新聞學者有他們較為嚴謹的保留看法，但就理論層面和應用層面而言，老師的立論的確有所根據。

從學術的交流到實務工作的應用，均可產生互補互利的作用。老師曾在新聞工作的崗位上做過記者以至機構之領導人，也是著名的印度史、東南亞史史學與學術研究單位的主持人，他的跨兩個學術領域的學識素養，非僅交互為用，而且發揮到圓潤及昇華的境界。多年來常常銘記老師以身作則的典範和深藏智慧的教誨與言談，也去思索如此一位受到尊敬與敬愛的師長和長官，到底是如何塑造成功的。雖然他的辛苦像是一位只知奉獻的苦行僧，然而他的豁達與樂觀又非常人所能及，那或者就是歸因於老師的天賦與學養。

創一意多、視野廣

老師人到那個機構，在他的主導下，一定會構思出新的點子，推動一些有創意、

視野廣的工作，這類事情在研議階段，常常有見仁見智的不同意見，但是一經定案，大家就會隨著老師一起動起來，做的有聲有色。

老師主持國民黨文工會的期間，創辦了一本學術性的刊物，全部中、英文對照，半年出版厚厚的一大本，承命成為這份刊物《中華學報》的成員之一，從籌備到第一期的出版，經過一段漫長而十分辛苦的準備時期。雖然是半年刊，卻每週都有召開編輯會議，會議大半由老師親自主持，有關每期內容的主題、稿約、和英譯等等問題都作仔細的安排與了解。有時在會上的發言，有人質疑包括印刷、中、英文稿費、國外寄費等所費不貲以及全文英譯的必要性，老師便堅定的指出，以學術性和高水準的論文為國情與黨的理論作國際性的闡揚，當然代價甚高工作艱苦，但是除了執政黨的勇氣和魄力足以承擔之外，還會有誰去做這種吃力難討好的工作。這份刊物相當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肯定。可惜人在政存、人去政亡，老師離開文工會後不幾年，後繼乏力，無法倖免走上停刊一途。

老師出任《中央日報》社長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在就任之初即有了新的構想。為了順應社會變遷和大眾生活品質提升的趨勢，一份被視為嚴肅的政黨機關報和強調政令宣導和硬性新聞報導的報紙，也必須跟隨社會脈動的走向，提供更多知識性與生活化的資訊。於是便有七種專刊每週輪流刊出一次的決定。這七種專刊「主流」、「文史」、「法紀」、「生活」、「讀書」、「健康」、「旅遊」推出之後，由於主編都是羅致各領域的學者及專家，而報社的配合作業也十分周到，不但工作進行順利，亦有推廣知識與為專業奉獻的期許，獲得讀者大眾的肯定。老師卸任社長職務後，各刊陸續停刊，唯一維持甚久的是「主流」。

我雖然不是國民黨的中央考紀委員，但在老師擔任考紀會主任委員的期間，也常有機會求見請益。其中有一次老師特別談到，他已與幾十位學術界知名的人士諮商，預備就國民黨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分成幾個專業的研究小組，自行研究或接受黨的委託進行研究，以增強國民黨知己知彼的能力並有助將來黨務的開展。考紀會本來就負有研究發展的責任，但如同大多數機關團體一樣，只是聊備一格或有名無實。老師注意及此並且要積極的大有作為，他的見識與魄力豈一般唯諾保守之人所能望及。

親切關懷寬厚待人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某日，老師從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打電話給我，說有事需要當面一談。我在電話中一再懇求讓我前去拜見，但無法改變他的堅持，只好在學校恭候老師。那日師生見面，談的是院中輔導處長出缺，老師提拔我去接這份工作。長年習慣教學生涯的我對於如此突如其來的改變，的確思緒紛雜，不知如何回應才好。但是經不起老師誠意說服和曉以大義，竟然倉促間就下了決定。以後有兩年的時間追隨在老師身邊工作，他那堅貞的意志、崇高的理想和敬業的精神，

使我真正體會老師的魅力所在。雖然這兩年中自己在功利的所得不無損失，不過工作的心情卻十分愉快，而工作以外的受益更是值得珍惜。

有一天晚上，金開鑫處長和我承老師邀請到他府上用晚餐，在吳府停留了數小時。老師說，平常雖然天天見面談話；但都是為公事忙碌，所以要安排一次時間從容，天南地北的隨性交談。那晚吃的是家常飯菜，因為天冷，好像還有一個熱鍋，內容是土雞白菜等，三人在燈下邊吃邊談，還把老師的一瓶名酒喝了大半瓶。老師因為呼吸器官較弱，常有咳嗽的毛病，所以煙酒都禁。為了不讓部屬覺得拘束和尷尬，總是說他並不討厭別人有這種嗜好。那天晚上金處長和我亦煙亦酒，而且談興很高，老師一邊勸菜勸酒，共享這一次難得的輕鬆聚會，他那愉快高興的神采也是平常不易見到的。

多年來老師總是那麼客氣，農曆年節我們去拜年之後，他常常都要親自到寒舍一趟，而且還特別坐一陣了解一下我家的近況。他說每年此時蒞臨，並非俗稱的回拜，而是親自看看我們的生活情形，看到大家都健康愉快，他就很放心。老師最後一次到寒舍是就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後的第一個春節期間。那天天氣好，老師的精神亦好，向內人問長問短，尤其囑咐我多飲傷身，喝酒一定要有節制。臨去前，老師特別放低聲音說，去年沒有來是因為出門不方便，沒有車子代步。他對學生晚輩的關心與真情真是沒有一點保留。

民國八十五年的春季，在國民黨中央一次重要的會議中，見到老師坐輪椅來開會，知道他的健康狀況顯著變化。會議中對著我輕輕揮手，面帶笑容的好像有話要吩咐我，但是主持人恐怕他體力不夠，就請他提早離席。據朋友們說，老師除了氣喘和健康衰退，意志力和思考力還十分堅強與縝密。數月後老師在美國突然逝世，實在是太意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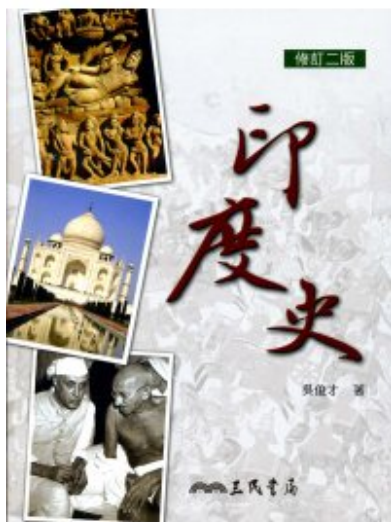
在我幾十年學習與工作的過程中，尊敬與感恩的老師及長官很多，於為學處世方面，熊翰叔師教我如何學習國文、姚從吾師啟導我如何學歷史、曾虛白師引領我進入新聞學的領域，而吳師叔心的身教與言教，使我感受到一位慈祥的長者和散發著德性及智慧光芒的老師對我的成長是如何重要。

印度歷史的沈思

—吳俊才先生著「印度史」讀後

王壽南

接到吳俊才先生寄來他的新著《印度史》，感到欣喜萬分。吳先生當年在臺大歷史系講授「印度史」，我選修了這門課，所以，吳先生是我的業師。吳先生後來以學者身分被徵召從政，在黨部歷任重要職位，並曾擔任駐薩爾瓦多大使，吳先生平日工作之繁忙不難想見，卻不料吳先生從政仍不忘研究，在千頭萬緒的公務之餘，竟能出版新著，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欽佩。



本想一口氣讀完吳先生的新著，可是這本由三民書局出版厚達 654 頁的印度史份量實在太重了，我竟花了兩個多星期才把它讀完。我之所以要「慢慢」細讀這本書而不把它用一兩天「翻」完，還有另一個原因，每次當我手捧著這本書的時候，腦海裡總是浮現出當年吳先生在課堂中的情景。吳先生步上講台給學生們第一個印象是年輕英俊，記得那時臺大歷史系的老師大多是年高德劭的老教授，我們學生不敢問吳先生幾歲，但是直覺到吳先生和系裡的「老」教授們在年齡上不屬同輩。吳先生雖然年輕，卻兼有中國文人和西方學者的氣質，所以，吳先生對我們這些學生的影響很大的。我不

肯用快速度讀完這本書，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於感情作用，而不是這本書過於艱深。當然，這本書是純學術性的著作，有其專門性，但是，由於吳先生的文筆和他的口才一樣流利，能夠深入淺出，敘事條理分明，剖析問題又精闢深刻，使人讀之興趣盎然，縱使對印度歷史毫無所知的門外漢，讀後也會獲益甚多。

本書共十五章，依時間順序敘述印度自上古至二次大戰後獨立的歷史發展，可說是目前以中文寫作最有完整系統的一部印度歷史專著，凡對印度歷史或現勢有興趣的人，不可不仔細一讀。

本書第一章導論，對整個印度歷史的演變作了一個提綱挈領的說明，提出了印度歷史的五個特徵，這是吳先生研究印度歷史融匯貫通後所作的歸納，印度數千年歷史通過這五項歸納可以得出其發展的線索，使讀者讀本書以後各章時，可以獲得明顯的脈絡，因此，本書的導論與一般史學著作的導論不同，本書導論幾乎是全書的重點，也是吳先生治印度史功力的表現，是不可輕易放過的。

印度是世界上文明古國之一，在西元前四世紀之前，印度的歷史還很混沌不清，直到旃多羅毘多建立了孔雀王朝，印度才有年代明確的歷史記載。從孔雀王朝到英治印度的二千一百年間，印度更換了許多王朝，也建立了不計其數的小國，有眾多的外來民族侵入印度，重要移入的民族有雅利安人、希臘人、大月氏、白匈奴、阿剌伯人回教徒、蒙古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閱本書 14 至 18 頁），這些外來民族在印度歷史舞台上多有所表現。表面上，外族不斷入侵，造成印度歷史的多彩多姿，變化萬千，但卻也使印度難以建立成一個真正統一而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僅土邦林立，割據一方，而且宗教各異，互相排斥，其結果是印度數千年在政治上都沒有光輝的成績，在文化上又未能建立起為全印度人共信共仰而綿延不絕的傳說。

如果和中國作一比較，中國的情形和印度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外族入侵，重要的外族如匈奴、鮮卑、蒙古、女真，他們對中國歷史發生很大的影響；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外域的宗教傳入，重要的如佛教、回教、景教、基督教，這些外來宗教對中國社會也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外族來到中國後沒有造成長期的種族對立，也沒有一直保持外族原有的色彩，外族和本土民族融而為一，一二百年後甚至無法區別誰是外族了；外來的宗教在中國沒有受到強力的排斥，可是卻改變了原本的面貌，例如佛教來自印度，到了唐宋，佛教在中國大為盛行，但這時的佛教已經是中國化的佛教，不是印度原始的佛教了，所以，外來的宗教雖然影響中國社會很大，卻沒有造成社會上因宗教的信仰不同而對立、衝突。

中國怎麼能如此成功地接受外族和外來宗教？主要是因為中國本土早就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外族雖然可以用武力征服中國本土，但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卻融化了外族，使外族從物質生活到思想觀念都起了改變，漸漸地認同於中國本土，中華民族能夠包容那麼多民族而成一個大民族，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全中國人世世代代信守的傳統文化；外來的宗教進入中國後，同樣也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進行自我修正，以適應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講和諧、兼容、仁愛、謙讓的，外來宗教受此影響也就不會走向衝突、仇視異端的路子，雖然，外來宗教仍各拜自己的神，可是，教義卻都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

由此所述，可見印度和中國的歷史遭遇相似，都有許多外族和外來宗教進入，對印度造成政治的分裂和社會的對抗，而中國卻能保持成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和社會，創造出許多偉大光輝的紀錄，這實在應歸功於中國有一個傳統文化的根。

民國初年，許多人高呼打倒傳統文化，他們何嘗想到，如果沒有傳統文化，中國二千年的歷史是不是要走上印度的路子？漢唐的政治成就、宋明的文化光芒都不能出現，中國歷史上演的將是一片混亂、爭奪與分裂。

英國統治印度是印度史上的大事，也是西方帝國主義到東方建立殖民事業的典型案列，是值得中國人特別注意的，本書有專章討論這一段歷史。英國統治印度對印度來說有害也有利，其害不言可知，其利則是使西方文明輸入印度，不過，印度接受西方文明是被動的，不是自覺性的，是在英國人控制和設計下輸入的，吳先生說：「凡是有利於殖民統治，鞏固霸權與帝國基業者，他們才作有計畫的移植，否則，便斷然予以揚棄。所以又可以說，印度所接受的乃是更次一等，經過殖民化了的西方文明。」(頁 11) 這種西方文明的移入對英國殖民政府的加強統治大有助益，對印度本身則無好處。

從印度的歷史教訓可以發現隨帝國主義者而來的西方文明有其可怕之處，一個民族如果不是自覺性而主動地接受西方文明，只一味地接受別人的餵食，其結果是他可能成為西方文明的奴隸而不自知。吳先生指出印度被英國滅亡，「不是被少數英國的殖民經略者所滅，而是滅於西方文明，滅於印度人之放棄了其固有的文化。」(頁 13) 吳先生的話足以令人深思印度亡國的慘痛教訓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先生（右二）與羅家倫大使（左二）

甘地是印度的國父，本書用了 130 多頁來討論甘地與印度獨立革命運動，甘地領導革命，「他的憑藉就是他個人的革命感召，目的則是印度的自由與獨立。所謂精神感召，就是自我犧牲，絕食毀身，多次入獄，以感召民眾參加他所倡導的反抗運動，不合作運動及土紡土織運動，拒用英貨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是不流血的非暴力運動，也稱消極反抗。」(頁 289) 甘地堅持以非暴力的方法向英國爭取印度的獨立，這在世界各國的革命史中是最奇特的方法。

甘地提倡非暴力主義獲得相當的成效，我個人覺得係三方面因素配合所造成，一方面是印度的環境，一方面是爭取獨立的對象，一方面是甘地本人。

先談印度的環境，印度社會是個宗教氣氛極厚的社會，人們的生活無不受宗教之影響，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非暴力主義才比較能為人們所接受。因為非暴力主義本身就含有宗教的博愛意味，甘地說：「我的非暴力，需要無邊的愛。」(頁 387) 歐戰爆發，甘地表示同情英國，但不同意印度支持英國對德作戰，其出發點便是認定戰爭是暴力，以暴力制暴力的結果只有走向毀滅。

甘地說：「我並不要英國戰敗或屈辱，我聽到聖保羅教堂被毀，感到傷心，就像我如果聽到卡西印度教廟或朱瑪清真寺被毀一樣的難過。我願以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卡西印度教廟、朱瑪清真寺及聖保羅教堂，但我不欲犧牲對方的生命」。(頁 393) 又說：「你應不惜自己的生命，去為你自己的朋友或敵人同樣服務，你要赴湯蹈火，表現出非暴力者的大勇精神」。(頁 315) 這種非暴力主義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宗教的領域，如果不是在一個宗教氣氛濃厚的社會裡，人們可能根本聽不懂甘地的話，更談不到信仰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了。

其次是爭取獨立的對象，印度向英國爭取獨立，姑不論英國是怎樣的帝國主義者，但英國確是一個很講人道的國家，當對方不使用暴力時，英國不會有激烈的舉動。例如 1943 年二月十日甘地在獄中宣布絕食 21 日，體力衰弱，印度總督派了三位名醫前來照顧 (頁 447)，這是人道的表現，如果是納粹德國、日本或中共，根本不講人道，甘地的絕食恐怕只能促成早日死亡，非暴力的結果恐怕也難逃被屠殺的命運。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非暴力，而是說非暴力主義要面對適當的對象才能發揮其效力。

其次是甘地本人，非暴力主義能獲致相當的成果，甘地本人是最主要的因素。非暴力不是懦弱，而是道德上的至勇，一個沒有堅定的道德勇氣的人是無法提倡非暴力的，從甘地一生的行事來看，甘地不是一個遇事就逃避畏縮的人，也不是一個容易屈服的人，他提倡非暴力絕對不是覺得「力不如人」而暫時採取一種軟性的迂迴戰術，他是相信「非暴力便是實現真理的唯一途徑」(頁 296)。甘地本人的道德情操是偉大的，他的愛心、純真、勇敢、無私、擇善固執，塑造成不朽的人格，非暴力主義常是在他的人格感召下才推動的，如果缺少具有完整人格的領袖領導，非暴力主義是無法提倡的。

非暴力主義是要具有堅強的道德勇氣、和宗教家誠摯博愛的精神才能推動的，這世界上到底凡人太多，聖者太少，所以甘地雖然大聲疾呼非暴力，印度人民能真正奉行的實在不多，甚至連國大黨的領導人物也多不贊成，常令甘地感到遺憾。尤其是英國允許印度獨立後，印回間的大仇殺，赤裸裸的暴力使甘地最為痛心(見第十一章)，非暴力主義似乎並沒有在印度生根。我個人贊成非暴力主義，但對它的可行性不能不懷疑，它是道德和宗教上的理想，人類和平的真正實現，但是，

在人類的劣根性—自私、凶暴、仇恨心—尚未消滅之前，怎麼讓世人都培養出聖者的胸懷呢？

甘地是印度的國父，也是世界的偉人，他使印度獲得獨立，但他最大的貢獻還是表現了道德的光輝，總評甘地的一生，與其把甘地歌頌為印度偉大的政治領袖，毋寧稱他為世界的聖哲，今日世界強國的政治領袖不知從甘地的歷史中去領悟一些啟示，實在是人類的不幸！

印度的獨立，中國曾給予很大的助力，印度獨立後的中印關係理應十分友善，然而由於印度的政治領導者的狂妄，印度並沒有給中國應有的回報，印度在形式上脫離了英國而獨立，然而內部的問題很多，獨立兩年之後，「人民的生計不能比以前英治時代改善，吏治仍擺棄不了英國殖民地文官部的那一套作風，老闆固然換了，可是除了一些好聽的言辭和口號外，究竟給予人民有多少實惠呢？政府知道得很清楚，其實兩年的時間確也不能平地建設起一個理想的完美天國，他們太急功求成，太擔心政權不穩，因而不能平實地埋頭工作，卻在夾縫裏找出了另一條蹊徑，轉移人民不滿的情緒到那不可即的玫瑰花圃裏去，大踏步地要在亞洲大陸上爭雄，並且擴疆」。(頁 588) 擴疆的行動表現在兼併錫金，侵略布丹和尼泊爾，接著而來的就是進略中國的西藏。

從清末以來，英國勢力就從印度不斷侵入西藏，簽訂了幾個條約，對我國的主權損害甚大（頁 594 至 597），印度獨立後，印度竟欲繼承英國在西藏所獲的既得利益，使得中印兩國因西藏問題而發生不愉快的爭執。

印度政府領導人的短視和利慾薰心，令中國人感到痛惜，甘地的非暴力主義隨著火葬場的煙灰而消散，甘地具有超人的睿智，何以後繼的領導人竟然沒有從甘地身上學到一點聰明？甘地的偉大人格和博愛精神，何以沒能感化後繼領導人的自私和野心？這是印度人民的悲哀。直到今天，印度然無法達到亞洲強國的願望，印度人該回過頭來重溫甘地的思想，接受甘地的光輝，牢記甘地的那句話：「唯一能為人所佔有的，便是不佔有。」

一九四六年九月，尼赫魯政府宣布成立，中國即首先將駐印度的專員公署升格為大使館，次年二月中國政府特派羅家倫先生為駐印大使，五月五日羅大使到達印度首都新德里，此為世界各國駐印大使蒞任之第一人。吳先生亦於此時隨羅家倫大使同赴印度，研究印度歷史與當代政治，並為中央日報南京總社駐印特派員。因此，本書述及一九四七年後的印度，多係吳先生親身目睹，書中引用許多資料係第一手史料，彌足珍貴，這是本書又一項特的貢獻。

最後，要附及由於本書的出版而引發起的一點感想。印度是我們的鄰國，中印之

間有將近兩千年的交往關係，印度的佛教對中國的社會影響極大，雙方的現實利害關係又很敏銳，然而目前國內對印度的瞭解實在不夠，對印度的研究工作更是缺乏，將來如果一旦情勢發生變化，我們和研究的關係又轉為密切，真希望國內能多有人研究印度問題。而目前國內有十所大學設有歷史系，據我的瞭解，都沒有開設印度史課程，也許是由於師資難覓。倘由於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史學界對印度史研究的興趣，使印度史研究的園地花草茂盛，這對學術和國家都是有益的。

（原載中央日報副刊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三日至四日）



羅大使（右三）、均權女士（前排左一）、印度總理尼赫魯（前排左二）

吳叔心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方雪純

嘗聞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叔心先生以一介書生能為黨國建立非常之事功者，當然得力於先生之非常才具；但非常之才具得以發揮，必須有認識、發掘及任使先生，智識之人，和可供其揮灑自如的環境。准此，國際關係所早期主事者，以及該所之建立和發展，和先生事功之成就，是密不可分的。

時當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經國先生感於政府遷台、蔣公復位不久，亟需腹心、股肱之士，為當軸畫謀定策之助，乃集合貞亮才識之士，組織總統府資料組於圓山遠廬，邵毓麟、卜道明、馬星野諸先生，為該組之重要成員。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蔣經國先生改組智囊機構，一方面將現職軍政人員組成國家安全局；另一方面，將學術界人士組成國際關係研究會，以前軍委會侍從室組長邵毓麟博士為主任，研究人員包括蘇俄問題專家卜道明、匪情問題專家前濟南市長王崇五、國際問題專家鮑靜安、許念曾（前駐法大使），公使級外交官汪公紀、日本問題專家朱少先、羅長閩、張棟材、德國問題專家關德懋、蘇俄問題關思敏、新聞界學者馬星野等，都是學有專長之士。民國四十五年，吳先生因馬星野先生之介紹，參加圓山的研究工作，負責東南亞問題研究，仍兼中央日報主筆。民國四十六年，卜道明先生繼邵毓麟為國際關係研究會主任，馬星野先生外放巴拿馬共和國大使，一再來函向卜先生力荐叔心先生之才堪大用；卜先生與馬先生交誼深厚，又與叔心先生有桑梓之誼，乃向經國先生荐吳。民國四十八年，鮑靜安外調行政院敵情研究室主任，擢升吳叔心繼任副主任並兼《問題與研究》月刊主編。同年蔣先生感於國際關係研究會尚屬人民團體，難以發揮作用；乃囑卜主任以學術研究機構名義向教育部立案，正式改組為私立國際關係研究所，該機構之設計及編組，均委諸叔心先生負責，備極辛勞。

民國五十二年，卜主任內定外放駐越南共和國大使，未及到任而癌症發作，乃入榮總治療，所務由叔心先生代理，另一副主任王崇五調為顧問，由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召集人的鄧公玄先生繼任，《問題與研究》亦改由鄧副主任主編。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卜先生病逝，由叔心先生正式接長國際關係研究所董事長兼主任，該所自此步入開展工作、發揮作用之鼎盛時期。

叔心先生長國際關係研究所，自民國五十三年五月，迄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凡八年三個月，其任內的主要成就有如下述：

其一，充實、培養人材。國際關係會時期，專任之研究人員不過十餘人，連兼任研究員亦不超過三十人，其有博士學位者僅留德博士張貴永一人而已。國際關係研究所組成後，擴充人員至百餘人，其下轄國際、匪情、俄情、經濟的研究組，資料、編譯、出版、合作交換的業務組，秘書、總務、會計三行政組；其充實、培養人材方式，分成三個方面來進行：

(一) 延攬中年權威學者提升研究水準：叔心於接任之初，即延聘中共黨史權威學者郭華倫為副主任並《匪情月報》主編，郭氏係早期中共重要幹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即其屬下工作人員。郭任職期間，連續在《匪情月報》撰寫有關中共黨史文章，後輯為《中共史論》一部，成為中外研究中共黨史最權威著作；此外，郭亦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講授中共黨史課程；直至今日，其著作仍為該所必修課程。

叔心先生延攬的另一位副主任，是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的召集委員鄧公玄，鄧是湖南人，留美碩士，北伐期中回國參加工作；抗戰期中，曾任桂林行營秘書長；鄧副主任負責綜理國際問題研究，兼《問題與研究》月刊主編，該刊目前仍在發行，也是多度獲得金鼎獎的刊物。

而在充實研究陣營方面，則先後禮聘台灣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林霖博士(不久病故)、台大法學院教授、國際法權威雷崧生博士、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陳紹賢先生、名經濟學家劉師誠教授(其後曾任台銀董事長、經濟部政次)、歷史學家陳三井先生等多人參加工作，一時人士萃薈。

(二) 延攬青年歸國學人，以備國家建設及世代交替之需：此一點為當時重要政策之一，曾先後延聘連戰博士(後任副總統)、施啟揚博士(後任司法院長)、高銘輝博士(曾任青輔會主委)、李鍾桂博士(曾任青年救國團主任)、王人傑博士(曾任青工會副主任、政大外交系主任等職)，關中博士(曾任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立法委員，考試院院長)，金開鑫博士(曾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考紀會主委等職)，金神保教授等多人，蔚成國家樑幹，擔負國家進入現代的責任。

(三) 招考或聘用大學方畢業之青年，參加工作或學習培養，則分成二個途徑進行：

1. 招考大學畢業優秀青年，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助理員，任研究員之助理，實習研究工作，並加以培養深造，使獲得國內外大學相關學門碩士學位，並循序接替研究工作，包括畢英賢(俄國問題)、張虎(大陸及港、澳問題)、區鉅龍(美國問題)、范利民(大陸問題)、張深俊(政大國關中心編譯組長)

等人，在外界擔任重要工作等有李本京博士（淡江大學教授）、顏富章（外交部公使銜外交官）等人，均能有所成就。

2. 商洽獲得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博士之大力支持，創立東亞研究所，招收大學畢業青年，講授大陸問題及東亞問題有關課程，肄業期滿，授予碩士學位，充實社會各界認識中共及中國大陸與東亞各國情勢之人材，以應未來局勢之發展。

該所於五十七年開始招生，由叔心先生自兼所長，教務由政治大學規劃，行政則由國際關係研究所支援，初在台北市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授課，民國五十九年遷往木柵介壽路六十四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合址上課。聘任的教授有錢穆、郭華倫、鄧公玄、李登輝及吳所長本人等，叔心先生係講授東南亞史、印度史等。外籍教授包括吳克（美國南卡羅萊拉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卜遜尼（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吳元黎（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等人，陣營十分整齊。叔心先生延至六十一年始解卸所長，兼任教授則遲至八十年代初；可謂窮其半生精力於人才培養。

該所第一、二、三屆畢業同學，均屬親炙先生教授，斐然有成，為侯家國先生（曾任行政院顧問）、張良任先生（曾任海基會副祕書長）、施達郎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趙春山博士（曾任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段家鋒先生（曾任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所長、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施哲雄博士（曾任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該所教授）、吳安家博士（曾任國關中心副主任、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等，其餘分散社會各界，無不嶄露頭角。尤其在兩岸事務上，更有賴該所出身同學作為中堅。

其二，構建永久所址。該所成立之初，仍沿用國際關係研究所舊址—圓山遠廬，位於圓山之巔，與動物園為鄰，僅有木造平房數棟，遠不敷使用；乃於民國四十九年租用台北市中正路（現改忠孝西路）中央日報大廈七樓辦公，唯地處鬧區，且房舍亦不夠發展之需，乃極籌建永久所址。



俊才先生在國研所舊址

經與軍方商洽，撥給指南山莊後半段空地供建築使用，此地處指南山腳，左右有小丘陵環抱，旁有公路直上指南宮，下往木柵街道，環境幽靜，交通亦很便利。建築工程由互助工程公司承包，先建辦公大樓，後增資料館，均為四層，外加研究生宿舍（二層）及餐廳、車房等，概由副研究員周鑫先生督建，全部工程於五十九年四月完竣，於五十九年五月遷入新址。其後各任均有添建中心與東亞研究所之共用。全部工程於五十九年四月完竣，於五十九年五月遷入新址。其後各任均有添建，現已成為一設施完善之獨立學園，為國關中心與東亞研究所之共用。



國際關係研究所搬遷至木柵新址，左起俊才先生、均權女士，右一為均權女士長兄馬星野先生，中立為馬先生夫人辜祖文女士，民國 59 年

其三，加強對外合作交換業務。在民國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間，可說是我國對外最艱苦、最孤立年代；尤其在學術研究上，更是向中共一面倒的情勢。叔心先生認為建立國際學術研究的國際合作的機制，是打破外交孤立和尋求輿論助力的有效方法；這必須從重點作起，即是從影響最大的美國和日本開始，再擴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其成效是：

(一) 與美國胡佛研究所建立合作關係，雙方從事資料和人員交換；依約我方研究人員每次一人，可到該所進行研究一年，而該所研究人員每次一人，可到東亞研究所任教一年。該所之資深研究員吳元黎博士、張公權先生（即張家璈。曾任國府交通部長）、馬大任先生（兼該所圖書館東方部負責人）、卜遜尼教授等，均與我方建立良好友誼，始終不變，吳元黎及卜遜尼曾在東亞所擔任客座教座。

與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建立人員交換關係，依約我方可選派助理員，每次一人至該中修讀碩士學位。該中心主任薛光前博士為國府離職外交官，熱心協助我開拓與美國學術界關係不遺餘力。薛氏捐館已屬多年。

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建立資料交換關係，依約雙方提供對方所缺少之資料，裨益研究工作匪淺。該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博士對我十分友善，凡我訪美人員，均曾獲其熱心協助，吳本人曾多次來台開會。

與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建立人員交換關係。依我方可選派助理員，每次一人至該修讀碩士學位。該所長吳克博士與叔心先生交誼深厚，吳曾任東亞所客籍教授，亦經常來台訪問。

(二) 與日本內閣調查室建立合作關係。日本政府當時雖竭力親共，企圖儘速與中共建立正式關係，但其內閣調查室負責人桑原壽二先生卻是堅決的反共者。桑原先生畢業於我國名學府「北京大學」，為一深受傳統中國文化浸潤的學者與中國通，渠自民國五十年代親訪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後，即與我方全力合作，迨日本與中共建交之後，桑原先生即擔任《問題與研究》之發行人，協助國研所駐東京辦事人員張棟材、楊合義開展業務，三十年如一日，而連絡日本學術界人士支持中華民國，亦為桑原先生最熱心之義務工作。為多年來一直舉行中、日「中國問題」研討會，日方概由其主辦，可見一斑。

與日本京都大學建立人員交換關係。日本學術界普遍親近中共，無一敢與我交往者，當時僅有京都大學與國研所建立人員交換關係，依約每次可互派研究人員至對方研究一年；曾任行政院秘書處主任侯家國先生為我方首次派往京大研究人員。但該校氣氛仍不適反共立場學人長期居留，故以後未再有人前往。

(三) 籌開「中、美」及「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打開國際間孤立局面之另一方式，為採取雙邊學術研討會，以溝通彼此意見，尋覓雙方學術研究合作之機會，爭取友誼與同情。當時之國際情勢，一為中共全力圖謀進入聯合國，將我拋出國際舞台；二為日本政府圖謀與中共建立正式關係，為箭在弦。我為因應此一情勢，美、日兩國之學術研討會必須迅即舉行，以開關後徑：

1. 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經數月籌備，於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台北市舉行，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辦，政治大學等三單位協辦，出席學者中方一百人，美方三十一人，提出論文共二十六篇，討論氣氛熱烈而和諧，接待工作週詳、圓滿，為中美學術界合作探討，跨出穩健的第一步。
2. 第二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由美方主持，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我方派出二十八人代表團出席，由叔心先生領隊，提出論文五篇，另由關中副研究員率資料展覽團在美展出，展後將展品贈予美方。兩團隊均圓滿達成任務。
3. 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經過桑原先生等在日之多時連絡，雙方舉行學術研討會之時機終告成熟，首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由我方國際關係所主辦，中央日報等五家新聞同業贊助，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廿四日在台北舉行。日方由中村菊男及桑原壽二領隊，學者、專家共廿四人；我方由叔心先生為首，出席學者、專家七十餘人，雙方共提出論四十二篇，經過熱烈討論，對中日共同利益，取得相當共識。事為日本與中共建交前夕，其部分學者因之警覺與團結。

其四，普及國人對中共之認知。在民國六十年代之前，國人對中共認識，只是少數敵情研判機構及分析專家之獨佔權利，一般民眾避之唯恐不及，惶論深入了解認知？國際關係研究所為糾正此一偏頗現象，採取以下二項步驟：

（一）建立「中國大陸問題」為科際綜合學門，以打破國人忌諱、迴避思想。叔心先生運用其兼任中央日報主筆地位，多度著論闡明此一觀點；首獲學界及新聞界之支持，漸獲各界之認同，而終達普及之目的。

（二）在公私立大、專院校開設「中國大陸問題」課程：叔心先生深知一種觀念的普及，必先從知識分子帶頭樹立；所以把國研所的研究員及東亞所的早期畢業同學作為師資，在大學開設「中國大陸問題」課程，確立認識中國大陸的真實面貌，最先是國立大學，而後是私立大學，最後是公、私立專科學校，如此構成一個綿密的普及網。

以上所述，是叔心先生辦國際關係研究所作的一些重大工作。總的來說：

- （一）從內向型的智囊工作，轉變為開創性的全民服務工作。

(二) 從單純的敵情分析工作轉變為多功能的學術性工作。

(三) 從觀察一時的工作轉變為向前幾十年的前瞻性工作。

在民國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國際關係研究所，雖然隨時代走進歷史，叔心先生亦作古人；但他所創辦的一系列事業，卻延綿至今不衰，其影響是深遠的！



越南軍事訪問團來訪，時在國研所遷入新址之前後，俊才先生居中著西裝

俊才先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尹慶耀

吳公俊才先生博學多能，創新進取，其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先生主持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時期，功業自在學術方面。然而，深一層想，其意義又何止於此呢？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前身為國際關係研究會，成立於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一日，由邵毓麟、馬星野、卜道明諸先生發起，向內政部註冊，係一人民團體。其宗旨專在研究中國大陸及國防問題，提供政府參考。先生自始即參與其事。

民國五十年，國際關係研究會為擴大學術研究規模，擴展對國內外學術機構的聯繫與合作，呈准教育部改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址初設於台北市中正路中央日報大樓七樓，下設國際、匪情、俄情、經濟、邊疆等五個研究組及編譯、出版、資料、合作交換、秘書、會計、總務等七個業務組，規模粗具。改制期間的設計、籌備等事宜，均出先生之手，故先生乃為國研所實際的創辦人。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仍為民間團體，依法成立董事會，推選卜道明先生為董事長兼主任。五十三年四月，卜先生積勞病故，經董事會改選吳先生為董事長兼主任，直到六十一年八月，先生奉派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始引離職。先生主持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務時，辛勤備著，建樹良多。茲舉其犖犖大者為下：

一、推展學術研究

(一) 大陸研究學術化：大陸變色後，對當代中國問題之研究，頗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其實我政府遷台未久，學術團體不多，加之在中共虎視眈眈情況下，我對大陸問題的研究，多屬情報研判性質。長此以往，我將在當代中國研究學術領域內，瞠乎世界之後。先生有鑒及此，乃廣事延攬國內知名學者參加國際關係研究所陣容，藉以提高研究水準，促使大陸問題研究學術化，且卓有成就。如郭華倫教授之《中共史論》英譯發行後，在國際間流傳，著有聲譽。再者，學者參與中國大陸及國際問題研究，得以進一步瞭解政府之政策，其研究成果亦可提供政府決策參考，使彼此間絕無疏離感。

(二) 學術研究國際化：學術研究國際化，為先生另一著眼致力處。先生任內，曾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聖若望大學亞州研究中心，日本的外語大學、京都大學以及韓國的研究機構等，建立了互派

客座研究員的關係。日本防衛大學教授川島弘三、韓國北韓研究所所長金昌順，均曾來所研究甚久。

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乃促使「大陸問題」學術研究國際化的重要步驟。先生任內計有：

(一)中美學術研討會：自民國五十九年起，與美國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嗣後每年輪流在中華民國和美國舉行，以迄於今。美國著名學者如史卡拉匹諾、吳克、席格爾等及美籍華裔學者吳文津、吳元黎、鄭喆希，鄭竹園諸先生，均曾多次參加。

(二)中日學術研討會：自民國六十年起，與日本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此後每年在中華民國及日本輪流舉行，以迄於今。

此外，與韓國也互派學者參加對方的學術會議。惟侯先生離職後的民國六十九年，雙方合作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始行制度化。

歷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均由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編印專輯。日本也出版日文論文專輯，或在日文版《問題與研究》月刊上發表。

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在國內實開風氣之先。此項會議之舉行，使「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日益普遍化，成為國際學術研究之一重要領域。且國內外學者齊集一堂，交換研究方法與心得，彼此切磋，取長補短，自可使學術研究益加精進。亦可使彼此觀點日趨接近，而國外學者對我國之認識，也隨之加深。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外國學者，均為學術界聞人，且不乏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迨我退出聯合國及中日、中美相繼斷交後，學術會議照常舉行，其在國民外交方面發揮之功能，又豈可以道里計！

三、出版學術性雜誌

(一)《問題與研究》：主要為國際問題之研究和國際動態的報導，間或刊載有關於中國大陸問題之學術論文。除所內同仁寫作外，亦接受國內外學者的論著。

(二)《匪情月報》(後改名《中國大陸研究》)：純為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刊物，亦轉載中共原始資料。

(三) *Issues & Studies*：民國五十一年二月編印《大陸匪情分析》英文月刊一種，

專供國外人士參考。五十三年十月，應國際人士要求，擴大篇幅，仍名 *Issues & Studies*。

(四)《問題與研究》日文版：六十年七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在日本東京設置辦事處，同年九月在日本發行日文版《問題與研究》月刊，刊載中日學者學術論著，但以有關大陸問題為主。

(五)《東亞季刊》：民國五十六年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與國立政治大學合辦東亞研究所，由先生任所長。五十七年招收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五十八年七月，創刊《東亞季刊》，內容較重共黨理論與歷史之研究，其出版發引業務，由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兼理。

四、資料之蒐購、交換與供應

為便利學術研究之參考，先生極端重視圖書、報章、雜誌及其他資料之蒐購、編整、度藏。五十五年一月，董事會決定使國研所成為資料供應中心，負責與國內外學術機構聯繫提供資料及研究之便利。乃更加強與國外學術機構進行資料交換。在美國方面，有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聖若聖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關係研究所、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等；西德方面有西柏林大學中蘇研究所、慕尼黑蘇聯問題研究所；日本為國際情勢研究會、世界政經調查會；韓國為高麗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以上學術機構，均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建立了資料交換關係。在國內，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則成為國際問題及中共研究的資料供應中心。

五、興建新所址

由於業務不斷擴展，研究人員日夥，圖書資料逐日增多，原有中央日報七樓空間，已無法容納。先生乃洽得木柵政治大學附近萬壽路土地三千餘坪，興建新的辦公大樓、圖書館大樓及其他房舍，費時兩年始得竣工，於民國五十九年四月遷入使用。新所址規模宏偉、環境清幽，為國內外所稱道。

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改制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隸屬國立政治大學，業務繼續拓展，規模益趨宏大截至本文執筆時，定期國際學術研討會已增至六項；具有合作交流關係的國際學術機構十七個單位；出版中外文期刊八種；中文叢書一一六種；英文叢書四六種；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專題報告九種；國防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與評估六種。在圖書資料方面，蒐藏中外圖書約一〇萬餘冊；中外期刊九五八種；中外報紙一八九種；微縮資料二人、一八八件。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其研究環境、研究陣容、圖書資料以及國際學術活動各方面，均在國際間享有盛名。此乃歷屆主任相繼慘澹經營之成果。而先生則為從無到有、

精心創業的奠基人，功不可沒也。先生主持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時期，慶耀全程追隨。深感先生治事勤、治學嚴，待人則謙和大度，從無厲色。追隨先生左右，未感有長官與僚屬之分際，恆覺先生亦師亦友，自身則受益良多。



**國研所成立九週年,新廈落成典禮
與主任攝於簽名處.** 1970.5.20.

先生遇事博採眾議，絕不固執己見。惟遇原則性問題，則毅然堅持。遇有困難，一往直前，決不躊躇瞻顧。

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於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召開後，原定第二屆於一九七二年在東京舉行。詎料是年日本承認中共並與我斷交，致研討會之會期被迫推遲至一九七三年九月。屆期，日方學者唯恐中共干擾，並顧及中方代表安全，建議易地舉行。先生則堅持會議應照原議在日本首都堂堂召開，否則寧可暫停。結果研討會仍在東京順利舉行，未生枝節。先生之不避艱險，堅持原則，於此可見一斑。

先生常勗勉同仁，對國際及中國大陸問題之研究，應具前瞻性。凡有重大問題，應根據學理、資料等，預作評估、建議，供政府決策參考。學術研究素不可存有保守心態。若一切等待事發後再作評述，此乃歷史學家的任務，非吾人之職責。先生奉公為國，積勞成疾，不幸辭世。但先生的功業永垂世間，先生的風範，仍縈迴在我們腦際，映現在我們眼前，策勵我們繼續前進！

濁浪中的清流

桑原壽二

張隆義譯

吳俊才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於湖南沅江縣。我與俊才先生有三十年的交誼，所得到的印象，一言以蔽之，是最標準的彬彬君子，從來沒有看過他生氣的表情或言語，不論在任何場合，都能以理性來處理事情，我雖虛長他十三歲，但在心中卻以兄事之。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那時吳先生從美國回國，途經東京，迎接吳先生參加國際情勢研究會主辦的「環繞吳俊才先生座談會」的時候了。聽了一個多鐘頭吳先生的中共分析之後，我一開頭就發言說：「我祈求毛澤東長命，毛澤東那種破壞性的非理性政策，對大陸本身有多大的教育效果，實在難以估量，這對於向中共一邊倒的日本來說，其啟蒙效果並不小。在這個意義上，我祈願毛澤東長命，決不是逆向思考」。對於參加者來說，聽起來有些古怪的這一發言，我自己心裡也覺得不自在。但吳先生卻莞爾一笑回答說：「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偏執狂的革命一邊倒，特別對我國是有很大效果的反面教育。我所擔憂的是代他而起的政治家，例如像周恩來等人物的出現，會迷惑世人的耳目。從革命家代之而起的政治家是我所擔心的」。這是吳先生和我最初的見面，對我來說，也是我生涯中極為重要的相會。

此後不久，吳先生透過中華民國大使館寄來了邀請函，雖然我與大使館各位先生有較廣泛的交往，但對有關中華民國的知識還很欠缺，而感困惑。翌年的一九七〇年一月初旬，我飛抵松山機場，在進入中華民國台灣第一步的那一天，被帶到正進行基礎建築工事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聽取了充滿熱絡的研究活動的重要性與將來的構想，依照該構想，今日已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大智庫。老實說，這在當時是想也沒想到的。以後，我對吳先生的人品有進一步的瞭解，知道吳先生關心學問、研究更多於關心政治。我想看到他所創辦的研究所，能有今日這樣的發展情況，吳先生一定是抱著一種的滿足感，而到彼界悠遊去了。

當晚，在台北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店接受款待，得有機會見到研究所的各位先生，也就在那個時候，要求我第二天到國立政治大學演講，害我一時大為慌張。因為我不知道接受這種招待，要發表研究成果是個慣例，不懂得禮儀的我，什麼也沒準備，必要的資料一張也沒帶來。

在研究所的各位先生的乾杯洗禮下，雖然有些醜酌，但心裡卻沒有醉。回到飯店

後，等待酒後清醒些，即開始起草演講稿。這與一般的演講不同，對象是教授、學生，所以應該是研究成果的發表。台北的一月比想像中的還玲，我至今仍清楚記得，當時幾乎是披著毛毯，整夜苦思。完稿的時候，看到飯店的窗外已經開始泛白了，想馬上喝杯咖啡，但飯店的餐廳卻還沒有開店，這是我在中華民國的第一日、第一夜。

面對幾十位學生與十幾位的教授，在曾永賢先生卓越的口譯協助下，演講總算順利結束。演講主要是以中日兩民族的思惟方式的不同為論點來發揮。簡單來說，就是日本民族的思考特質，其理想天地經常是在海外，例如過去對唐朝、天竺的憧憬；相對地，中華民族的思考方式，卻不在海外，而在於內部。其結果，日本對海外的好奇心，就貪求無厭的吸收西洋文明，提早了文明開化。這種日本的思考方式，必然便伴隨著政治主體性的喪失；與此明顯相對的中國思惟方式，便伴隨著有強烈自我認定的政治主體性。現在中共政治姿態以及日本對中共的對應態度，便清楚表現出這種差異。我還清楚記得，我講到這裏，偷偷看了吳俊才先生一下，看他還算滿意的樣子，才鬆了一口氣。

演講後進入質疑時間，有一個學生問我對美國費正清教授的評價如何，一時讓我感到心虛；因為台北學界、輿論界對該教授的評價到底如何，我並不清楚，使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於是我坦率地說，對於費博士這位中國專家我並沒有評論的資格，但表示敬意，至於對中共的分析，覺得有時則欠缺明確，有時則在討好中共，我個人並不想給與太高的評價。回答到這裡覺得似乎有點傲慢，而說不出話來，但感覺有同意的動向，而放下了一顆不安的心。

演講會結束後，在校內接受政治大學校長的餐宴，他一開頭先說，「決不是外交辭令」，而對演講給與很高的評價，心中真是高興。不用說，這是我意外的光榮，而總算能不損吳先生的面子，順利結束，使我能再度鬆了一口氣。這對我來說，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在政治大學的一些刻骨銘心的事情哦！再說一次，能夠不損吳先生的面子，真是比什麼都覺得高興。

我本來生性就極不善交際，對於好意的慇懃招待，也無法好好的應對，一定有很多失禮的地方，但總算對中華民國台灣加探了認識而回國，回國後不久，張棟材先生承吳先生之意，要在日本發行月刊而到日本來。月刊的名稱，吳先生好像預定為「瞻望」，但其意義與文字在日本並不容易瞭解，想要譯成「展望」，則又因已有以展望名稱發行的雜誌，經過幾位先生協議的結果，決定「問題與研究」較適當。自此以來，到目前第二十六卷九期，從未缺號，而能持續發行，並在日本的言論界建立了一定的地位，這都是張棟材先生及以後繼任的楊合義先生合心努力的結果。特別要提出的是每當有台灣問題特刊號，隨即就被搶購一空。在這背後可以看到日本一般對台灣認識的變化與進步，而不禁欣喜。對我來說，感到慚

愧的是無法對雜誌發行助一臂之力，幾乎每天自責「什麼也沒做」，但另一方面，在內心深處，確實為吳先生的宿願得償，而竊以為傲。

在雜誌發行之後，緊接著要求召開「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這和雜誌的發行性質不同，特別在日本更是不容易的問題。在這裏有必要對當時日本社會情況和籠罩日本的氣氛稍加說明。

很遺憾，日本的風潮是向中共一面倒，禮讚中共成為一股熱潮，風靡了產官學各界。將中華民國視為敵人，贊同中華民國的人則被視為台灣派，反動分子，為社會，也為言論界所疏離。在這種風潮中，以中共問題為主題的大陸問題研討會，其本身就是反動者的會議，要克服這種風潮，募集參加會議的人員，基本上就很困難；因為參加的話，就會受到來自服務單位、教授會、言論界的另眼看待，等於是自陷於孤立。可是卻不容遲疑退縮，不然就自陷於完全的失敗主義。

那麼，又如何使它成功呢？無疑的，這就成為一項沈重的課題。首先，代表團長的人選，不單是要有學識，還要有團長的風格。在考慮之後，就把人選鎖定在平日即有交往的慶應大學教授中村菊男先生，懇請擔任團長，想不到一拍即響，很痛快地就承諾下來。到此已成功了一半，那一天讓我心情整天都是開朗的。

就日本當時的情況，光這樣是不夠的，還需要政界有力人士在背後支持。於是走訪早已有密切往來的前首相岸信介，到他的事務所請求支援；因有中華民國大使館的美言相助，而得到承諾。這就會議的權威或持續性上來說，都獲得很大的成功。在岸先生的要求下，得到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前眾議院議長灘尾弘吉的援助，後來經藤尾正行會長以至今日，該懇談會是大陸問題研討會在政界上的後盾，就這樣，建立了會議政界的根基。後來以貴賓身份參加會議的前眾議院議長船田中以及前農業水產大臣倉石忠雄，都是在岸信介先生的指定下獲得實現。

發行「問題與研究」月刊與舉辦大陸問題研討會，無可否認的，這兩條根基有組織地填補了中日斷交後中日關係的空白期，成為維持中日關係的聯繫管道。換句話說，創設這兩條根基的吳俊才先生是確立中日關係挖掘水井的人。對於吳先生的此項功績，做為後人的我們，給與再高的評價也不會覺得過份。

經過上述的過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底，大陸問題研討會得以順利召開，完成吳先生的心願，我心中也竊自感到驕傲。同時，克服日本那種嚴苛的條件，而敢參與此項會議的日本的學者、專家那種氣概與使命感，亦彌足珍貴，日本也還有這麼多這樣的知識份子，這是我當時的感受。讓我們敢於參加，真正的動機，不用說也是出自一種的使命感，但無可否認的，在心底下有一股義氣，則是真正的動機。

在台北迎接我們的是全市充滿歡迎的氣氛，各大報均不惜大篇幅的加以報導，基本的論調都是闡述「雪中送炭」，這大概是因為吳先生的指導有功。在這一整天中，真實地顯示出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後嚴苛的國際環境，同時也充分回應日本代表團這種基於義氣的行動。這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當時的台北以及此種論調一直都成為談論的話題。

這個會議以一句話來形容的話，可用「會議在跳躍」來表達。在這裡所醞釀出的一股熱氣，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表達，那是中日有識之士的大合唱。本來，文明是合理主義，文化是非合理的。那是民族所編織出來的文化，對該民族來說，決不是非合理的，而是一個超合理的世界。課堂或學術會議在邏輯上本來就必須是徹頭徹尾的合理主義。但是，此一中日會議所釀造出來的氣氛，立場雖各有不同，卻是同樣具有嚴苛的歷史的人，才能共同得到超合理的世界。換句話說，那是超越學術，昇華至文化層次的世界。

第一屆會議的這種情況，成為這個會議的傳統。確實，隨著歲月的長久，體驗那一段嚴苛歷史的人物，一個一個地離去，現在只剩寥寥無幾人了。也因為這樣，第一屆會議所釀造出來的火熱的氣氛，多少已變淡薄，這是世代交替所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我確信第一屆會議所留下來的傳統，成為一股伏流，仍潛流至今。如上所述，其創始者的吳先生的許多的腳跡，也留在我們日本，來自吳先生的諸多期許，對於不肖的我，是承擔不起的光榮。心裡一直想著總得回報他的期許，而荏苒時日。1996年底突然接到吳先生在美國逝世的訃聞，瞬時，前述的一些情景，久久縈繞在我的心中。

現在我僅只能禱念他的安息，合掌。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與經國先生出席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俊才先生代表歡迎，1971年

追念吳俊才先生

關 中

初識吳先生是民國五十八年我第一次留學回國的時候，我因為中山獎學金兩年獎學金期滿必須回國，承陳裕清先生和丘宏達教授介紹至當時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當時的主任就是吳俊才先生。回國第一次去看吳先生，彼此都很生疏，吳先生對我也沒有特別的好感。

民國五十八年回國主要的目的是蒐集博士論文的資料，我在美國唸書很幸運也很順利，我的指導教授本來希望我留在美國寫論文，我則決定回國寫論文，因為我的論文題目是「戰時國共談判」。我認為國內的資料為第一手資料，所以選擇國際關係研究所，希望藉研究的機會來完成論文，對於工作的條件與長官的態度並不是十分在意。

吳先生是位非常有使命感和責任心的人，當時他正在推動兩件重大的工作，一是開放大學院校的大陸問題研究，二是大陸問題研究的國際合作。民國五十七年在國立政治大學成立「東亞研究所」，開始培養大陸問題研究的師資，民國六十年在台北舉辦第一次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建立國際共同研究中共問題的管道。這是吳先生理想和理念的實現，我剛好在這段期間回國工作，所以很自然的參與了這些工作，雖然只是技術層面的工作，但對我卻是極佳的訓練。由於在實際工作上參與較多，使寫論文的時間大為減少；但也由於工作的認真投入，贏得了吳先生的賞識與信賴。

當時吳先生負責國研所跟東亞所兩個單位，所以我不久也同時擔任兩個工作，一個是東亞所的講師，一個是國研所的副研究員兼資料組組長。為了幫助我取得東亞所講師的職位，我大學的系主任李其泰先生特別把他自己在外交系的兩門課讓給我，我在東亞所主要的工作是主編《東亞季刊》。吳先生非常重視這份學術性的刊物，每期的重點與主要邀稿都會慎重地和我討論。至於國研中心資料組可說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匪情」資料中心，它的特點是期刊和剪報，所以工作同仁人數較多，這也是我一生第一次擔任「主管」的職務。當時我只有二十九歲，可見吳先生對年輕人的重視和提拔。根幸運的，二年多的任內，「幸無隕越」，也推動了一些改革，相信並未辜負吳先生的期望。

我原計劃在國內服務兩年後赴美繼續完成學業，這一構想也很早向吳先生報告，但後來卻延長了一年，原因便是報答吳先生的知遇之恩。前面提過當時吳先生的大志和大事之一，便是要將大陸問題研究學術化及國際化，所以在創立東亞所之

後，便積極籌辦中美大陸會議。吳先生本身與外國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和機構本無太多的關係和淵源，所以在推動此一工作上格外的辛苦。好在我們國外的學者十分支持吳先生這一理想，經過不斷的連繫，終於能夠邀請了一流的國內外學者，參加了民國五十九年第一次的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而且與會的美方學者承諾雙方合作，在台北和美國每年輪流主辦，吳先生多年的努力終於有了具體的成果。這一研討會迄今仍繼續舉辦，吳先生的遠見和毅力也為所有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專家所肯定。

當時，由於中共並未對外開放，所以我國所保存的中共資料成為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重要資訊來源，若干知名學者均係在台灣住上一年半載才能完成他們的博士論文或研究計劃，但能到台灣來的畢竟有限，此一事實，又引發了吳先生的另一個「雄心大志」。第二次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係由美方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主辦，訂於舊金山舉行。在台北的研討會甫告結束，吳先生便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面授機宜」，指示我與國內各主要「匪情」研究機構洽商，利用在美舉行的會議辦理一場大規模的資料展覽。由於國內值得展覽的資料多係珍貴史料，所以必須複製；由於若干史料殘缺不全，所以必須註解或說明。從六十年七月到六十一年七月差不多一整年的時間，我大部份的期間都在忙於此一「任務」。最後，總算不負吳先生所託，圓滿完成使命。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在美國的第二屆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的資料展覽辦理完畢後，我便直接回到美國的學校撰寫論文。在這段期間，吳先生不但保留我在東亞所和國研中心的職務，並且在經濟上按月補助我，更不時寫信鼓勵我，使我不但無後顧之憂，並且充滿溫暖和信心。

民國六十三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吳先生已轉任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六十五年吳先生奉派出任駐薩爾瓦多大使，一年後返國出任中央日報社長。在這段期間，未能直接和吳先生共事，但吳先生對我的關切和指導甚多。

再次追隨吳先生是民國六十九年，吳先生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我在中央政策會擔任副秘書長。當時由於中美斷交，蔣主席經國先生指示我草擬黨務革新方案，在此過程中，經常向吳先生請教獲益良多，但草案完成後都不了了之。我的任務改為與當時「黨外」人士溝通，吳先生基於對我的愛護，對此一工作曾深不以為然，直到七十年我奉派至台北市黨部擔任主委，他才較為釋然，不過仍然為我擔心。吳先生心目中我最適合的工作是文宣和學術研究，事實上，這也是他的最愛。他後來出任國民黨最高訓練機構—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乙職甚久。從我出任黨職開始，就經常被安排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去上課，並得過三次該院「實踐特優」的獎狀，吳先生對我的關愛可說是溢於言表。

民國七十六年至七十八委，我擔任組工會主任。組工會負責輔選規劃，難免有些黨紀案件與考紀會意見不一，但吳先生和我之間從無任何「誤會」，這也是吳先生對我的信賴與包容。七十八年底因選舉失敗交卸組工會主任乙職，吳先生奉派擔任監交，他講了一段極其感人的話：「黨一再把最艱難、最辛苦、最痛苦的工作交給關同志，他不但全力以赴，並且永遠無怨無悔的承擔一切後果！」吳先生平時不喜多言，晚年後幾近沈默，連應酬話似乎都懶得講，但那一天他好像十分激動，講話聲音也特別大。我了解吳先生對我有深刻的認識和深厚的情感，才会有這種體會，也才會講出這種話。

吳先生晚年身體一直不是很好，由於勤研易經，精神似較有寄託，每次見面總要和我「究天人之變」一番，對我總是慰勉有加。從第一次留學回國就和吳先生結了不解之緣，從吳先生身上可清晰看到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哲人已遠，典型猶在，追念吳先生最好的辦法便是發揮他這種書生報國的精神。

多是過江猛龍

漫記政大東亞所的早期師友

唐柱國

吳俊才與經國先生是政大東亞所的催生者

民國五十六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向新上任不久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條陳：中央政府遷臺已十餘年，在臺灣繼起的新生代青年，在承平環境中長大，對於「反共究竟是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什麼」？「為什麼要反共」？兩大問題，難免認識不清。為國家長遠發展計，必須及時培植對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實際有批判力的學術人才，為此應即籌設研究所，由碩士而博士，漸次開班，一方面招收大學畢業生，一面調集相關部門的現職優秀工作人員，混合培訓，為這一學門開拓學術化前景，強化我方抗擊並最後消滅共產主義的理論陣營。

那時經國先生名義上的位階雖僅副揆，但實際掌控大政已非一日，對於吳先生的建議，他馬上裁可，並就指定俊才先生負責這一擬議中的研究所的籌設。這就是今天在中華民國享譽甚隆，畢業生遍布政府和民間有關大陸研究、實務等工作崗位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由來。

因為這種性質的研究所尚無前例，不免有人對於「反共」能否學術化有所懷疑。據知時任政大校長的劉季洪，就是持這種態度的有力人士之一。經國先生為著催生，並使這個單位附屬政大。曾親訪劉季洪，最後終於化除一切阻力，使事底於成。可見經國先生是真把這當作要事處理的。

如果只憑後台硬，而主事人不得力，東亞所雖不至於胎死，至少不會在短短一年內便籌備就緒，第二年便能招生開學。那時吳俊才正值精力健旺的英年。他外型溫文儒雅，實則是個熱情如火的革命志士型人物，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兼有很強的規劃及執行能力。他找來早年臺灣省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計畫的起草人劉岫青，做主要的行政助手，吸納第一個以中共為主題撰寫學位論文的國產博士曹伯一、剛回國的中山獎學金的學者關中、苦學出身的張煥卿等人為班底，很快編竣課程，確定了教授陣容及招生計畫。

極具分量的師資陣容

說來令人不信，這個由當時公認的「政治強人」蔣經國親自支持的研究所，開始時在政大校本部區連教室也排不出，一、二期的學生，竟擠在金華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中心」勉強挪出來的幾個小房間中上課。那場面雖然有點寒酸，但連師

資帶學生的陣容，卻很具分量，平級的別的研究所很難相比，請看幾位主要的任課老師：

教「中國歷史研究」的，是當時剛由香港回國定居不久的錢穆（賓四）先生。他老人家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史學權威；

教「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是陶希聖先生。他雖是學官兩棲，但他那由政治學理到實務都精熟的內涵，正合本所需要；

教「馬列主義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等主要課程的，是鄭學稼先生。他在這些方面著作等身，在他逝世多年後的今天，仍未見有任何人質疑他的權威；

教「中共黨史」的，是郭華倫先生。他本名郭潛，是中共三十年代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跟毛澤東、朱德平起平坐的「高幹」，中共二萬五千里流竄時，他是「中共中央民眾工作團團長」，本身就是中共黨史的一部分；

教「馬列主義哲學」的，是林一新先生。他是中共開山老祖陳獨秀的秘書，確實是陳那一肚子學問的傳人；

教「東南亞史」的，是吳俊才先生自己。他青年時代留學印度，在那佛陀之國面壁多年，所著的《印度史》，到現在還是各大學關於印度的主要參考書，對於以佛教文化為主的這片地區，他從史、地到當代人文，真是滾瓜爛熟；

教「社會主義比較研究」的，是任卓宣先生。他老人家對於「三民主義」全文，可以一字不遺背誦，這是許多人知道的，而他把全世界稱得上「家」的社會主義學說，整理成九十九個大宗，隨口能講述要旨，辨別同異，就只有確實用心上過他的課的人才知道；

一度在中華民國政壇叱吒風雲、曾任考試院長關中，那時還未開課，吳先生賦予他輔導學生生活的重任。有人說，關中後來辦黨務能舉重若輕，收放自如，跟這個階段與我們這群草山精水怪般的老少學生相處，所得到的磨煉，不無關聯。這雖是玩笑話，但非全無道理。

走在研究生和學員兩種同學結構中

當時已滿頭白髮的劉岫青先生，雖然有功於臺灣的土地改革，但應聘以研究員名義主理這個小小的研究所的行政事務，仍然兢兢業業。他的主要功能是應付我們這批多少有點擺老資格的調集來的學員，連我這個總是自行其是的公認不好擺布的人物，碰到他出面處理的事，也極少異議。

曾任考試委員曹伯一，那時是副教授銜，第一階段也沒有在所裡開課，主要責任是做稱為「東亞研究班」的特殊學員群與所方的橋樑。曹先生由於與我們這些學員中的許多人原來都是熟人，所以相處融洽，有時有人衝著他放炮，他也不計較，只是原原本本把意見上傳下達。

後來也做過東亞所所長的張煥卿，是出身員林實驗中學的流亡學生，經力學、苦學，取得學位。我們猜測吳先生是有意樹立這樣一個「標兵」，給經濟環境差的同學做榜樣的。他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做人真是很有特色，那時他的責任是協助教學行政事務。

前面提過，東亞所早期的學生在體制上分兩部分，部分是大學畢業後考進來的，稱研究生；另一部分是各相關單位保送來的，稱為學員，建制上屬於「東亞研究班」，班主任也是吳俊才。兩部分人上課在一起，只是年齡上差一截。但也有例外，考進去的段家鋒、毛仿傑，那時都已四十出頭；研究班中最小的我，年紀跟一般研究生相差無幾。由於兩部分人年齡、社會經歷相差甚大，所以不容易打成一片，直到畢業都有點像一層油一層水。只有個別的能遊走於兩者之間，左右逢源。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人無論有多輝煌的經歷，一「回鍋」再當學生，都不免再顯頑皮的本相。而人一旦同學，就一定產生一份特殊感情，東亞所同學的這個奇怪結構，使人對這一點體會得特別深刻。

「段半頭」「碰死鵝」其人其事

我跟段家鋒先生入學前並不相識，他是任官上校多年、兒子也進大學之後，才來投考的。家鋒為人溫厚，但意志極堅強，除了做學問不願輸給任何人之外，連體力也要跟年齡同他兒子相仿的同學拚。有一次去爬山，他為著爭先，累得口吐白沫，翻倒在地，但只休息片刻，拒絕任何人幫助，躍身起來，跟大家一道爬完全程。他那時已謝頂近半，我隨口給他取個綽號曰「段（斷）半頭」，他恨得牙癢癢的，但無奈我何。後來我被他沒頭沒腦罵過兩次：一次是他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因晚上久受那時幾近瘋狂的「極左」派人士騷擾，蓄了一肚子悶氣。六十三年我到紐約，某晚一番好意給他打電話報行蹤，不料他一拿起電話，就大罵一聲「你這混蛋到底想怎麼樣」，我聽了一愣，回說「半頭你這是怎麼了！」他才知是我，不但不道歉，還說我「活該」，他本來就找不到機會罵我，這是送上門來，讓他有個歪打正著的機會。然後兩人笑鬧了好一陣才收線。

第二次是我於留美多年後，回到臺北，打電話約他一道去看望鄭學稼老師，他在電話那頭罵過來：「你個渾球，鄭老師去世一年多了！」我被他罵得愣住了，兩

人各執電話一端，想說笑話也說不出來。家鋒畢業後升了將軍，做了國大代表，為人仍然是當年的那種風格。

畢業後也當了多年將軍的彭士諤，當年在東亞班中跟我一樣不太老實，只要有風有雨，有我一定也有他一份。有一天我信口對他說：「你至少有三兄弟」。他回說：「我是有三兄弟，你怎麼知道？」我說連他們的名字我都猜得出來，他說你小子不要胡吹！我說中共把雞鴨鵝共稱「三鳥」，你是「碰死鵝」（彭士諤），你的兄弟不就是「碰死雞」、「碰死鴨」麼！他當時氣鼓鼓地沒說什麼。過了幾天，班上一位從美國來留學的白人女生郝淑麗，在金華街走迷了路，我正巧碰見，便在街頭給她指點方向。不想「黃雀在後」，士諤在不遠處看到了這一幕，他算是逮著了機會，一閃到了我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小子野心不小，想走國際路線啊！」那時我正跟洪冬桂尚在熱戀之中，這個誤會傳出去如何得了！便連忙向士諤拿好言語，請他確認事實真相，萬毋誤會。我愈是央求，他的姿態便愈高，最後撂下一段話：「我現在有了這道緊箍咒，看你今後還敢厲害！」後來我對士諤真的規矩了一段日子，直到結了婚，解除了警報，他才鬆開了這條小辮子。

慧眼識英雄聘李登輝講授東亞農業發展史

曾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趙春山，是那時年紀最小的同學。他無論課前課後，都笑瞇瞇對我們這群小老頭叫「學長」。春山極聰明懂事，跟老師、同學都處得很好。因為我的年紀跟他相差不大，所以兩人走得很近，也談得來。有時上研討課，外校來的講員遲到，春山會提議「粟學長來講一段！」他看到我進進出出都是一個人，便問我為什麼還不結婚？我信口回說找不到對象！不料春山把我這句話當了真，很有心幫我的忙，有一天悄悄告訴我，替我物色到一個，問我要不要約著見個面？我看玩笑不能再開下去，才老實告訴他，我已有要好的女朋友。春山一怔，笑著說：「你這是真人不露相，搞甚麼嘛！」也沒怎麼怪我。七十年代我定居美西，有一次到美京華盛頓去，住在李慶平、吳德里（俊才老師的長女）家，聽他們說春山來到 D.C.，拚第二個博士學位。我拿起電話便打過去，一打便通。春山聽到我的聲音，相當高興，說要請我吃飯，我說你一個月只有那麼幾文獎學金，我怎麼忍心吃，還是我請罷！他說不行，沒有強龍請地頭蛇的道理，而且最近有點額外收入，正夠開銷。於是我跟慶平夫婦出去跟他碰面，吃了一頓。原來他剛收到中國時報一百美元稿費。當留學生還有這等氣度，真不含糊，我至今還對春山那次堅持請客過意不去。後來他回國，接任了東亞所長。

東亞所第一年結束，吳老師召集大家開會檢討教學，所裡的氣氛素來民主，有什麼「炮」都可以放。我們這些老學生意見比較多，有人提議要擴張知識面，把基礎打深，再多約些名師來所開課。吳先生接受了這個意見，並馬上實行。這一約，竟然約來了那時的農復會技正、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佩服吳老師的眼光，和鑑識學問的能力。那時李登輝先生知名度還不高，活動的範圍只在農業界。除非很留意學術界動態的人，否則跨行業認識他的人不多。吳先生在國研所當主任時，讀到李先生寫的論文，驚為奇才，把他請到國研所做特約研究員。東亞所增加新課目的計畫一開始，吳先生便又把李先生聘為兼任教授，講授東亞農業發展史。我初識吳老師時，覺得他這人斯斯文文，說話輕言細語，並不覺得有何了不起之處。後來我的老友李在芳兄跟我說過一句話：「吳俊才是唐縱之外湖南人中最厲害的一個。」在芳兄年輕時也是目無餘子的狂狷之士，他這句話引起我的注意，但一直將信將疑。直到後來李登輝先生受國家大用，我們當日的同窗回過頭來，才覺得吳老師果然了得，真能慧眼識英雄。

未改上課風格連請學生吃麵李老師都一本正經

李登輝先生應聘來授課時，東亞所已脫離金華街那寄人籬下的階段，遷到木柵指南山下國研所新建成的房舍中。第一次選李老師課的人不多，課室在一樓正面中正那一間，沒有坐滿。那時李老師正值壯年，走起路來步子好大，一踏上講壇，一句多餘的話也沒有，一聽便知是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人。他上課鈴一響便跨進教室，下課鈴一響便步出教室，真是分秒不差，規規矩矩。李老師在課堂上有兩大特點，沒有上過他的課的人是絕對講不出來的：第一是他容易出汗，由於精神專注，他彎腰寫黑板時，汗水大滴水滴落在平滑的水泥地上，從未有別的老師有相同情況；第二是李老師寫黑板喜歡寫對角線，既不橫書也不直書，那時我捉摸可能是他身體很高，直書須彎腰太深之故。

李老師的學問是真不含糊的。不是他後來當了總統，我們才這樣說。要知道，學問的高下是比出來的。他跟錢穆、陶希聖、鄭學稼等先生同時任課，如果他們之間有軒輊高下，以我們那幫老學生嘴巴之刁，老早便會議論不休。事實上那時也有個別新聘老師不討好，課開到後來幾乎沒人修而開不下去。李老師的課卻越開越旺。在他任教中接到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人事命令，才在大家依依之下離所前往任官。記得他離去時，請我們這些選他的課的學生吃了一碗牛肉麵，替他張羅的，是請他指導論文寫作的蔡達棠。吃麵時李老師也未改上課時的風格，正正經經，一句玩笑話也沒有說。他後來在宦途青雲直上，看得我們這些老學生目瞪口呆。某次在一個同學聚會的場合，有人冒出一句：「東亞所池水清淺，其中竟有潛龍！」這話很自負、傳神。

在東亞所任教的幾位大師，都絕不是浪得虛名，只是他們個性各異，表現有很大的不同。回想起來，他們張口、舉手投足，無不是美妙文章。

指導教授鄭學稼與經國先生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鄭學稼老師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這個學門中，領風騷數十年，但一生在仕途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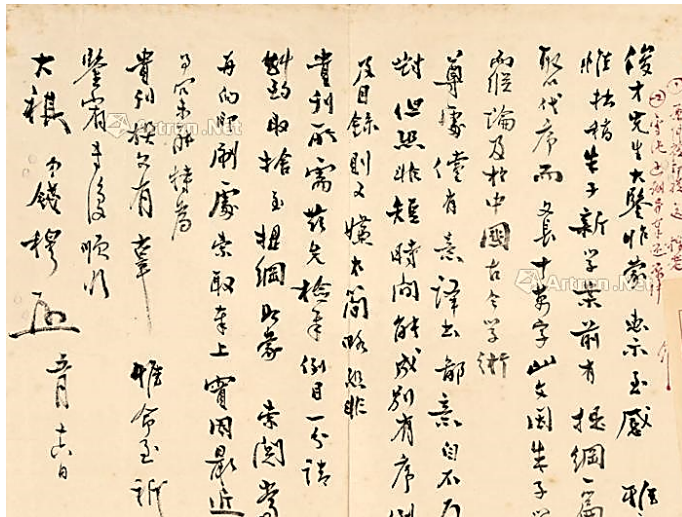
得意。他來臺之初，在臺灣大學經濟系任教，因為某些觀點跟當時的強人陳誠的看法有很大距離，而被解聘，若不是得另一個實力人物蔣經國力保，幾乎發生更嚴重的後果。因為他是我的指導老師，對我幾乎無話不談。有一次我問他老人家：蔣經國既然保你，為什麼沒有重用你呢？他才告訴我一個外間不知的秘密：有一次經國先生找他談，要他蒐集毛澤東禍國殃民、負盡天下蒼生的事實，寫一本毛的傳記性的東西，他答應了。可是他後來對經國先生說，這書他不能寫。蔣問為什麼？他說毛某縱有十萬百萬條滔天大罪，他總有些長處，才能混到今天的局面、地位，既是寫他的傳記，不能僅寫壞的一面。但是我們今天的環境，是不能提毛的另一面的，尺度稍一不慎，會有極大麻煩，到那時我死不足惜，恐還有誤國家。他這回答雖是實情，但蔣經國並不滿意，後來便不再跟他多往還。

鄭老師講課中常罵陳誠。他有時兩節課之間不休息。我有次跟他說，老師年紀大了，兩節課連下去上似非所宜，即使我們學生不累，你老人家也該休息。他說，誰說我沒有休息？我罵陳誠就是休息。鄭老師對我跟段家鋒有偏愛。他有一次給我九十九分，並在課堂上說：從我鄭某人處拿八十分都不容易，唐柱國是真是有點料子。他老人家這話，當時在班上的學弟、後來很紅火的張天霖將軍還記得，他還曾主動跟我提起這一段。我旅居美國的時候，有一天到舊金山機場送朋友，忽然後面有個聲音：「哈哈，老唐，我找得你好苦，你怎麼躲在這裡！」回頭一看，是興沖沖的鄭老師。那是我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他去世我全然不曉得，深悔有負師恩。

段家鋒為了學得鄭老師那一肚子學問，真是用心良苦。那時鄭師母重病多年，鄭老師親自侍奉，苦不堪言。家鋒跟鄭老師建立感情之後，覺得有責任、義務為他老人家減輕負擔，使他能集中精力做學問。從此家鋒在課餘常趕到鄭老師家裡替他做部分家務，這種精神在當代真是難找。後來家鋒得了鄭師的心傳，寫出一鉅冊《社會主義運動史》，確是另有高度，不同凡響。家鋒能繼鄭師的絕學，是這位「半頭」將軍苦心孤詣換來，並非倖致。

錢穆和陶希聖兩位先生的治學工夫

錢賓四（穆）老師來上課，手中從來沒有講義之類的東西。他老人家那時已年近八十，學問已出神入化，他一開口，識貨的馬上覺得正在印證「胸羅萬卷」、「出口成章」這些成語。他一口無錫國語，非但不「軟」，而是充滿陽剛，聲揚室外。老夫子講到得意處，有時以掌擊台，有時雙目圓睜，有時是笑出聲來。我是第二度受教於他，早年在香港就曾上過他的課，有一次我發現錢老師講某一個問題跟從前我聽他講的不一樣，便大驚小怪地課後去問他，老師哈哈大笑說：「在大學跟研究院講課當然有深淺，何況我自己也要不斷進步的嘛！」這話合我很深的啟示：學問大到他那種程度，依然在不斷求進步，我們這些在他帳下初學之輩，誰敢說有自負的本錢，能不規規矩矩好好用功讀書嗎！



錢穆大師致俊才先生書

陶希聖先生一生歷史盡多坎坷，受到批評不少，但他治中國政治思想史，至今似尚無人能出其右。他不但把廿四史中的各件大事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更難能的是他將正、野史以及許多雜說中的小故事，玩索得極有心得，隨口能演繹出其中道理。有一次他講華歆和管寧的關係，忽然穿插說曹操斷獄，有人以家中被搜出有釀酒器具而被判私酒罪，華歆諫曹操說證據不足，曹操不聽，說罪者分明有工具。有一次曹操偕華歆乘車在街上經過，看到街頭有男有女，華歆遂向曹操建議說這些男女犯通姦罪，應加逮捕。曹操說：你怎麼知道？華歆回以「他們都有工具！」陶老師當時是冷著臉講這一段，我不知道他是確有所本還是信口編的，所以將信將疑放在心裡。有一天翻閱「世說新語」，讀到這一條，才知道他真是用過心在這裡面找道理。他還有一個特點：上課談「古」，下課講「今」，這個分際幾從未混淆。課餘那十分鐘，誰到休息室找他，都能聽得很珍奇的秘聞。

回顧二十年前那一段山谷論道的求學生涯

卓宣老師是個奇人，天天一襲中山裝，從來沒有換過別式衣服，連扣鈕都整整齊齊。他上課跟他的衣著一樣，一本正經。背起書來一瀉千里，會聽的連標點符號都能聽出來。他老人家的歷史很奇特，在法國巴黎熱衷共產主義理想時，跟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很親近的同志，回國後在「清黨」時被捕，要他在辦理自首和遭槍斃兩者之間選一，他毫不猶豫選擇槍斃。綁出野外槍擊多發竟未死，他從屍堆中爬出，自行療傷痊癒後再去自新，而成了後來的任卓宣。有一次在休息室中我四顧無他人，便問任老師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他說當然是真的！隨即指了指身上說，幾個洞洞還在這裡沒怎麼長平。我再問他那時為什麼選擇死而不選擇生？他說：「為理想得有死的勇氣及準備。我已經為共產主義死過一次，我已發覺那不是真理，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用於反共，百折不撓！」他短短幾句話說得我大

為佩服。

光陰似箭，當年那山谷論道的歲月已飛逝去數十年了，東亞所的大後台蔣經國先生、創辦人吳俊才先生及好幾位授業的大師，已與歷史一體，唯有剛毅木訥的李登輝老師一枝獨秀，手握國鈞，精神體力尤勝於我們這些當日的門下弟子。日前在一個國際性研討會上，與趙春山同席，這位那時最「幼齒」的學弟，對我指著他那已爬上頂間的白髮，感慨萬千。不過我們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在為理想奮鬥的崗位上，並親眼見到世界共產主義神殿的傾塌，我們選擇的路並沒有錯！人生如此，也不枉然了！



東亞所碩士班第十三屆，後排左四為玉山

無限懷念吳師叔心

施哲雄

猶記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忽聞吳師叔心先生在美治病因休克而陷入昏迷的消息，焦慮如焚，約過一星期不幸傳來吳師仙逝的噩訊，使我內心悲痛不已。吳師的去世不僅是黨國失去了一位忠貞愛國之士，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少了一位隨時可以請益，對我照顧有加的受業恩師。

民國五十七年春東亞研究所決定成立，正好我那年大學畢業，準備研究所的考試，對新成立的東亞所，只知是以研究共黨問題為主，其餘不甚瞭解，基於對這方面的興趣與好奇，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報考東亞所，僥倖被錄取。在服完一年兵役後，正式入學就讀，忝為東亞所的一份子，從此即與吳師結緣。

先是求學期間，在吳師的教誨與照顧及聘請大師們指導下，三年研究所學習領略到的更是獲益良多。畢業後吳師先安排我在國際關係研究所服務，隨後又轉到東亞所工作。當時吳師身兼這兩個研究所的主任，後來吳師雖擔任黨政各項要職，然因仍在東亞所講授印度史和東南亞史，那段期間我負責需經常和教授們連繫的所務工作，故仍常有向吳師請教的機會。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接掌東亞所，時常請示吳師，報告東亞所近況，並請吳師提供東亞所未來發展的高見。吳師健康狀況雖不算好，但每次都熱情地接待，並對世界局勢，國家處境，人生哲學，東亞所的發展方向，侃侃而談，發表他的真知灼見，往往忘了他不適宜長談，作為學生的我，總是不忍心勞累吾師而先行告辭。

由於我從民國八十年每次到中國大陸參訪後，都會找機會去拜見吳師，向老師報告到大陸的所見所聞，東亞所的近況，同時也向老師請安。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再次又帶領東亞所同學到大陸參訪，七月二十六日回來後一直想找個適當的時間去拜望老師，但因不知吳師要遠行，也以為吳師除了氣喘的老毛病，肺功能較弱外，並無其他大的病痛，所以一直拖到八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八點左右，才準備和老師連繫拜望他的時間。因顧慮老師平日為輔助肺功能之不足而戴著氧氣管，走動也不方便，接聽電話可能會是師母，所以我就請內人代撥電話，待接通後再向老師報告，不意是老師本人接聽電話，內人向老師說明準備去拜見老師的意思後，吳師誠意地回答說：明天他和師母要出去，等回來後會打電話給我後再去，在電話中他還很親切地問候我們，也很關切我們的近況。因不知老師說的「出去」是到美國治病，原以為只是出門辦事，當天就會回家，又深恐老師講話過久太累，所以沒有在電話中向老師請安，祝他一路順風。沒想到不久就傳來老師在

美治病卻因而仙逝的噩訊，回想老師赴美治病前夕的那通電話，竟是聆聽老師聲音的最後一次機會，當時沒有在電話中向老師問候，至今仍後悔傷感不已。

二十餘年來在吳師的教導和薰陶下，我的為人處世，研究學問，人生觀念等方面，都獲益匪淺。吳師的一生，對黨國作出了難以數計不可磨滅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他不僅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更是一位忠貞愛國之士，終身信奉三民主義，堅持黨的革命理念，雖然台灣的客觀形勢有所變遷，但他認為只要黨的革命目標一日還未達成，黨的本質應仍是一個革命民主的政黨，他在黨內先後擔任文化工作會主任、副秘書長、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考紀委員會主任委員，在這些不同的單位上，無不殫精竭慮，奉獻他的心力，各項工作成績斐然，有目共睹。他提出的各種卓越的見解，許多都成為國策的重要參考，對於國家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始終是充滿著信心，他認為國家雖遭遇一些困境，但只要能堅定信念，抱持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去克服，始終能轉危為安。對於大陸民情的關懷，一直是相當專注，每次我向他報告在大陸參訪的情形，他都非常重視，並提出許多問題，想更進一步深入瞭解。他認為大陸在中共的統治下，雖使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但以中華文化的淵源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民族的堅韌精神，以及共產主義不符合人性的內在弱點，這種危機是一時的，終將雨過天晴。

其次，他對培養研究共黨問題的人才作出了前瞻性的規劃。政府播遷來台後，對共黨問題，特別是對大陸問題的研究，僅限於情治單位和軍事單位，一般的學術單位是無法接觸這方面的訊息，因此除了這類單位培養極少數這方面的人才外，沒有任何一個學術機構有計劃、有系統的培养研究共黨問題的人才，此一幾乎長達二十年的空窗期，導致研究共黨問題的隊伍，形成斷層的現象。吳師有鑑於此一危機，在民國五十六年向層峯建言，應迅速成立一個培養對敵鬥爭高級理論人才的研究所，正式授予碩士學位，以吸收優秀的大學生來就讀。層峯接納吳師的建言，於是老師即根據蔣總統的手諭，著手規劃，政大東亞研究所即在此一背景下，於民國五十七年春正式成立。

對於東亞所的師資吳師費盡了心力，除精心規劃課程外，還聘請當時國內外的名師前來任教，錢賓四、陶希聖、郭華倫、鄭學稼、趙蘭坪等教授，都是當時學界的大師，民國五十九年還聘請當時服務於農復會，後來成為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前來任教，除聘請當時國內的名師外，復延攬美國知名學者，如饒大衛(David Row)和理查吳克(Richard Walker)等在東亞所任教。至今東亞研究所培養研究共黨人才約有千人左右，目前他們都在各大專院校負責教授中國大陸研究的相關課程，國內各報傳播媒體的大陸室負責人，報導大陸問題的記者，大都是東亞所的畢業校友。如果沒有吳師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兩岸展開交流活動後，對大陸問題的研究與撰述，將難於推展進行，其成效亦將為之侷限。



東亞所師生家人

第三、吳師將研究大陸問題擴展至學術化和國際化。以往對大陸問題的研究稱之為匪情研究，人們總認為涉及此一領域者非純學術研究，因此當時僅限於情治和軍事兩部門在作心運方面的研究，且這兩個部門研究的最終結論，大多離不開「反共必勝，暴政必亡」，多被譏為「反共八股」，難於令人信服。

吳師規劃成立的東亞研究所，即是要以學術的立場出發，客觀地研究大陸各項問題。東亞研究所發行的《東亞季刊》，寫作格式均要求符合學術研究寫作的標準，以學術的觀點研究大陸問題，為東亞所研究生開拓了一個學術研究發表的園地，在當時實為一大創舉。

除了將研究大陸問題學術化外，吳師更進而將它國際化，期能使台灣在國際上成為研究大陸問題的重鎮，為達成此一目標，吳師積極籌劃舉辦大陸問題的國際會議，經過吳師多次到美國奔走，終於和美國的學術界達成輪流在台灣和美國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性的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民國五十九年由吳師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時，正式舉辦「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此一研討會至今持續近五十年仍在進行。後來又先後另與日本、韓國合辦舉行有關大陸問題的學術研討會。這種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不僅能更深入探討瞭解大陸各種問題，也是一種學術性的國民外交，有助於提升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聲譽與知名度，吳師在這方面的貢獻極難有人能超越。

第四，他是一位學有專精，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學者。吳師後來任職於黨政部門，

但由於他是位學者出身，對印度史和東南亞史方面有專精的研究與著述，及早年在大陸期間曾在中央日報擔任記者，隨後又長期研究國際問題，具備了對各種複雜形勢分析和判斷的能力，他在上課時口若懸河有條不紊分析古今中外的情勢演變，主持會議時更能掌握重點言簡意賅下結論。

第五，他是一位樂於助人令人尊敬的長者。東亞所剛成立時，在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上課，為照顧學生的起居和便於上課，在中心對面為學生租了一棟公寓權充學生宿舍。吳師當時亦住在附近的麗水街，晚上經常到宿舍，瞭解同學的生活起居和學習情形，將東亞所同學視同他自己的子女般，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當時每個月都要召開一次生活座談會，吳師主持，主要是幫助同學解決各種問題。同學畢業後，吳師亦多一一安排工作，並盡量地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日後如有困難去找吳師幫忙，他都盡力去解決。不僅對學生是如此，對其他的同仁亦復如此，受惠的學子們不計其數，這方面確實是有口皆碑。

追隨吳師二十餘年，他本應更高壽，沒想到去美國治病竟因此而長眠，如今吳師雖離開我們，但他的風範長留人間，將永遠為我們所追隨與效法。



俊才先生與部分十三屆碩士班畢業生，左二為玉山，民國 71 年

想念吳主任

回憶六十年代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片段

殷文俊、李金桐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各種關係，有與生俱來的血緣關係，也有因婚姻或社會的結交，而成為姻親或朋友或師長的關係。吳主任俊才先生與我們的關係即屬於後者。今回想我們的結緣經過，著實有一些值得記述的故事。

話說民國六十二、三年間，國民黨中央進行改制，將原來的四組改為文化工作會，有關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亦委由文工會負責。吳先生經層峰賞識，擔任文工會主任的職務。其時，以吳先生的出身背景，對新聞的處理、文化事業的推展以及大陸事務的規畫，均能展現長才游刃有餘。惟對文化事業的管理，則較為生疏，因此，急切尋覓專人分擔此一事務，文俊遂適時受邀進入文工會任職，以襄助管理工作。事後承吳先生告知是在一次偶然的場合與張教授則堯先生就尋覓專人乙事相商，因恩師張教授極力推介文俊，故彼此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一談投緣，從此展開近乎半生半世，亦師、亦長、亦友的關係。

民國六十二年文俊受邀進入文工會擔任專任委員之初，先兼總幹事後改兼祕書，得以隨時在吳先生身旁學習成長；並在爾後的二十幾年，彼此產生不可言喻的情誼。金桐則是在六十三年八月，由文俊向吳先生轉介接任總幹事，所增加新的生力軍，共同為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竭盡心力。記得金桐當時年僅卅二歲，涉世未深，其時在中央黨部是相當的異數，吳先生能將如此重要職務交託，顯見其知人善任的寬大胸襟，所幸我們也絲毫不敢讓他失望。後來，在他調離文工會，由丁懋時先生接任時，文化事業的管理，已建立起良好的聲譽，既能達成政策性的文化宣導任務，又能勵行企業化的管理，在收入成本利潤的表現上，不亞於一般經濟事業體；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史，留下成績相當的一頁。

隨著本文的起落，數十年前的往事，當時種種的情景均歷歷眼前。如今，雖說我們倆人在歲月的衝擊淬礪下，已分別擔任兩家不同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職務，但每當有重大決策猶疑難決之際，腦海裡，總不經意地浮現出吳先生一根根菸絲不斷，在房間內踱著方步的身影。回想當年吳先生真可謂集多少煩惱於一身！尤其是他當時的任何重大決定，均關係著國家未來長遠的發展。誠然我們此際也有類似的煩惱，但憂慮所及亦不過一家公司的營運而已，比起吳先生當年的憂煩思慮，也就舒展眉頭，自嘲小題大作了。我們在當了董事長之後，不可避免地，每天要面對不同的人、事、物問題，對我們而言，所謂「內外憂煩」，對外涵蓋同業的競爭，顧客的滿意度，股東的投資報酬等，惟仍未超出一公司的範圍，但是吳先生

的「外憂」，卻是要面對轉型期間新聞事業的脫序、經濟發展後對文化的衝擊、及對敵宣傳鬥爭中狡猾的對手。若純粹就企業的經營管理而言，所承擔的已是八家的文化事業，顯見其「外憂」的重擔遠遠超過我們多多。再就所謂的「內煩」而言，一家公司內員工情緒的反應，已夠讓我們煩心，但是每當面對員工的訴苦申怨，經常是以當年吳先生的身教言教自勉，一切也就坦然了。坦白說，黨營文化事業在以前是由總裁直接督導，凡董事長、總經理以及社長的任命，都須經層峯的點頭，當其時，文化事業乃專門從事政策性的任務，所謂成本預算的考慮，根本不存在於那些文化事業主管的腦子裡，一旦遇上我們用企業效率的眼光，加以衡量損益的利弊得失，難免就會觸犯其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因此，我們在執行任務之初，情況並不順利，常須要直接與總經理、社長等從事基本觀念的溝通，金桐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黨國元老，曾經用不是很友善的口吻說及他跟總裁的關係，然後順便揶揄一下——「那時候你上小學幾年級呀？」言下之意，你這個小孩子，管什麼大人的事。因此，若干的時候，常不免有失落挫折之感，回到辦公室後，只有向長官吳先生傾吐，現在想起來，吳先生自己本身何嘗不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惱，顯然他都自己吃下來，而且還要容忍來自各方的傾吐與責難，真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他不但一聲不響的吃下來，而且還要安慰同仁，提振工作士氣，精神令人感佩。現今金桐常自我安慰，任何人都可以有情緒，就是董事長不能有情緒，此種想法，實深受吳先生之影響。回想吳先生當年面對那麼多人、事、物的煩雜，卻能將個人的情緒都隱藏起來，自我消化掉，不可謂不偉大。自古以來所謂偉人的特質不就是要擁有寬大的胸襟，容納來自各方不同的異議，承擔一般人所不能承擔的事，我想吳先生都具備了。

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當時在文工會是第七室的任務，文俊初兼總幹事之際，也是一項新的開始，新的嘗試，早期的七室成員，也不過五、六個人而已，往後在金桐接任總幹事以後，由七室改為六室，人手均是配合實施輪調制度從各室調來的，因此，對企業經營管理理念不是很強，進了六室以後，在吳先生的調教與任務賦與後，驟然變成一組強而有力的中央管理團隊，就憑當時那幾個人，居然也能把龐大的文化事業管理得差強人意。記得當時在不影響各公司總經理的職權，卻又亟須建立一套管理辦法下，乃設計出系列制度，既達到共同管理的目的，又有符合個別差異的需求。首先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及總稽核均由中央委派，任期為一任三年，可連任，但徹底實施輪調制度。理論上，前三位人士係由會內派出對各事業單位較為客觀，類似目前政府所實施的人事與會計獨立制度。每個月定期舉行業務會報，討論各種管理法規的制定，相關問題的協調與解決，遇問題時共同當場解決，有必要回去請示者，留待個案處理。記得當時吳先生幾乎每次會報都參與，並且即席作成決定。雖然他管的是大的政策方向，但是幾年下來，據我們的觀察，他已儼然成為企業界的管理高手。事實上，領袖人才無論身處於何種領域，終究萬理一通，依舊是須袖人才。

事實上，民國六十年代初期，當時所謂的黨營文化事業，都是一些名字很響亮的單位，範圍涵蓋報紙、書局、廣播、通訊、電影、電視等，為求紀念真實，不免提到些當時的總經理、社長。因為業務上經常要連繫請教，今寫起這些人的名字，每人的面容，又似乎躍然浮現眼前，雖然有些人已經作古，但是在六十年代，對文化事業的貢獻上，這些人的表現，都值得列入歷史。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日報，中央日報可謂是文化事業中在六十年代最閃亮的一顆星，當時中央日報社的社長是楚崧秋先生，楚先生是黨國元老，文化界前輩，又有才幹。中央日報號稱黨報，也是當時的大報，望重朝野，因為其報導迅速而又確實，其論述公正而又深遠，成功其權威性，當然因為它的權威性，社長的身分地位更不同凡響，以楚先生的高操，要與其談人事及會計等凡俗雜務，必定不甚恰當，但可貴的是，吳先生也能說服這位新聞界的先進，在達成新聞任務同詩，必得勵行企業管理。因此，重視發行收入與廣告收入的推展，紙張與機器設備成本的控制雙重的結果，使中央日報曾經是當時最賺錢的報社。

其次，記得當時中視的總經理是董鵬年先生，中廣總經理是黎世芬先生，黎先生是基督徒，音樂素養很深，是標準文化界人士，但協調起來卻頗為不易，因為中視公司是中廣黎總經理籌設成立的，再加上當時中視公司的全部建築物是由中廣為中視精心規劃、設計、建築完成出租的，彼此先是一體，後稱兄弟公司，卻因某些情結大小糾紛不斷。成立初期營運不佳，民股曾表示強烈退股意願，直到開播一段期間後，由於是寡佔事業及同仁的努力，獲利才逐漸豐厚，又因影視廣播圈利害關係複雜，所有的問題都有賴文工會居中協調，起初當然由總幹事承擔，以後逐級而上，非至吳先生處，難以解決，即使問題解決，糾紛仍是夾纏難清，可以想見，吳先生在調理雙方上，是多麼的備嘗艱辛。

再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電影公司，當時的總經理是梅長齡先生，他來自軍中，是一位講究服從，骨子裡卻也蠻堅持的人，他到任前的中影財務營運情況並不是很好，自從梅總經理上台後，連續拍了幾個大片，諸如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既叫好又賣座，振奮了當時的電影事業，促使中影事業得以起死回生。特別是類似的軍教片，場面浩大，不輸美國戰爭片，使得年輕人樂於觀賞這類愛國的影片，著實達成了文化宣傳的任務，也培養了國民愛國的情操，且又充實了事業單位的盈餘，使電影事業得以更有發展的力量。

此外，原來的製片廠，經過新的廠長明驥先生的銳力經營，花下最少的投資，把一個破爛的製片廠，搖身一變而為電影文化城，平時開放民眾收費參觀，增加營運收入，遇有拍片之際，更能充分利用作為場景，發揮片廠的效能。中影那時所擁有的各戲院，也能常常滿座，創民國六十年代，國片盛行時的輝煌紀錄，真正得以達成文化宣傳任務與盈餘並重的目標。

至於中央通訊社社長魏景蒙先生，後來的林徵祁先生、香港時報社的社長曾恩波先生、中華日報社的社長錢震先生，他們都是標準的文化名人，全心全力的投入文化工作，卻不甚瞭解企業管理，所幸吳先生是新聞界的前輩，每當我們協調無效時，總是請吳先生出面，很多事情就這麼順利的解決了。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吳先生雖然是文化及新聞資深工作者，但對我們經營管理的工作卻相當的支持，而且充分的瞭解，即使是人事與財務的問題，在他的感覺裡也不嫌煩，尤其其他深知這類事務表面看似不甚重要，卻經常可能釀成大麻煩。記得當時除了每個月業務會報，吳先生總是親自參與外，每三個月還有主管會報（由各事業的總經理、社長共同集會而成），吳先生亦行參加，共同面對整體的文化作戰及相關事業的協調問題。回想當時與那些文化界的大人物溝通協調，文工會的主任，其人脈以及領導的才能，真須高人一等，否則難於勝任。加以當年屬於以黨領政的時期，文工會主任尚須負責領導主義思想的研發、文化建設的推展、新聞的處理、國家文藝的發展等等，足可稱為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其地位之高責任之重，更是顯而易見。

最後想到正中書局，其歷來多是出版政府與黨的文件，深具政策性的任務，但以出版事業而言，過分強調政策任務，而忽略了經營成本收益與利潤，則失去效率考核的指標。吳先生亦曾為正中書局煞費苦心，一再的把脈處方，才能勉強的把大樓蓋好，並出現盈餘。

吳先生主持文工會的這段期間，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因為早期文化事業，為了達成文化宣傳的任務，比較不計盈虧，因此，多數事業常是虧損累累，形成黨庫一項沈重的負擔，而且在長期忽略盈虧的結果下，除事業體本身失去效率考核的指標外，黨庫實際上也已經負擔不了。事實上，如果黨營文化事業全用管理經濟事業的那一套，講究的是盈餘的創造，凡事都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過猶不及，都欠妥適，因為過份強調盈餘的結果，不免使政策性的任務，頻打折扣，相信這也不符文化事業存在的理由。也許基於以上的矛盾衝突，黨營文化事業後來才改由文工會管理，基於文工會本身的屬性，才特設一個室負責。雖說少數幾個人，承擔的卻是很煩瑣吃重的任務。吳先生後來為人所推崇的，除了許多光榮的事蹟以外，黨營文化事業的管理，應算是他許多事蹟內，較為特殊的一環，因為他既能集合文化事業的團隊，充分發揮事業的功能；又在新聞的管制，主義的闡揚，文化活動的推展與強化洗滌民心的要求下，處處彰顯安定社會的效果。最難能可貴的是，他能為文化事業的管理，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在往後的廿幾年間，人事雖有更迭，但是吳先生在文工會時期建立的各種規章，長期仍然適用。政策任務與創造盈餘，始終是黨營文化事業，同時存在而不可偏頗的責任。

隨著本文的起伏發展，緬懷吳先生的過去，多年前的往事，歷歷浮現。吳先生常常一面認真努力工作，一面又勤於讀書、寫作，相較之下我們常會自感無能與共。文工會時期，大家的士氣潛能之所以被激發，實歸功於吳先生的精神感召，感於他的自我砥勵，生活的儉樸，以及道德的超高標準。因此，當時的工作同仁士氣高昂，包括第一室總幹事石永貴先生等，滿腦子愛國愛黨情懷，截然不同於目前功利主義思想的泛濫；再者，雖然號稱管理機構，但工作同仁從不沾惹事業機構的任何利益，更別說其他的不法行法，原因無他，在於上下正己，也就能己正而人正。總之，在吳先生領導下，工作團隊除圓滿完成了上級賦予的任務外，並留下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可貴榮譽，而吳先生一生的哲人典範，也長久留駐大家心中。

出使薩爾瓦多

李慶平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一屆二中全會，在閉幕後第四天上午，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院長辦公室約見岳父吳俊才先生，是時岳父擔任執政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已有四年之久。蔣主席在約見時曾詢及對二中全會的感想，並告之要請吳先生到國外去做大使，且說明了去擔任大使的理由是「以俊才兄的學識，才能和品德，一定能夠勝任。而且依你的年齡，正也應當在這時候到外面去歷練一段時期。」

事後張寶樹秘書長告之，要岳父去薩爾瓦多擔任大使，因現任連戰大使雙親年事已高，他是獨子，堅辭現職已准。

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卅日總統發布命令，「特任吳俊才為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民國七十五年我擔任駐美代表處文化組組長時，代表為錢君復先生。一日在閒談中，錢代表曾告之，民國六十五年，經國先生時感獨當一面外交人才缺乏，欲從黨、政、軍人才中挑選幹才加以培養，他時任外交部次長。經國先生曾請其推荐了一份名單，其中包括了吳先生。君復先生的推荐，是否為被遴選為大使的主因，不得而知，但顯然的，經國先生急欲推展中華民國的外交，是他當時施政的重點。

在出使薩爾瓦多大使之前，岳父拜會了嚴總統靜波先生、張資政岳軍先生、退輔會趙主任聚鈺先生、黨國元老黃少谷先生、錢院長思亮先生，並向渠等請益。在岳父先生的回憶中，張岳軍先生特別向他說明，一位外交人員，必須要有「品、學、文、容、體」五個條件，他一直謹記在心裡。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岳父母抵達薩爾瓦多京城聖薩爾瓦多，面臨了人生新的里程，新的挑戰。

當時的薩爾瓦多是處於左翼共黨時時發動暴亂的國家，中華民國的反共及經濟的起飛，正是兩國之間加強合作的時刻。薩國面積 8,260 平方英哩，人口 440 萬，但經濟狀況則因地下資源貧乏、工業尚待起步、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出產甘蔗、玉米、咖啡、高粱、棉花，為世界四大咖啡出產國之一，年產二十萬公噸。民國六十五年薩國的國民所得為 450 美元，經濟成長為 8.5%，對外貿易為十四億美元。在表面上來看，薩爾瓦多雖為小國，社會仍尚穩定，但由於人民貧富懸殊太

大，平均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之差距為十九倍，佔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主，擁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文盲多達 37%，失學率為 30%，這些種種的失調現象，正是薩國共黨乘機擴大、發動暴亂之因。

奉使外派，於私，岳父實無意願，當時岳母健康不穩，因脾臟機能不良，血小板低落，十二指腸經常內出血，已有五次入院紀錄；大使夫人襄助外交的任務繁勞，薩爾瓦多的醫療環境不佳，倆人均不諳西班牙語，都是擔心的事。但在行政院長經國先生再次考慮下，既不便以個人理由有所表示，於公，一經宣誓，也就如同他在其它職務上的表現，全力以赴了。

民國六十六年，薩爾瓦多這個中美洲最小也最反共的國家，正遭逢一波國運的轉捩點，左翼的共產黨，組織發展已控制了工會、教師會與青年團體，總統大選在即，風暴正在蘊釀中。

薩國當時總統為莫里納總統，這位總統接受呈遞國書的慣例與國際慣例不同，每一次必俟有新使三人以上到任，才同日分別舉行儀式，因此岳父要等四個星期，和韓國、埃及新任大使同日呈遞國書以後，才能對外執行職務。

薩爾瓦多僑胞人數極少，僅有不到五百人，大多居住在首都薩爾瓦多市，經營小生意。大使官邸在高級住宅區，大廳佔地寬大，約有三個籃球場之廣，後院草地如茵，熱帶花木扶疏，全館開放時可容納五百餘人，是辦活動的好場所。

抵任不到一星期，岳父即在館中展開活動，辦理規模自助餐會酒會，邀宴農耕隊員、國際農糧組織、衛生組織派駐薩國的中國籍專家；抵薩城十八天，是總統大選投票日，原任國防部長羅莫洛將軍當選總統，在野黨以為選舉不公，醞釀暴動。二月廿五日岳父至近郊視察農耕隊業務，渾然不知險境；當天下午首都發生暴動，城中閉市，槍聲四起，廿八日暴亂擴大，政府宣佈戒嚴，三月一日國會授權政府進入緊急狀態採取戒嚴，一星期後終告平救，三月八日薩國外交部禮賓司通知，十八日請中、韓、埃及三國新任大使呈遞國書，此後才算正式展開在薩爾瓦多的使命工作。

三月十日，岳父初識總統當選人羅莫諾將軍伉儷，從此結下誠摯的友誼。羅莫諾將軍過去曾任國防部長、安全部長，曾經兩度訪華；薩國政制規定總統當選人選後須見習五個月，才能正式就任。其時政局外弛內張，左派到處裹脅農工製造流血暴動，天主教神父也反對政府；美國人權組織也在薩國境內活動，美國會動輒辦理人權聽證，加重薩國政府的壓力。羅莫諾將軍對岳父一見如故，希望他能提供我政府反共的經驗，以及告訴薩國新聞界如何才能反滲透與展開反共教育。

岳父也開始學習西班牙文，每日清晨五時至七時研讀西文會話。呈遞國書後不到兩星期，即接到國會議長正式邀請，赴國會演講。其時正值首都暴亂平息之後，人心仍惶惶，岳父以「信心是力量的泉源」為題，提出我國的反共經驗，大受歡迎。這次演講是以英文講演，即席翻譯；半年後岳父在我國雙十國慶日，接受薩國國會特邀，將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永置在國會會議廳的主席台上。這是中薩邦交史上歷史性的時刻，也是岳父以學識與誠摯為國家贏得外交成功的一刻，那一天他即席以西班牙文，講演了十五分鐘，更獲得國會議員由衷讚賞。

岳父在二月下旬暴亂甫平，即親赴城內各僑胞家中，探視他們的平安；接下來一連串訪晤總統，內閣部長、大理院院長、治安當局、文教機關及外交使節團，以增進彼此的認識。四月下旬，游擊隊綁架了薩國外交部長，棄屍近郊海邊，使節團風聲鶴唳，各國均增派保鑣進出。岳父到處宣傳反共教育，出人怡然不以為危，四處訪問也無保鑣，他認為我國反共立場堅定，左翼深知綁架中華民國大使，勢將毫無所獲，所以反而最安全。

政局雖然險況時出，岳父有計劃地步步推展外交工作，國會職員、文教人士、大眾傳播等，他均一一交往，以建構一個社會面來支持邦交。以中南美洲政情之複雜，政變之頻仍，他除了遍訪內閣部長，尤其注重與各軍區司令之往返接觸。而在加強反共通識之共識之下，羅莫諾總統也對岳父加強與軍界交往予以支持，並獲得一頂榮譽頭銜：「薩國武裝部隊之友。」

至於新聞界之聯繫，更是無往不利，出使八個月後，即是雙十節，也是慣例「評比」外交成績的口子。是日各報均為我國出特刊，電視台播出特別節目，國會特別在議壇永置我國旗，千人之盛大規模酒會在大酒店舉行，當天羅莫諾總統伉儷偕全體閣員及夫人們前來，盛極一時。此後兩個月，大使館各項活動有增無減，時局一天天緊張，廣播電台被佔、勞工部被佔、卸任總統遇刺、報社被炸....，十二月中旬，岳母再度胃出血入院治療。

聖誕節前一天，內人德里帶著二歲半的女兒美儀，從美京華盛頓，至邁阿密轉機赴聖薩爾瓦多城前來探視。岳母病體初癒，然而休息不到一星期，就是民國六十六年元旦。當天下午在官邸舉行園遊會，晚間又有餐會舞會，五百多位僑胞都到了，這是在薩國僑社第一次舉辦元旦團拜。雖然館中上下早已練就有條不紊的本領，前前後後準備了三天三夜，岳母的確身體疲憊。

六十七年一月四日下午岳父自使館返家，這天他接到外交部沈昌煥部長來電，略以「出使薩國以來，績效卓著，備得各方讚譽....頃奉院長指示，另有借重長才之處，擬調回國服務....」。從台北運來的許多行李紙箱，才完全拆箱。又要忙著整理行裝返國了。岳父很高興地說：「德里這次來對了，可以幫上不少忙」。舊書舊

衣，重新又打包封裝，極短期間內，趕辦卸任辭行。當時使節團廿四國使節中，我們有邦交的只有六國，卻有廿二個國家的大使，在外交團的羊皮紀念狀上簽名歡送，薩國外交部長特別代表政府在外交部舉行酒會，並破例致贈銀盤，總統伉儷在總統府開香檳歡送岳父母，其它餐會歡送直忙到行前。

六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赴薩履新整整一年，午夜在百餘友人的歡送中，揮別薩爾瓦多，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正應了經國先生一年前在台北七海官邸與岳父臨別時那一句話：「希望你早早回來。」

難忘的回憶

胡有瑞

在中央日報社工作了三十多年，屈指算來也經歷了十任社長；吳俊才先生是其中令很多同事難忘的一位。

民國六十七年的四月三日，吳先生正式接任中央日報社長；對當時仍很年輕的我們這些記者來說，吳先生是不會陌生的，因為他擔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多年，而當時國關中心就在中央日報社的六樓辦公。

每每在電梯中，我們會遇到吳先生，他見到我們這些年輕的記者總會含笑地對我們點點頭；而面對這位溫文、博學又儒雅的學者，我們是真的油然而生敬慕之意。

當我們接受吳先生的領導時，才知道這位謙謙君子型的學者，他的細心和體貼更展現在公事上。每到開會，他必守時，整齊的穿著、溫文的笑意，讓我們領受到春風的教誨，而他對黨國的尊敬、對新聞的認知，那份執著、那份真誠，使我們在敬佩中得到了遵行的準繩。

雖然吳先生只在社長任內不到一年，但是，在那三百五十多天中，他卻做了很多事，為他自己、為中央日報社，都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吳先生認為，中央日報是代表執政黨的報紙，有著「為國干城、為民喉舌」的特殊使命。他常告訴我們：「中央日報代表政府，我們有自己獨有的特色，是別的報紙所欠缺的，中央日報可以辦到別報的特色，但他們卻不能做到中央日報的特色。」因此，吳先生在社內大大小小的會議中，他像一位傳教士般，在諄諄的教誨中，激起同仁的信心和榮譽感，大家都願堅定信念，共同努力完成黨國所託付的使命。

吳先生認為，在「為國干城，為民喉舌」的前提下，充實報紙內容是最重要的，因為有充實的內容，才可能有讀者、有廣告、有發行，此環節息息相關，不可缺一。因此吳先生第一個就往內容充實的方向著手。首先即闢七個專刊，即主流、文史、讀書、健康、旅遊、法紀、家庭等，連同兒童週刊，每週每天都有一個固定的、不同類型、性質的週刊報導，吸引各階層的讀者羣。

每個專刊有其特色，新聞和編輯密切配合，與各單位的合作，是訓練報社人才的方法，也是拓展報紙接觸的層面，例如以旅遊來說，民生富裕後出國觀光的人自

然多了，出門旅行的人自然樂知旅遊方面的見聞和知識，相對的旅行社也重視這塊園地所觸的讀者羣，廣告自然就會增多！在各種新聞、特寫、專欄的配合下，吸引讀者和廣告客戶，這對報社的發行有相當大的幫助。

而「主流」這個週一專刊，對思想領導、理論的建樹有著獨有的讀者羣，掌握了中小學三民主義教師和大學國父思想的教授、學生，也許有人覺得枯燥，但對國家、對黨的任務有其特殊的一面。

七個專刊的推動，不僅帶動廣告，也帶動了七個發行網，對同仁生活也小有幫助，可以擴展採訪同仁的生活層面，藉由報導，培養專業人才。而稿費的取得，多少對生活是項津貼。最重要的是培養人才，和報紙發行，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也因此，主筆人才、專欄作家，也可從中產生。

那時，我正是採訪組文教小組的召集人，於是「讀書」週刊就由我擔任主編；雖然是每週一次，從設計到採訪、約稿和編輯，可真夠我們忙，不過在忙碌中都覺得有著收獲的喜樂；大家也不自覺地在思想和寫作技巧上都有了提升。多年以後，當我們七個主編再翻閱七個專刊選集的單行本時，心中翻騰的依然有著昔日工作時的熱勁。

吳先生始終認為中央日報應該是一份乾淨、健康的報紙，因此，他堅持中央日報必須做到：

「是份不會污染家中餐巾的報紙，是份可以深入家庭的報紙」。因此，他要求我們：「對新聞取捨絕不以聳動、渲染的社會新聞面為主」，他說：「中央日報不必靠社會新聞取勝，而應朝向比較健康、光明的一面走，從社會正面找出其特色；因為溫馨、感人的新聞在社會中很多，默默貢獻社會的人也很多，記者大可從中取材，發揮人性的光明面，挖掘人情趣味的新聞，給人溫暖鼓舞大眾前往更好的方向。」

在中央日報六十週年時，吳先生回憶他在報社的作為時，特別提到：

「由於中央日報別於其他報紙，因其具有代表政府的角色，在堅持反共的立場上，要很清楚的解釋政府的政策。例如當時召開三中全會，就必由新聞、特寫配合政策背景、基本立場，同時揭示選舉第六任總統由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出任總統，正代表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中央日報在執政黨報紙的角色上，有必要讓民眾了解此時此刻的重要性。又例如在十項建設階段。國家經濟一度面臨困境，甚至社會上傳聞買不到衛生紙，這時報紙就不能一時的起哄，擾亂民心，同時派記者到十大建設的工地裡實地採訪工作的情形，以轉移社會經濟不安的局勢和注意力。

因為中央日報肩負著中流砥柱的任務，如果沒有立場、原則、目標，那來力量來做代表國家的報紙呢？

因此，愈是發生窘困的時候，中央日報就必須發揮其權威性、影響力，不能退縮。

而在發揮此力量之際，中央日報的團隊精神必先培養起來。我深覺報社同仁的福利很重要，例如子女教育獎學金，不只是公的學校，就讀私立學校的也應該可以申請，而且更需要補助。我始終認為當同仁生活安定，就會對報社努力，讓同仁覺得奮鬥與否是與中央日報息息相關，也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雖然那時有人建議簽到簽退，我總認為那是形式主義不必要的，而要求同仁以工作來表現，因為常常批判，或責罵，會打擊士氣。不過在買大宗機器或油墨等東西時，我嚴加要求同仁絕不能拿回扣，但廣告、發行同仁有好的表現給予獎金，我是贊同的。

充實軟體方面是報紙存在的條件，在硬體方面也很重要，我曾計畫在信義計畫地區購置五千坪的地，興建十一層的大廈，包括員工宿舍，頂樓設有直升機的停機坪，以作為未來十五年的文化宣傳作戰基地，當時預估的經費約五億。因為未來的新聞採訪趨勢，可惜一方面時間不夠，另一方面進行沒有全神貫注，而使這項理想未能實現。」

吳先生是位肯想、會做、又有魄力的社長，只是他在報社內的期間太短了，還記得，他離開報社後就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一職，常常會找我們去聊天，而對報社的種種他都非常關心，尤其是知道七個專刊面臨縮刊和停刊時，他不斷地搖頭，但也不斷地鼓勵我們，不要氣餒，要更努力。

他生前常對我們說：「有機會能在中央日報服務，是最難忘的回憶，可惜任內時間短暫，有些理想未能實現」。

每次望著他說這些話時的神情，大家都有著憾然之感；我們常想：如果那時吳先生真的在信義計畫地區為報社購置了五千坪的土地，也為報社在那興建了十一層的大廈，那麼今天的報社就有了更堅實、更豐足的發展基礎了。

經師與人師

瑣記吳俊才先生主持陽明山莊的日子

金開鑫

(一)

我與吳俊才（叔心）先生結緣，是在民國五十五年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上。那時我剛從英國完成學業，返國不久，國際關係研究所因為中共大肆批判「吳晗」、「田漢」，而舉辦研究性質的討論會，劇作家吳若先生送來「海瑞罷官」與「謝瑤環」劇本，囑我研讀後發表些意見。那天的會議是叔公主持的，我則是第一次參加類似活動，眼見出席者多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我大約是最資淺的，緊張著猛啃準備好的發言摘要，心中盤算如何措詞遣字，主持人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和顏悅色，溫文儒雅，但此人說了些什麼，我實在無法分心去注意。隔了些時候，中四組的長官吳春熙先生告訴我叔公對我印象不錯，打算聘我到國研所做兼任研究員；可以自由閱讀當時還是禁書的中共出版品，有心得就寫點報告論文之類，沒有什麼壓力。就這樣我進了國研所，追隨叔公五、六年，先兼後專，先做了點研究，隨後忙於編譯出版工作與籌辦國際會議。第二度追隨叔公是民國六十九年，他以中央副秘書長的身份，奉命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主任為蔣經國總統），邀我擔任教務處長，直到他民國七十六年榮退為止。民國七十八年我由革研院調任中央考紀會副主委，當時的主委就是吳叔心先生，此次追隨僅只短短的一年半，旋於七十九年六月奉派回革研院接任教育長職務。

叔公歷任黨國要職，在每個職位上，他都表現得有聲有色，輝煌燦爛，對黨國的貢獻早已受到肯定與讚譽。他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以前瞻性與原創性的眼光，來設定奮鬥目標；以獨具的使命感與說服力，來團結僚屬奉獻心力；以堅毅的信心率先實踐，來克服障礙險阻，朝向理想目標邁進。他常勉勵我們：「從現實通往理想的道路，往往是曲折迂迴，崎嶇不平，滿佈險阻的。但是只要我們有信心與耐心，堅持方向，講求方法，理想還是會實現的。」

國際關係研究所、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及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都是屬於智庫型的幕僚機構，工作比較靜態，被動，且多重複性，較少挑戰與創新空間。因之，機關容易墨守成規，工作同仁也較易有職業倦怠感，是標準的俗稱「冷衙門」。叔公領導這三個單位期間，卻使得它們都動了起來，發揮無比的活力，創造許多新的工作契機，對黨國做了許多貢獻，機關同仁的「自我實現」需要，也滿足了許多。在國研所時代，他創辦了許多期刊，召開許多國際學術研討會；使得研究員的研究成果，不只是「上呈」做政策的參考，也可以經由學術論辯，使得我們的觀點，也能透過國內外學術界，影響外國政府的決策。叔公領導考紀會期間，為

了強化執政黨的政策設計與考核功能，成立了好些研究小組，禮聘學術界公認鴻儒俊彥擔任召集人，依研究專題約聘專家參與，研究成果不僅做為施政績效考評的參據，也送請黨政相關單位，做為決策的參考。正中書局出版的「各國政黨內部運作研究」，就是叔公任內的研究成果，也是史無前例的巨著。叔公在此二單位的作為與成就，已有尹慶耀、方雪純與余承業先生詳述。本文僅就個人的體認，重述叔公在革研院期間的作為。

(二)

叔公領導革命研究院以七十三年六月為界，可分為兼任與專任兩個階段。無論專兼都是他全神貫注，掌握教育方向，抓緊原則，細節部分則授權僚屬自由發揮，是標準的「經師人師」。

革命實踐研究院係先總統 蔣公於卅八年政府遷台時所創辦，職司國民黨幹部的教育訓練，與三民主義理論研究。蔣公親訂的教育宗旨是：「依據主義政策，集中革命鬥士，灌輸以新的學術思想，授以新的時代任務，共同檢討，共同研究，以重振革命精神，重整革命陣容，重建革命大業。務期研究所得，精實可行，並能率先實踐，以達到反共復國、救黨救國的歷史任務。」我們不難看出：一，蔣公創院的終極目標是要「重振革命精神，重整革命陣容，重建革命大業」，「達到反共復國、救黨救國的歷史任務」；二，革研院教育的對象是「革命鬥士」，也就是，堅定信仰三民主義，甘願為主義犧牲奉獻的黨內菁英；三，革研院教育內容，是堅定信念的思想教育，砥礪志節的精神教育，建立共識的政策教育，以及講求實踐的力行教育；四，在教育方法上，強調「共同檢討、共同研究」，「精實可行，率先實踐」，排除由上而下的灌輸，以及「紙上談兵」的作業。叔公主持革研院七年期間，完全秉持 蔣公親訂的教育宗旨，為黨辦訓練工作。七十三年與七十五年，叔公兩度向中央常會報告革研院工作，所使用的標題分別是：「溝通思想 建立共識 砥礪志節 發揚黨德」，及「了解國家實際情況 明白自己所負責任」，充分顯示他辦訓練的基本方向。

訓練工作並不是基本方向設定好了，就能全自動地運作的。舉凡班期設計、課程規劃、講座延聘、教材內容、輔教設施、輔導考核、生活管理、學員反應、乃至院區環境的管理，安全維護及膳宿事宜等，均須全神貫注，全力投入，不容稍有差失。叔公透過每週業務會報，約談工作同仁及不定期的視察，發揮指導與監督功能。其中他對班期設計、課程規劃、講座延聘、輔導考核，所費的精神最多。

民國六十七年，蔣經國主席兼任革研院主任後，訓練班期名稱簡化，成為研究班（訓期四～十二週），講習班（訓期四週），訓練班（訓期十二週）與工作研討會（訓期一至五天）。

研究班是較高層次的領導幹部的訓練，受訓對象包括大專院校校院長、系所主任、中央民意代表、中央政府司、處長級行政官員、中央、縣市主委以上的黨工幹部、科技專家、公民營新聞企業、金融機構負責人，以及國軍將校。透過講授、寫作、討論與參觀訪問方式，使研究員能從宏觀角度，對國家處境與政策方向，有全盤性的認識；研究員也貢獻其經驗與智慧，參與國家建設基本課題的研究，並且藉由增加研究員間的互動，培養革命情感，使其回到工作崗位，幫助單位間的互助合作。叔公主持革研院七年期間，共辦了廿六期，每期廿六至卅人，共培養了七百餘人，做成專題研究報告一百多件。如今這些結業研究員，在政府與社會各部門，擔負著重責大任。研究班雖然只用序號來編排，實際各期訓期，長短不一，研究員專業背景組合各異，課程設計與輔教活動的安排，也就各不相同。

講習班的目的，是培訓政府與社會各部門中，年輕而具發展潛力的中堅幹部，使他們堅定對主義的信仰，認識國家的處境與政策，精進工作方法，消除本位主義，增進互助合作。研究員的編班，大致採取相近行業的工作幹部，編在同一班期。例如講習班廿二期調訓的對象，都是財政、金融、工商各界幹部，與大專院校的財經與企管教授。

由於陽明山莊教室僅只兩間，宿舍也只是一百多個床位，所以，一年最高的訓練容量，不過七、八百人次，而國民黨的幹部則有幾十萬人，每年能參加革研所講習者可說是百中選一也不為過。因此，每年設計講習班的班期，一方面要有相當普及性，便於拔擢青年優秀人才，再則也要顧及政府重大施政，使結業研究員能發揮種子作用，對國家建設能有較多貢獻。叔公在這一方面，對我們要求最嚴，提示也最多。記得有一次他因重感冒住院，我去病房看他，他叫我去看當時衛生署長許子秋先生，研究一下革研院辦醫療人員講習班的可能性，因為黨在專業人士中的實力比較薄弱。後來我去看許署長，他非常認同這個構想，原來國內醫療衛生共有好幾個系統，分由衛生署、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等單位主管，平時溝通不足，衛生署在推動政令時，常有力不從心之感。就這樣我們連續幾年，辦了好幾期醫療衛生講習班，讓四大系統的醫護人員齊聚一堂，共同檢討、共同研究，效果良好。

訓練班專門培訓新進的黨務工作人員，叔公主持革研院期間，因為容量限制，並未辦理。研討會完全是以溝通工作方法為導向的，籌備的期間短促，在院時間也短暫，準備稍有不周，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也最具挑戰性。叔公任內，針對當時政治環境和需要，舉辦了各種性質的研討會，如輔選工作的研討會、立委當選後的黨政工作研討會、教授幹部的校園安全研討會等等。對此方面的工作，他的要求特別嚴格，從構想到企劃，從協調到執行，最後還要加以切實研討，他全程參與，實實垂詢，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三)

訓練工作看起來是靜態、被動與例行性的。實際上，訓練成效往往取決於：一，如何針對黨國需要規劃班期？二，如何設計恰當的課程，使研究員能有所得也能有所貢獻？三，如何延聘最權威的講座，在二、三小時內能清楚講述一個國家所面臨問題或政策方向，解除研究員心中的疑惑？四，如何遴選適當的研究員，避免為訓練而訓練，浪費資源？五，如何安排學習環境，使研究員在院內能安心研究？六，如何輔導與考核研究員，了解其人格特質與長才，拔擢推薦，蔚為國用？七，如何促進研究員間的互動，增進彼此了解與感情，使能於結業後在工作上互相支援？八，如何在研究員結業之後，維持與革研院連繫，繼續為黨奮鬥？

叔公對於以上每個細節，都費了許多心力，對於僚屬的工作要求，也很嚴格。譬如說，當時他要去拜望每位新聘講座，說明班期性質與目的，研究員的學經歷背景，院方開課的目標，（根據經驗）研究員可能關心的問題等等。往往為了一位新聘講座，來院講二、三小時的課，我花的時間卻不止二、三小時。再如研究員在課堂上發表的建設性意見，與常見問題，教務處也派專人做摘要，每週定期送請叔公批閱。在七十二、三年間，他撥了筆經費給教務處，要求我們規劃「前瞻性課程」，釐訂國家三、五年內，最需要探討的課題，約聘專家從事研究，研究結果一方面摘要，上呈做政策參考，也在適當班期開課。記得我們曾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開了「生態保育」課，有講述也有參觀，得到很熱烈的迴響，在當時算是很先進的嘗試。

叔公對研究員講話的機會是蠻多的，大部分班期，都請他講授「本黨政綱政策」或「當前幾個思想問題」、「戒嚴令、黨禁、報禁」，他都親自撰寫講義，但是上課時，並不拘泥於講義，往往視實際情況更新內容。其他，如每期主持開訓典禮，二周一次的總理紀念週（偶爾也約請貴賓專題講演），主持結業晚會與懇親會。這些講話有的是儀式性的，也有的是應酬性的，但是叔公均以嚴肅態度視之為教育機會，往往他親撰講稿，而且自己背誦講話內容，因此，他一旦講話，那怕只有五至十分鐘，雖從來不照稿宣讀，卻都言之有物。他略帶湖南腔調的國語，鏗鏘有力，聽者總能得到若干啟示，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七十七年出版的《政治與文化》一書中，就收錄了不少他當時在革研院對研究員的講話。

(四)

叔公兼任革研院副主任時，本職是中央的首席副秘書長，輔弼蔣彥公主持黨務。民國七十年代，國際環境快速重組，國內政治生態也醞釀劇變，黨務工作在政治體系中的作用，更具關鍵性，也更難推動。在中央他有看不完的公文，開不完的機會，見不完的訪客，加上要去機關學校做專題演講，闡釋黨的政策。雖然因為時

間\關係，他把革研院比較靜態與例行性工作，請崔教育長德禮先生督促幕僚推動。但是與研究員教育相關工作，他則事無鉅細，不辭辛勞，全力以赴，尤以精神教育更是如此。常常要在清晨五點多鐘由台北趕到陽明山莊，主持六點半的升旗典禮，七點鐘做完早操，脫去中山裝換上西服，又趕下山赴中央黨部參加早餐會報。研究員的集體活動，如參觀訪問，結業晚會與懇親會，他也難得缺席。記件有次十二月底的結業晚會結束，打開熱烘烘的介壽堂大門，準備乘車回台北，一股寒風把他嘴給吹歪了，針灸了幾個星期才復原。

對於高層次的班期的研究員，他更是特別關懷。他親自閱讀他們的自傳與履歷表，有時也要求看他們的心得報告（抽查式）。他約見研究班、高級行政人員班期與教授班期的研究員，個別談話，每人平均二十至二十五分鐘，一邊談一邊做記錄，談完後，找輔導委員進去再談幾分鐘，互相印證對談研究員觀察印象。一個下午加晚自修時間，最多不過約談十來人。我們教授班往往有七十多人，一個班期談完，就得花上七、八個半天，可見辛苦的程度。

研究員的考核，不是打個分數等等交差了事，乃是要找出其人格特質與長處，尤其是每期要推薦五至十名，供當局做拔擢人才的參據，更得小心謹慎，煞費周章。考評會議總是由叔公主持，教育長、教務、行政三處處長及輔導委員參加。考評會議是嚴肅而費時的，討論某一位研究員時，先由輔導委員依據考評表項目，做簡要的說明，教育長與三處處長做補充報告，叔公總是根據他的小冊子（記載閱讀該研究員自傳、心得與個別談話的資料）提出問題，共同討論，遇到某些特殊情形，可能花上半小時討論一個研究員，還得不出結論。記得有一次，花了近四小時還討論不完一個廿六人的班期，必得擇期繼續討論。

叔公教育研究員，從來不喊口號，要求他們做什麼，或者不可做什麼。而是自己以身作則，「率先實踐」。舉個很小的例子做佐證：那時代穿中山裝出現在公共場所是蠻怪怪的，別人會投以異樣的眼光。革研院當時制服是：春秋著黃色卡其布中山裝，冬季深藍色呢質中山服，加一件黑色短大衣；夏季則為黃卡其青年裝，或白色短袖襯衫黃長褲。氣候變化大時，常常要廣播告訴研究員換制服。叔公每次上山前，總要先打電話問大家穿什麼制服。六、七年期間，我從未在開訓期間看他穿著西裝，出沒在研究員聚集場合，研究員穿什麼，他也穿什麼。這雖是小事一件，其隱含的意義卻是發人省思的。

（五）

以上敘述的是叔公在主持陽明山莊時，在教育訓練幹部上的作為，這並不表示，他對研究院其他工作著力不足。在三民主義研究方面，除了他本人是屈指可數的理論家之外，他更創導「理論與政策相結合」的研究，發行《理論與政策》季刊，「以三民主義理論來評估政策，以政策作為來光大三民主義」是他努力的目標。

協調連繫國內院校「三民主義研究所」，分工合作從事研究工作；爭取頂算設置獎學金，獎助後起的三民主義研究人才。七十二、三年間，他已意識到電腦處理資料的威力，囑咐我帶領相關同仁，從事「將結業研究員資料輸入電腦作業」的探索，以使這些「寶貴資料得以迅速備供本黨中央及從政首長同志」之參考。在淡江大學、國防管理中心、交通部數據通訊所的指導與支援下，國民黨的第一部電腦在七十五年正式啟用，對於精簡人力，增加效率，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

總之，在革言院追隨叔公六、七年，我等於又唸了一個博士學位；它不僅是知識上的博士學位，也是為做人做事，報黨報國的博士學位。只是因為個人天性魯鈍，學習叔公的行儀僅只於皮毛而已。這是我個人對這位「經師人師」的感受，相信也是許多受訓研究員與工作同志的感受。

影攝業結期一第班究研踐實命革院究研踐實命革 日七十月二十年九十六國民華中



中立者為經國先生，俊才先生為前排右起第六人

長懷 叔公

焦仁和

叔公辭世，轉眼已屆廿年。追維前塵，感懷往事，令人不勝今昔。

我第一次得見叔公，約在民國六十四年，文工會主任任內。當時，他召開一個有關國父思想的座談會，出席者有曾虛白、羅時英、任卓宣、羅剛等十餘人。我因任文化學院訓導長，也忝陪末座，發言時，尚有幾位老前輩自恃年高，加之彼此熟稔，所談內容不免天馬行空，漫無邊際。公當時望之約五十許，主持座談，全神貫注，面貌端祥，雙目精光炯炯，做結論時，條理分明，一人之見勝過全場之言。那種深度與威儀，令人自然欽服，我當時感受尤深，心想國民黨有此人才，無怪乎在思想戰線上能總攬全局。

民國六十九年，我因故離開文化大學，因為事出突然，毫無心理準備，一時不知何去何從。經由當時革命實踐研究院教育長崔公德禮的推介，經叔公任命為母院秘書室主任。叔公當時以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兼母院副主任。主任則由主席經國先生親兼。此後三年半的歲月，我由秘書室主任調輔導處長，得以經常追隨請示，益覺其學養的深厚與對黨國的忠誠。

叔公當時雖然主要的時間精力，仍放在中央黨部，但對院中大小之事，無不深入了解，躬親處理。叔公對黨的訓練工作，自有其獨到的見解，他以革命實踐研究院容量有限，必須善用其資源，致力於高級領導幹部的培育，所以兼任之初，立即籌辦研究班，我亦受命擔任第一期輔導委員。

舉目當時黨政、財經、傳播及民間企業各界的主管，多是當年研究班的學員，研究班自第三期起，連續六期調訓軍職幹部，這在當時黨、政、軍已逐漸分明之際，可說是克服層層障礙，倘未能及時為之，日後更不可能。

叔公對訓練工作，舉凡課程、師資、生活起居，均極重視。每期開訓，必親自主持，並針對學員特性，做一番語重心長的訓勉。我印象極深刻的是，研究班第三期軍職幹部開訓的第一天，他從黃埔建軍開始，由「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一路闡述革命軍與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的關係，深入淺出，令人動容。

叔公除訓練工作外，亦注重黨的理論研究，當時設立的理論研究部，在叔公督促下也確實出版了一些有價值的論著，對主義的研究不無助益。

其實，我與叔公真正親近，是從我離開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後開始的，這也是我一貫的習性，對有從屬關係的長官不願太接近。叔公離開母院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而我適在總統府任職，一些瑣事，自然為之代勞。每逢他有事到府接洽，也多由我陪同；而當時我即發現，他健康狀況退步很快，上下樓梯僅數十階，也須幾度停下休息。叔公見我面現憂色，反倒安慰我說，他只是肺功能不好，其他都還健康。

我在府的工作，主要是草擬文稿，這方面叔公是專家，所以我每有疑難，常往請教。有些重要文稿，李總統也常指示，「要請教吳俊才先生的意見」，甚至稿成之後，還要送請叔公過目斧正。在此一過程中，我受益獨多。

在叔公轉任中視公司董事長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每次見面，總覺其氣色不好，身體也逐漸虛弱。後來，聽說住院了，我立即偕內子前往探望，推門入內，內心大吃一驚，因躺在床上的叔公，形容枯槁，說話都很困難，不禁悲從中來。其後數度前往，病情雖有起色，並曾離院回家休養，但噩耗終來，卻不料發生在美國。

我曾有幾次陪叔公閒話家常，言談間頗得意於子女的教育及表現。的確，叔公的長女公子德里嫂，惠質蘭心，令人油然而敬。愛婿慶平兄，與我是多年好友、同事，任駐美協調會辦事處文化組長時，表現即極優異，後返國任海基會副祕書長，對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工作，貢獻獨多，數度率團訪問大陸，或代表協商，都贏得對方高度的尊重與重視。次女公子涵碧小姐，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著作何止等身而已。長公子玉山教授，是年輕一代中最傑出的政治學者之一，在台大政治系，也是備受學生愛戴敬仰的老師。一門俊秀，未來前途均不可限量，叔公在天之靈當可含笑矣！只是哲人已遠，我再到那裏去尋此長官與良師？

「斷交部」變火車頭

——追念吳先生在考紀會

余承業

吳俊公叔心先生，品格高雅，才華洋溢，為國之大老，黨之精英。自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命出任考核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至民國八十一年二月退休為止，在職近五年。先生出任新職之前，在黨內歷任要職，襄助先總裁蔣公、故主席經國先生與李主席登輝先生，推動黨的改造、改革與發展，厥功甚偉，退休之後，又蒙層峯借重長才，敦聘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一生為國抒忠，為黨盡責，犧牲奉獻，死而後已。

先生不僅是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家，在考紀會工作期間，獨具匠心，將考紀工作發揮淋漓盡致。考紀會原是一個冷單位，不受重視，亦很難展現其功能，可是經過俊公一番苦心經營，竟成為黨內一個非常受到看好而具亮麗成績的單位，會內工作同志士氣極高，大家同心協力，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試舉數端如下：

（一）化斷交部為火車頭：俊公在接考紀會的前一天，偕夫人蒞臨寒舍訪晤，他說自做事以來，在報社、學校、研究院等，都是人際關係極為密切的單位，可是到了考紀會等於到了斷交部，他亦向層峯報告了這種看法，問我今後如何做法。我們談了很久，認為先要改變黨內對考紀工作的看法做起。

我們認真地將考紀會職能，逐步實施，幸而得到上級的支持，例如每年度在開始之前，依黨及時代的需要，擬訂年度的中心任務，提常會核定，再由各單位擬訂工作計劃，由考紀會彙編送上級審查之後，始可編列預算，由財委會核撥經費，工作計劃均由考紀會加以列管，追蹤檢查。主席交付任務或大會、常會決定重要事項，適時提報黨會或工作會議；各單位雖常以此為苦，但仍多配合辦理。各單位每半年度自行舉行工作檢討會，年度終了，舉行年度總檢討會，考紀會均派員列席參加，每一年度結束，考紀會將各單位成績，做成評分及名次，密呈主席審閱，所以在年度開始到結束，環環相連，絲絲入扣，帶動黨務推展，因此成為黨內的發動機，稱之為火車頭並不為過。

考紀會除了對黨務工作加以考核之外，對五院從政主管同志的政績，亦加以考核，尤以行政、立法兩院之考評較為艱辛，必須邀請許多專家學者參與考核意見，但也很受行政主管同志的重視，不過在民主政治進程中，後來對司法、監察兩院不再考核了。

(二) 由消極進為積極：經國先生曾說：「黨紀應以愛為出發點」。我們應以愛同志的態度，處理違紀的同志，非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不輕言用黨紀來制裁同志，更進一步的以獎勵來替代懲處，以教育、勸勉的方式面對問題。

俊公是文化宣傳專家，到考紀會後即大力出版《考紀評論》、《半月刊》等，鼓勵同志投稿，並編印考紀教育教材，拍製動人的錄影帶，發到基層使用。在每一鄉鎮，遴選數名年輕有為同志，擔任考紀聯絡員，構成了全面的考紀聯絡網；凡遇有違紀傾向者，隨時予以疏導或糾舉，同時分批調訓各級考紀幹部，並分區舉行講習會、研討會等，期能發揮正面的效果。

(三) 化被動為主動：考紀工作，泰半多是被動的講求程序，配合條文，非常刻板；要主動來做，必須用另一角度去思考，用另一種方法去尋求發展。

考紀會在七十七年四月奉准設立了法政、財經、社會、文教、國防、外交、黨務、心理、大眾傳播、大陸問題等十個研究組，延攬專家學者，參加設計研究工作，成為黨內重要的智囊庫。凡是有關主義、政綱、政策及現階段任務，隨時選定題目，不定期進行研究評估提出建議，各組召集人，均蒙李主席親自召見慰勉。當時有許多重要問題如：開放大陸探親；評估參加亞銀年會；展開實質外交；大陸轉口貿易；教育目標與就業取向之調適；改革賦稅等等問題，提供意見供政府參考，此一鮮為人知之研究組織，甚獲層峯重視，對政府及黨貢獻甚大。

此外，考紀會又研究推動了「興利除弊，為民服務」運動，號召熱心同志，不求政府補貼或幫助，以自身的力量來解決地方上及社區內，亟需解決而未解決的切身問題，先選擇北、中、南幾個縣市做為試辦，引起很大迴響，成績斐然。但此一業務，係屬社會工作範圍，俟有成果之後，即移由社會工作會主辦，當時社工會鍾主任榮吉相當熱心，並大力推動。

俊公對我愛護備至，追隨以來，亦師亦友，獲益匪淺，在中視期間亦常相約晤面，生病住院期間，亦常前往探視，不料赴美求醫，未久即噩耗傳來，無異晴天霹靂，緬懷往事，歷歷在目，翹首雲天，感慨萬千，奈天人永隔，徒喚奈何！

任人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能忍

—追念吳俊才先生

石永貴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當一代中興名將曾國藩去世的時候，左宗棠這樣悼念他的「老長官」：「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生平。」這就是曾國藩一生寫照，也是曾左關係的縮影。

同時，早期，左宗棠與其親人晚輩通信時有下面一段話：「然丈夫大事業非剛莫濟，即需要剛強之氣。所謂剛，並非高傲氣大，而是任人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全力以赴，不含雜念，不稍游移，必會有所成就。」如果左宗棠再世，我們相信，也會用同樣的語詞悼念吳俊才先生，來形容吳先生「不含雜念，不稍游移」的一生。

「台灣經驗」如今不只是朗朗上口，而且已成為國際語言，我們相信在下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會查到這一「名詞」。何謂台灣經驗？台灣經驗成功之源，是源於兩位蔣總統所開創所主導的台灣時期的人才鼎盛，突破困局，走向繁榮之路。

吳俊才先生在台灣經驗中，其本身不只是歷任三位總統，而且深受倚重；他就是「台灣經驗」人才代表，同時，他也為「台灣經驗」培養出無數人才，有助於「台灣經驗」之創造與延伸。也正如左宗棠所形容之非常人才：任人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忍。而吳先生一生之成就，其精神亦有非常人所不及之處：魄力過人、記憶過人、精細過人、愛才過人、深謀遠慮過人。此五者非常之精神，乃使吳先生在台灣成就非常之業，為國家培養無數之人才。

綜觀先生一生，很明顯分成二個階段，前段為人所賞識，成為非常之人才；後段賞識他人，培養出非常之人才。

吳先生一生，特別受知於三人，成為他一生中之奇遇：

第一位是馬星野先生。那是民國三十年夏，抗日戰爭激烈時，吳先生考入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科，由於成績優異，為馬星野教授所賞識，並以其妹馬均權女士相許，從此由師生關係而為姻兄弟關係，吳先生數十年來，以「馬先生」敬之，馬先生時時不忘「俊才」。

第二位是羅家倫先生。吳先生中央幹校畢業後曾作短暫的新聞採訪工作，以致因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參政會之新聞採訪詳實與深入，為羅家倫先生所賞識。至民

國三十六年，羅先生為我國首任印度大使，乃力邀吳俊才以中央日報特派員名義同往。當時吳先生一身兼三職，為中央日報採訪撰稿，為羅大使文宣助手，印度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其後成為印度史權威學者，來台後在台大與師大教授印度史，並有印度史、甘地與現代印度等著作多種。任教台大、師大以及其後政大，桃李滿天。

第三位是卜道明先生。吳先生來台後，從事學術研究並培養學術人才之路，始於民國四十二年，蔣經國主持總統府資料組創建國際關係研究會，吳先生以精於東南亞研究為國際組研究員，深受卜道明所倚重。其後吳先生升任董事長與所長，乃以國際關係研究所為基地，鋪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以及中國大陸研究之大道，並成為人才薈萃與人才培養之搖籃。此一時期，不只是吳先生之得心應手，亦是中華民國國際學術研究之黃金歲月。

吳先生展示之大魄力的開創新局，如將國研所遷至木柵，由與時事為背景的中央日報結合變成與學術為背景的國立政治大學相結合；定期舉辦中美、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使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學術化與國際化；創辦東亞研究所，使匪情研究與教學專家化、學術化與公開化。

吳先生因為有其過人魄力、過人記憶、過人精細、過人愛才以及過人深謀，每到一處，都有非凡表現與成就，絕非傳統的墨守成規或蕭規曹隨。

我有幸追隨吳先生是在他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出任執政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以及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事實上，一如無數他的門生一樣，吳先生一生都是我的長官我的導師，我每到一個地方工作，他都很關心，都很鼓勵、玉成，也都從旁關懷與協助。

吳先生正式認識我，是在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首次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台北召開，我奉派擔任新聞組長。那個時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中美大陸學者在一起，尤其是思想與立場與我政府並不一致的自由派美方學者應邀與會，真是歷史的大事，也只有吳先生有這樣的魄力與膽識。

問題來了，由於美方若干學者對我新聞環境的疑慮，研討會險些觸礁，開幕前夕——十二月十二日晚，雙方連絡人員徹談竟日，忙到終夜，仍未得解決，美方若干學者對我國新聞界以及大會新聞採訪有些要求，吳先生極為為難。

吳先生在台北中泰賓館連絡處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我大膽地向吳先生提出請求：現在夜已深了，吳先生忙了一天，明天早晨要開幕，吳先生承擔重頭戲，現在吳先生趕快返家，洗個熱水澡，早點休息，有關美方要求事宜，由我

來處理，如果有困難，再向吳先生報告。在電話中，吳先生停了一下，並與在旁的幕僚作意見交換，於是接受我的建議。

我放下電話後，即與副組長朱正明兄連繫（他習慣地還在辦公室忙發新聞）並告訴他關鍵問題與處理方式，我們立即分頭與新聞單位及大會採訪人員電話連絡，取得瞭解與諒解，因為我們知道新聞界的需要，以及平常就有密切與暢通管道，不到半小時差不多就完成了。

這時，吳先生已到家，我在電話中向吳先生報告協調情形，請他放心與安心，最後剩下一個新聞單位，無法完成，就請求吳先生親自打一電話向該新聞機構負責人請求體諒與支持。

第二天大會順利開幕，一個星期全部議程進行順暢無阻，我國採訪大會新聞界朋友全心滿意我們新聞資料提供，坐鎮在實踐堂的吳先生，很感激新聞組表現，會後美方人員另有南部與外島參觀訪問節目，當時難得的機會，吳先生特別指定要我們參加以作為獎勵，我們因為原工作單位積壓工作待理，都一一婉謝。

大會閉幕後，吳先生對我念念不忘。如報告會議成就經過，也要我參加並提出報告。其後，有多次約見，真是慰勉有加，邀我至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並試探當時我的長官陳裕清先生意見，陳先生不放人。適值《問題與研究》創刊日文版，張棟才先生在東京主持其事，吳先生希望我能以兼差方式在台北負編輯連絡之責，因格於人事規定未能如願。但吳先生對「人」的緊追不捨的精神，令我終身感佩與難忘，對我影響也很大。

我正式追隨吳先生是他於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出任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民國六十四年四月，蔣總裁中正先生逝世，蔣經國先生繼承大任擔任執政黨主席，除舊佈新，展開開大門走大路新政。之前由於吳先生對蔣經國先生極為尊敬，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及國際學人之交往，默契十足，改組後的文工會，就非學人出身的吳俊才先生莫屬了。

這個時候，我已離開文工會前身中四組，前往華視參與籌備與開播工作。吳先生主持的文工會，從第一室到第七室，各有職責，各有發揮空間，其中第一室掌新聞連繫，第七室為黨營文化事業。

適家父因為國研所舊誼關係，往訪文工會吳先生。吳先生就託家父對我提出一個「願望」：「華視籌備及開播任務已完成，可否重返黨部，幫我負責第一室」。也許研討會期間的「肝膽相照」期間太深刻了，我生活簡單，除了辦公室就是家，在那個沒有「大哥大」時代，最適合分秒必爭的新聞連繫工作。殷文俊以政大教

授身份主持文工會第七室，黨營文化現代化經營，就從此啟始，人事更新為特色。賢者辜振甫擔任中影董事長、能者梅長齡出任總經理，就是絕配。

吳先生主持文化工作會，真是結合內外，全心全力致力於文化紮根與學術結合工作，如創辦《中華學報》、設立國家文藝基金、開設中國大陸研究所以及設置中國現代史課程等等，都有劃時代的貢獻。

我二度追隨吳先生是民國八十二年，他受當局之重託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當時，我早已離開文工會，在台灣新生報、台視以及中央日報轉了一個大圈子。他接掌中視後，就苦思如何使電視事業有利於國家，有益於社會，這是傳播事業的文化使命。電視事業積習很深，久病不以為病，見怪不怪，種種現象也勞當局關注與費神。就以準時播出來說，現在分秒不差，得自吳先生全力貫注所致，其實，準時是現代社會起碼與必要條件，作為大眾傳播事業之電視，豈能例外。因為我有主持台視經驗，吳先生印象深刻也引以為傲，常常有關中視問題「考」我，我不以為意，據實以答。

一天吳先生突然說：有一天我會把你拉到中視，綁也要綁來。我就說：老長官有所吩咐，隨傳隨到，放個椅子就行了。真想不到，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我加入中視，負責直接執行老長官命令之責。對我來說，是責任也是緣份。

也許天生，也許用心用力過度，吳先生的體質與身體，自從我認識他那天開始，就覺得很弱，他又責任心重，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此情此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心酸。

不過先生享壽七十五，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一天抵幾十天用，其貢獻更是一個時代的。

懷念馬均權女士

愛家，就是要會燒一手好菜

吳德里

我自印象以來，母親就保持著三、四十年代那種歷經大時代戰亂洗禮過，卻又不失其受過良好教養，自然流露出端莊典雅的氣質。她皮膚白皙，天生凝脂晶瑩，眉清目朗，是那種不需施胭脂，就自然出眾的美麗。我依稀記得童年時期，偷偷試用她梳妝台上放的所謂化妝品，不過就是一瓶 Pond 面霜，一盒粉撲、一瓶明星花露水，三兩條口紅而已，其它都是些書籍，特別是上海出版的《野風》刊物。民國四十幾年，台灣還沒有出版多少藝文雜誌，她這幾本從印度帶到香港、再從香港帶到台北的《野風》，記憶裡封面都被她翻爛了。

喜歡文學的母親很早就在大華晚報寫專欄，我一點都記不得她寫的是哪些小品文章，只記得我小學放學回家，偶爾見她還在伏案爬格子，登出來的文章貼滿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但是弟妹相繼出世，因為凡事認真求全求好，她忙得放下自己嗜好，全心全力做個出色的妻子與母親，希望父親好好做他的「報國」事業、我們三個孩子也能全都品學兼優。

說實在，母親很福氣，那個年代少有蠟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大部份已婚婦女就是專職家庭主婦，不過，在家中排行最幼的老五，從小備受呵護，求學時期又因對日抗戰跟著學校遷徙，後來又寄住在我舅家，年輕的母親真的不會做菜；父親手藝不錯，會做幾道菜，卻只有過年才一顯身手，不過最厲害的，是他吃吃就知哪個程序火候不夠，是鹽放少了還是糖放多了，在外面若是吃到好菜，他也會高高興興帶著母親一起去再嚐美食。也因為這份生活中僅有的講究，所以父親當教授薪資雖菲薄，一直請了人讓母親在家務方面有位好幫手，買菜炒菜都有能幹的阿嬌代勞，她手藝不錯，簡單的青菜豆腐都能調理得清爽可口。好日子不常，過了幾年阿嬌要出嫁，辭工不幹；這就苦了母親，那哪裡去才能找到一位得力幫手，滿足品菜功夫越來越高的夫婿。

我猜，她就是在一心一意要父親在家用餐，也能大快朵頤的心願下，成就了後來的美食因緣，開始投師拜藝，參加當時坊間寥寥無幾的幾個烹飪班，學習做菜。過去離文學較近，離廚房油煙遠的母親，從此欣然洗手下廚，快樂學菜，而且因緣際會，遂把這些快樂的美食心得傳播到千家萬戶。

民國五十一年，台灣電視公司成立，台灣進入了電視時代，那時候許多節目都是試驗性質，母親經人介紹，擔任了當時烹飪節目主持、製作人，我記得同時期的數位主持人，除了母親，還有傅培梅、潘佩芝兩位女士，其後七年中，中視、華

視相續成立，母親均曾於其間製作、主持烹飪節目，從此展開她燦爛的美食生涯。

母親能夠成為當時三台爭聘的烹飪節目製作人和主持人，真的是家中成員始料未及的事。父親當初以為這不過是她繼文學之後的一項嗜好，一週一次，無傷大雅；最好的是她學到新菜，又可闔家享受。他沒想到母親如此投入，傳播力量如此強大，本週我家餐桌上的試菜，下週就成了更多家庭快樂享受「媽媽的菜」和幸福的翻版。每週上完節目以後拿著厚厚成疊的觀眾來信返家，母親覆信到深夜。她這個製作人不像現在製作外包公司有團隊支持，純粹是一個人獨撐；從到處打聽名廚，探訪每道菜的製作秘訣，到翻遍大江南北絕版食譜與典故，在中視、台視、華視週刊，中央、中華、新生三大報撰寫食譜，寫電視腳本，擬預算和製作計劃，忙得團團轉。

在當時沒有大眾傳播電視科系的時代，電視台許多專業人才都是公司開班授課的速成品。母親在這塊嶄新園地裡，全憑自我摸索，竟得到觀眾支持口碑稱好，我覺得這全憑她一股要教台灣的母親們，「用愛心為家人調理可口健康美食」——這樣簡單的誠心誠念，和奮力不懈，的確為她的節目贏得認同。

有一次，母親要到重慶南路台灣銀行大廈旁邊的中央銀行，訪問當時為徐柏園總裁掌廚的湘菜大師——彭長貴先生，請他到電視台來教授傳授幾手絕活。那天下午母親擔心彭先生婉拒，攜了還在高中就讀的我同行壯膽。約會時間是下午兩點，我倆在偌大會客廳旁長廊的椅上等了又等，因為中午徐柏園總裁宴客，耽誤了不少時間。

母親倒是心平氣和等著，身裁瘦削精悍且煙癮很大的彭先生最後終於出現，慷慨答應拿出絕活相授。獲得大師相挺後，母親回家高興極了，我記得就是那陣子，我家餐桌盤盤常見母親做的湘菜名菜，像炒羊肚子、畏公豆腐、芥藍臘肉等，滋味的確不同凡響。思鄉心切的父親吃到一流的湘菜，那份開懷大嚼之樂，更別提有多高興。那以後母親的節目就成了各派名廚輪番上陣的天下，像其後八度在世界烹飪大賽得到金牌，在美國鼎鼎大名的詹煌君師傅，當時就曾多次與母親在中視「點心世界」合作主持。

「中央食譜」、「均權食譜」初版的那段時間，正是台灣經濟起飛以後，外省菜還保有渡海而來的原味，各家名師都是風華正茂，以標榜正統、發揚光大原有特色為榮。相對的，一些佳餚美食菜式因為三反、五反，再加上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在大陸反而已經吃不到了；在台灣，卻藉電親烹飪節目與民生邁向富裕，而帶動了和本土的閩南菜相互拼場，蔚為美食藝術的風氣。如果說母親當時主持節目中的菜餚，因為她與各家名師的良性互動，都能呈現中國菜極具特色的一面，絕非溢美。

母親的電視烹飪節目，後來因為她積勞成疾而告停，但是即使她後來隨父親駐使南美，返台後經常出入病房，寫食譜依然是她服務社會，幫助他人的快樂泉源。

經過三十多年，外省菜早已融入台菜，變化出時代的新口味；但是不少獨具特色的各省菜餚，仍歷經時代考驗，以其特色代代相傳，並融入坊間各家食譜，食的藝術如今已成台灣人生活藝術的特色。但是職場生活緊張、婦女就業普遍，加上餐廳林立，的確也改變了許多家庭習慣，母親們減少下廚，家人也漸少在家中悠閒進餐。而每次在烹飪節目中叮嚀媽媽們要注重營養與美味的母親，也已離開我們將近二十五年了。

前一陣子，二妹涵碧說，今年母親逝世紀念日，我們何不以特別的方式來紀念她，考慮到她在世時最高興的事，就是能讓媽媽們都能快樂燒一手好菜，我們決定將母親的食譜出書，表達我們對她無盡的思念。我想，其實我們三個如今野心可以更大，期待這本書的再版，不但能讓大家回味往日的情懷和五、六十年代的特殊味道，更能讓現代家庭中闔家大小瞭解，愛家，就是要大家都能燒一手好菜，家宴、更能落實和傳承國人食的藝術。

願人人都是食神！

載《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5 年）



母親的故事

吳涵碧

兩年前，有一回與漢寶德伉儷相聚，言談甚歡。漢夫人突然迸出一句話「令堂馬均權女士字體娟秀。」

母親的確寫得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但是，漢夫人如何得知？

漢夫人笑盈盈道：「想當年，我和我母親最愛看馬女士主持的烹飪節目，還會寫信問東問西，令堂總是儘快覆信，非常親切。」

啊，事隔四分之一個世紀，竟然仍有「粉絲」懷念母親的熱情，母親天上有知，一定樂呵呵笑個不停。另外，這些年來，不斷有人詢問打聽，母親可有留下秘方。於是，遂有這一套《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之誕生。

此一厚重紮實之巨著，雖然號稱 800 種，其實超過 850 種長達五十萬字，還不包括一種之中有所謂海參六吃、魚香四件。其中單單雞的做法足足七十八種之多，顯現中國美食的博大精深，也代表馬均權式的大格局。

《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曾經在台視、中視、華視播出十餘年；曾經在聯合報、中央日報、女性雜誌、電視週刊....長期刊載；曾經在父親吳俊才先生繼連戰之後，出使薩爾瓦多之時，大大出過風頭；更重要的是，書中一道一道拿手菜，全是母親一遍一遍嘗試的成果，花費了驚人的時間精力，值得推而廣之。

很難想象，母親原是標標準準「君子遠庖廚」。這要追溯到外婆、外公是收入微薄的教師，外婆不識字，卻胸懷大志，她希望五個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因此，除了舅舅馬星野先生之外，女兒名字中都有一「權」字，以示不讓鬚眉。

母親不負外婆期望，以優異的成績在暨南大學史地系畢業之後，曾在中央日報、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館工作。本乃嬌滴滴的書卷美女，會背整本的徐志摩全集，結婚之初，她的想法是「家中不要買碗買筷。」

其後的大翻轉，完全是基於對父親濃烈的愛情，對三個子女無邊的母愛。一次偶然的機會，知道母親手藝的朋友，介紹她上了一回電視，結果大受歡迎，台視公司要求每週固定播出，母親心忖，這是「幫大家忙」的機會，慨然答應。從此，我們家廚房邁向更恢宏的氣度。

只要是能「幫人家忙」，母親就大樂。母親一襲旗袍，古典優雅，完全無法看出她豐沛的熱情，周遭親友、父親的研究所學生，固然是她幫忙的對象。即使是毫不相干，母親也兩肋插刀，頗具傻氣俠氣。我若是不舉幾個例子，實不容易讓人體會她待人處事一片熱切。

我們住在四維路的時候，住於一棟公寓的二樓。她每天從一樓樓梯間掃到四樓，就差沒有推門進去。這還不夠，她乾脆整條巷子給包了。有一位鄰居老先生不領情，厲聲斥責母親「不許多管閒事」。

挨了罵的母親沒有氣餒，仍然在窗口東張西望，只要趁著老先生不在，她一溜煙拿著掃把往外衝，當她打掃回來，又站在窗口，欣賞清潔的巷道，臉上的得意開懷，彷彿打勝一場戰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玩著躲迷藏的遊戲。

母親自告奮勇當鄰長，開里民大會，在報上寫讀者投書檢舉髒亂，仁愛路遠東公司前面的行人穿越道，就是她長期大聲疾呼爭取來的，母親確實做到上帝所說：「要愛你們的鄰人。」

母親更徹底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小時候，最怕跟母親上菜市場。只要聽到小孩子啼哭聲，她一個箭步向前，握緊了正在「行刑」的大人的手腕疼愛地為小朋友說情：「不要打、不要打、慢慢教」。殺豬割魚的攤販，個個力大無窮，又在氣頭之上，我總在一旁擔心，拳頭或是鞭杖，可別落在白白嫩嫩的母親身上。不論我如何嘟嘟囔囔抗議，母親一貫循聲救苦。甚且罰站在升旗台上的小頑皮，母親也會慈愛地牽他小手，走到訓導處幫忙討饒：「夏天這麼熱，小朋友會曬昏頭。」

如此以「天下為己任」的可愛母親，開始製作電視服務觀眾，更是精神抖擻，充滿使命感。她走訪大廚，拔擢新秀，自己也卯足全勁，展開大規模的試驗，往往一次一次嘗試，一次一次失敗。

記得初試沙其馬之時，麥芽糖不足，黏性不夠，怎麼也拼不成塊。廚房料理台、餐桌上，到處散放，母親自己拍手大笑：「怎麼做成這個樣子？」新鮮的沙其馬雖然不成形，香甜無比，用手指捻一根送入口中，啊，熱熱燙燙，鬆鬆酥酥，家人一邊走、一邊嚐，嘖嘖讚美「其實，這樣的甜度恰恰好」。真是快樂芬芳的家酒，遠非包在玻璃紙中，方方正正冰冰冷冷的沙其馬可以比得上。

母親試驗上海燻魚之時，也是工程浩大，一連燒壞幾個鐵鍋，然而別有一股焦香誘人，濃郁醇厚的鮮甜，溢出了鍋外，滲出了門縫。放學歸來，循著最香的香氣，

可以找到家門，然後，深深吸一口氣，猜想母親的新冒險，真是何等幸福。

我親愛的母親生就鏗而不捨、追求完美，凡此種種美食，都是要向觀眾展現的，她更是絲毫馬虎不得，美食之艱難，絕不下於做學問。大快朵頤總是一剎那間，背後之辛苦非比尋常。

有一回，母親準備示範巧克力蛋糕，前一天，將成品備妥，擺在桌上。弟弟不知曉，放學回來，掰了一小塊，母親奔出，搶救不及，如果換了壞脾氣的媽媽，可能一巴掌就甩過去了。我母親雖不免懊惱，最關心的還是「味道怎麼樣？」

不小心闖了禍的弟弟，閉起眼睛，仔細品味，然後舉起大拇指道：「真是好吃」，「比前面一次都味道好」。

母親大樂，完全忘掉又得挑燈夜戰，再做一個蛋糕的辛苦，一心只想怎樣把反敗為勝的秘訣分享觀眾。

烹飪是藝術，母親浸淫日久，不只講究色香味俱全，更兼而顧及聲音，例如炸好的巧果，掰開來必然咔嚓作響，否則一定堅硬費牙。例如清炒鱔糊，若缺少了滾油一燒，滋滋沸聲，必然烹調不得法。

求好心切，鏗而不捨，力求完美，進而推陳出新。

例如椰絲塔，許多西點麵包店都出售，沒有能與母親製作的相比，因為她別出心裁，加了花生醬。花生的細膩滑潤、椰絲的濃厚綿密，形成不可思議的芳香豐潤。酥脆奶香的外皮還拌入了壓碎的蘇打餅乾，裏裏外外都講究，何止是齒頰留香？

例如鳳凰如意捲，內餡是絞肉與鮮蝦，所不同於一般蝦球的是外面裹上一層蛋皮，蒸熟之後，再沾粉炸得焦黃，外香酥內鮮嫩，比現在當紅的泰國月亮餅更勝多籌。

母親事業成功，卻絕對不忽略家庭。有一段時間，政府提倡「爸爸回家吃晚飯」，我家爸爸中午也回家，母親一天要準備兩大桌菜。父親總是踏入家門，未見人影，先以男高音的歌喉高唱「孩子們....」尾音要拖得很長。一家人樂融融笑呵呵享受豐盛的晚餐，還要唱一首父親作詞作曲的家歌。歲月流逝，人事已非，我不能想，一想就哭，一想就哭。

母親總要等到家人入睡，這才拿出厚厚的明信片，在沒有複印機的時代，就著昏黃燈光一一作答，我常拿起一張唸道「麻婆豆腐，四喜丸子……」一大堆，心疼地問母親：「天啊，這要折騰到幾時？」

母親的回答往往是，「今天製造澄粉（蝦餃外皮原料）老板打電話來，埋怨我幫他介紹，害得工廠趕工不及」。她總是忙於服務觀眾，忘掉人是得睡覺的。

母親有一句口頭禪：「打起跑」，意思大概是打起精神向前奔跑。她已經忙碌異常，仍然軋出時間學英文、學日文、學美容、學國畫、學插花，甚且去旁聽錢穆大師的國學講座，錢大師對母親贊譽有加。

長期的起勁奮發，母親終於積勞成疾。更糟糕的是，這是母親不斷許願的結果，每一次，家中有任何一個人不適，母親著急之餘，一定不斷仰望上天，「他們要上班、要上學，您讓我來生病吧。」

即使生了病，母親依然撐起精神，她抱著枕頭，坐在床上，開始計畫：「等一下胃出血的檢驗出來了，如果出血，我就去台大醫院，沒有，馬上買菜」。她為甚麼不能休息一下？為什麼非要天天上菜場呢？即或到了醫院，母親還是多事的，熱心的為父親的研究生學生，為醫院的護士撮合說媒，完全不改熱心本色，直到最後，僅僅六十歲與世長辭。

二十五年以來，對母親的思念從未稍減，我腦海中有一幅定格的畫面：在我還是小娃娃時代，一直到母親過世之前，最最喜歡夏日午後，浴罷，或睡或躺，偎依在母親身邊，母親的手臂粉嫩白細，冰肌玉骨，臉頰貼著，沁涼舒適，她身上的玉蘭花，飄來陣陣清香。我呢呢喃喃訴說每天細細瑣瑣，母親咯咯笑著，母愛永遠是最熨貼的力量。

又是玉蘭芬芳的季節，恍惚之中，我們姐弟三人圍著母親，向她報告，決心將食譜出書的大事。母親耗費平生時間精力，累積而成的豐碩成果，確實有讓社會分享的必要，完成母親愛吾家，以及人之家的博愛精神。

出書之前，有幾點要向讀者報告。

市面的食譜，花花綠綠，多圖片取勝。《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保持質樸，以葵花寶典秘訣見長，書中經常出現的「豬油幾滴」依然原汁原味呈現，母親文筆洗鍊，言簡意賅，閱讀之愉悅，頗有袁枚所謂「不必齒決之、舌嘗之，而後知其妙也。」

商務印書館方鵬程總編輯建議，何妨找一家餐廳完全呈現，800 餘種美食，古今中外任何飯店不可能完成。倒是在餐飲業競爭激烈的今天，大可以來此書中掘寶，依樣試做，滿足老饕的口味。

許多家庭主婦為開菜單所苦，本書正合需要。

工商繁忙的今天，全球化的今天，單身盛行的今天，人們被迫獨自進食的機會日多，就算家裏只一個人，也要自己一人演兩角，又是母親、又是孩子，自己疼自己，偶爾下廚大顯身手。

《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計五十萬字何止是食譜，根本是食典，值得大家珍藏，品味人生。

載《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5 年)



均權女士（左二）從陳丹誠大師習畫

媽媽的味道

吳玉山

在母親節回想已經過世二十五年的母親，心裡頭還是湧出難捨的孺慕之情。

我的母親是烹飪名師馬均權女士。在我國的商業電視台還沒有開播的時候，她就在教育電視實驗台主持烹飪節目。這個實驗電視台位於台灣教育資料館當中，就在建中對面的南海學園裡。那是一個仿天壇的建築，在裡面走路是一圈接著一圈的。我曾經被人帶去找母親，對那棟建築物有趣的造型和裡面奇特的光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想，原來長這樣子的就是電視台。

這個印象很快就被顛覆了。因為母親接著在台視、華視和中視開闢烹飪節目，我也到攝影棚找過她。印象中冷氣都開得很大，但是在冷冽的空氣中，強烈的燈光卻又叫人炫目發熱。工作人員顯得都非常歡迎母親的節目，因為整個攝影棚都飄散著食物的香味，而大家都是吞著口水在等待節目結束的那一剎那，然後就搶進去品嚐兼打包。

在電視台錄製烹飪節目一定會有成品和半成品。那些半成品是用來呈現製作過程到一半的時候食物的樣子。這時候母親會說：「像這樣子擺進烤箱裡，烤 300 度，十五分鐘以後就變成光澤酥黃、香氣四溢的點心了」。接下來她就會拿出另外一盤已經烤好的點心。像這樣子的成品加半成品總有個二、三盤。可想而知，不論是哪一種，都是電視台工作人員的最愛。通常我在家中望眼欲穿，還是盼不到電視中引人垂涎的那一盤食物。

話雖如此，我還是有佔便宜之處。母親的節目有時是請大廚來做，有時是自己上場。如果是自己上場，那麼她會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試做，等到完全滿意為止。試做的成果，想當然是由兒女品嚐，特別是很貪吃的老公，也就是我。

現在想來，令我記憶最深的，首推湯包。那種皮薄、湯汁燙口、餡料鮮美的感覺，讓我對現在哪一家的湯包都嚐不過癮。還有廣東點心的芋頭角，香酥的外皮、細嫩的芋頭，再配上母親獨門的咖哩肉餡，實在是一絕。至於千層糕，當它蒸到紅棗和桂花的香味撲鼻的時候，你會不怕燙地想要一口咬下去。至於乾煸牛肉絲是我最喜歡的小菜，所有香料的的味道都被逼進又酥又嫩的牛肉中去，現在到處吃不到那種滋味。

螞蟻上樹是我特別喜歡的菜名，最喜歡呼嚕呼嚕地把粉絲和肉末拌飯吃個過癮。還有母親會燉大鍋的鄉下濃湯給我們吃。那種由熬透的大骨和煎過的培根所做成

的湯底，加上各色蔬菜的色與香，總讓我這個食肉類者吃得一碗接一碗。我在剛唸大學的時候，還帶了母親做的鳳凰捲，到同學家起鍋炸香，贏得眾人讚嘆。當然，來自烹飪名家有它的缺點，我記得考完大學上成功嶺的時候，差點餓死在上面，要靠家人走私普一的月餅來解饑度日。

我對母親的電視節目其實也有幫忙。有時候她需要助手也會找我，雖然我的功能有限。記得她做水果盅的時候，要把一個西瓜中間剖開，而且還要把兩半接合之處割成鋸尺狀，這樣子等會兒才能密合。於是我就在西瓜皮上用尺和鉛筆畫線，然後慢慢地用刀切出鋸尺。這樣的實驗進行了好幾次。有一次我好像是把上下兩半的鋸尺數目算錯，以致於西瓜無法接合，功敗垂成，難過了半天。我的獎勵當然就是西瓜盅裡沁泡在果汁中的水果沙拉。在炎炎夏日很難想像有比這個更好的食物。

我在做蛋糕時打蛋的重要工作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幫手，常常打到手軟幾乎抽筋。不過當我在烤箱外面看著蛋糕慢慢地膨脹起來，香氣擋不住地透露出來，蛋糕的顏色先是金黃、然後頂部又烤出美妙的褐色之時，所有手上的癢楚都不見了。這時整個人的狀態，就是從嘴巴到肚子到心頭都等著大啖一口。

母親的烹調功夫令人咋舌。從中西點心到南北名菜她都上手。碰到好吃而她不會做的，母親就遍訪名廚學藝，或是邀請各家餐廳的大廚來上她的電視節目。有時候我們一家上館子，過一會兒母親便失蹤了，原來是到廚房和大廚辦起外交，有時也會嚇壞人家。

母親的好學不倦令人難以想像，而對於觀眾和讀者的用心也是不得了。凡是有人問她食譜的問題，她就密密麻麻地寫張明信片去回，寫得眼都花了。她做烹飪名師的日子很充實。從一大早上菜場開始，一手打理家中大小事，然後準備節目，為報社寫食譜，回觀眾與讀者來信，常常一天忙不完。到了錄影的那一天，更是忙亂。她要化妝，還要照相；要準備食材和烹調用具，又要聯絡廚師；做為主持人，她要控制節目進行，所以又加上要和導播合作與培養默契。等到做完節目，整個人都累翻了，但是還有家中事要料理。母親後來身體不好，和她長年的勞累，要同時扮演好家庭主婦與烹飪名師的角色是很有關聯的。

由於是么兒，我和母親的年齡差距較大，等到比較解事、想要好好孝順她的時候，她已經快要不在。在記憶中，母親總是疼兒子疼到不行。有一回我和同學坐的三輪車已經離開家，往學校的方向走了好遠，忽然聽到媽媽的聲音，原來是我的東西忘了帶，她邊走邊跑地在後面拼命追，已經過了好幾個街口。母親有點胖，腿不好，哪裡能這樣奔跑。不懂事的我，當時突然心頭一熱、眼眶發紅，心裡想，妳幹嘛這樣，卻忍不住要哭出來。當時我應該是小學一、二年級，不時還會和母

親鬧點脾氣。以後每一次想到那個情景，喉頭就會緊起來。親愛的母親，妳過世得那麼早，我甚麼都還沒有為妳做哪！

《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要出版了。母親在天之靈會高興的。我翻翻目錄，好多菜色都在眼前出現，幼時的回憶也歷歷在目。我想讓她知道，她做的美食的味道，我們子女都記得。那是最好的味道，除了滋味鮮美，還有媽媽的愛心。讀者們也請知道，這些食譜裡的菜餚，都有一位偉大母親照顧家人子女無微不至的心情。

載《馬均權經典食譜 800 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5 年）



吳俊才先生年表

民國十年（1921）十二月廿五日
先生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滄水鎮。

民國廿三年（1934）
入瑞典教會所辦益陽信義中學，在學時膺選全校青年會及學生自治會會長。

民國卅年（1941）
考取中正醫學院與中央政治學校，決定選讀後者，入新聞專修科。

民國卅二年（1943）
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政校新聞科。在抗戰後期最艱苦時期投筆從戎，奉派至四川璧山青年軍第二〇一師，在軍中創辦《青年軍報》。

民國卅三年（1944）
分發至中央宣傳部任職，後奉派參與政治協商會議與國民參政會之新聞報導。

民國卅六年（1947）
與政校業師馬星野教授之妹馬均權女士結婚。隨羅家倫大使赴印度，擔任中央日報駐印特派員。並入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修習印度史。

民國卅八年（1949）
先生獲得德里大學歷史研究碩士學位。當年中印斷交，先生由印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修國際關係，並以東南亞區域研究為主。

民國四十年（1951）
國事孔急，先生響應蔣中正總統號召，毅然離英返國。途經香港，接獲中央日報急電，在港督辦航空版。

民國四十一年（1952）
先生返台，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五期受訓。結訓後出任中央日報主筆，兼任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校教授，講授印度史、東南亞史，出版《印度史》、《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克什米爾與印巴關係》、《甘地與現代印度》、《東南亞史》等學術著作，開創國內南亞與東南亞之區域研究。

民國四十二年（1953）

先生任國際關係研究會研究員，研究中共及國際問題，提供政府參考。

民國五十三年（1964）四月

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會改制）董事長兼主任卜道明過世。董事會推選先生擔任國研所董事長兼主任。在職期間，創辦《問題與研究》、*Issues & Studies* 等學術刊物，提升國內研究國際關係與中國大陸事務之水準，並開創國際學術交流。

民國五十四年（1965）四月

入國防研究院第七期受訓。

民國五十七年（1968）八月

兼任教育部核定新設立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培養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術人才，並創辦《東亞季刊》。

民國五十九年（1970）

將國研所遷入木柵萬壽路現址。並與美國學術研究機構合作於十二月在台北舉辦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始將台灣之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國際化。中美會議此後每年輪流在台灣和美國舉行，成為國際上極富盛名且持續最久的有關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會議。

民國六十年（1971）

國研所與日本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在台北舉辦第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此後每年輪流在台北、東京舉行。

民國六十一年（1972）五月

轉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在職期間，推動在各大學開設「中國大陸研究」課程，促成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學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使中國大陸研究和孫中山思想研究學術化。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1973）

先生獲韓國成鈞館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1974）

出任國家文藝基金會主任委員，創辦《中華學報》。

民國六十五（1976）年十二月

轉任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致力鞏固中、薩邦誼，曾受邀至薩國國會演講，備受尊崇。

民國六十七年（1978）二月

奉調回國擔任中央日報社社長。

民國六十八年（1979）二月

升任中國國民黨首席副秘書長。

民國六十九年（1980）一月

兼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主任為黨主席蔣經國先生，實際綜理院務。在職期間開辦多種班期，培育黨政幹部。

民國七十三年（1984）六月

辭副秘書長職，專任院務。

民國七十五年（1986）十月

創辦《理論與政策》季刊。

民國七十六年（1987）八月

先生自行解退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務，旋應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復被徵召為中國國民黨考核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先生義務任職。出版《滿懷希望的時代》與《政治與文化》兩書。

民國八十一年（1992）二月

自考紀會引退。

民國八十二年（1993）八月

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民國八十五年（1996）六月

卸中視董事長職。再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民國八十五年（1996）八月

先生赴美療養，詎料肺氣腫宿疾轉劇，於廿六日病逝於德州休斯頓班塔醫院，享年七十五歲。廿九日歸柩台北，於九月十二日舉行喪禮，同日卜葬於陽明山長安墓園。



紀念吳俊才先生

In Memory of Founding Director of GIEAS
Dr. Chen-tsai Wu, 1921-1996